

Anarchy 24/7

2015-2016

二四七 著

2015

一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总是要破坏现存的，如今可笑的情况是，正戏还没开始，它就要先在各种各样的地头蛇的手上死一遍。

德勒兹和加塔里：国家装置是解域性的。

在巴洛克之后，我们面临的是新巴洛克和新莱布尼茨主义：城市不再是同一座了，形状和景色在空间中处于运动状态。我们发现了新包裹，仍然需要打开、折叠再打开。解域实际上是德勒兹“褶皱”哲学的继承。

国家制造了共同体，但是随即通过劳动、货币和财产进行了再结域。这种再结域就像弗洛伊德的理论——一旦

在表意系统中建立能指的再结域，逃逸线就被切断了，人被孤立在他们的家庭之中成为专家的研究对象。如果逃逸线被阻断，进而转化而死亡和毁灭之线，就生成了法西斯。

中国的“和谐社会”采用的，是一种莱布尼茨式的痛苦理论：被罚入地狱人产生的不和谐、报复的念头和怨恨、对上帝的无穷仇恨，尽管是恶毒的，但也仍然是一种和谐。一个单子的不协和，是另一个单子完美协和的必要条件。

改开前的巴洛克：不理解下层仇恨的呐喊，你就无法想象党中央向往的最美好的世界。改开后的新巴洛克：古典理性在不协调中崩溃了，现在不可共存性闯入了同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即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尽管我们的社会不协调，但最终都被化解为“和谐社会”。

资本主义“无限制地超越国家本身的解域化”，超越了具体的形式而成为了全球公理。国家已经不是原先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那个国家了，国家成为了资本主义实现的现实模式。现代国家的类型来自于“元经济学”，如果把“官僚社会主义和极权资本主义国家等同起来”，就忽视了公理可以包含相异的形态……

现代奴役也不是以前的“压抑和意识形态”了，在全球公理的同质化中，权力的运作是微观的，在规范化和模式化里，我们只剩下“服从和奴役”。我们打开电视机，不是我们在看电视，而是在服从它，我们作为“人类机器”根本不是消费者，而是电视的一个零件——“输入或输出”！

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不会被定义为“政治犯罪”，而是所有社会犯罪里最糟糕的一种——想要对社会继续某种变革。现在只有政客们才会假惺惺地对政治犯罪表示兴趣，这当然和他们的职业有关——犯罪、偷偷摸摸地犯罪、光明正大地犯罪。政治现在本身就是一种犯罪。

政治犯罪已经不可避免地也商品化了——就像某种“廉价的奢侈品”，罪（政）犯（客）们在这个特别的政治经济学里大有可图。“而迄今为止，这样的社会只不过是表现得过于温和与宽容，即便如此，这样的社会也该受到惩罚了。”（《景观社会评论》；景观与恐怖主义）

本地化是一个伪命题。商品需要本地化，帝国主义、自由派和法西斯需要本地化，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本地化真正的诉求是一个“代表的政治”，资本家需要和地头蛇联合起来的时候，本地化才被提出。如果我们必须反对代表，就不再去脱了裤子放屁了——自下而上的运动本身就是本地，我们就是本地。征服者需要本地化，而当地的解放者，反而要去除本地化，把被蒙上的皮扯开，这样才会走向世界起义。

利己主义虽然强调的是“自我”，但虚无意志的背后是欲望之海。当欲望之流被切断，就生成了消极虚无主义的群魔。由于对彼岸世界的执着，对现世只剩下了仇恨。在这种虚无意志召唤下，光之帝国产生了，它让我们的社会像地狱一般，战争成为唯一目的。杀戮的尽头是像嬉皮士一样的佛陀，刽子手成了善。

不过正如把制度的罪责推卸到个体是专制的作风一样，用个体的心理分析来解释法西斯现象，仍然是法西斯作风。只把目光放在某一派别的虚无主义上也是不公平的，法西

斯的出现是社会性的，包括所有政治派别。甚至一些无政府虚无主义者的观点是对的——法西斯是马列主义政治形式的一个体现。

如今“我”不过是这个社会的控制单元。我被这样的东西定义：新买的符合人体力学的舒适沙发，每周按时播出的新番动画，游戏里诱人的道具……“我”是一个海绵体，渴望身体、死亡和暴力。如果我现在是一个空值，为什么还要如此纠结于“我”呢？我们真的愿意如此 functional 吗？我们都被困在“我”上了。

我们有必要理解自由主义的实质，它其实是现代社会统治阶层的一个自我创造。就像资本主义者们提出的理论：资本的过度发展会反而破坏社会，因此他们需要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这样的观点如今一样被我国官僚所接受。自由主义正如福柯所说，并不是一个关于民主的话语，它一样可以为官僚社会服务。

很多人有一种误解是认为马列主义领导了革命的胜利，但实际上很多时候马列主义提供的是消极的后果。我们的现状，都是让王八称霸王的结果。不用说过去，特别是当前，革命者首先要记住一条：我们的斗争永远争夺的是控制权，无论反革命怎么样，我们都要去控制街道和工厂。

无论是革命还是其他意义上的团结场合，那个最大的分裂煽动者，一定是那个（想要）掌权的人。而不是像我们的教科书认为的，是不服从的人造成的。

确实当前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的敌人想方设法地造成无政府主义在群众中的失信，想方设法地造谣抹黑它，这造成一种现状：革命的潜能被抑制，反而反动的一方（特别是些法西斯）却对它的资讯和理论更感兴趣，后者学的更快一些。但这并不是一个放弃的理由，长远来看它构不成革命胜败的关键。

其实把“欲望的主体”这种词挂在嘴边去批评所谓“后现代主义”完全是错乱的表现，某种程度上后者反而更科学些——“主体思想”翻译过来，实际上是“上帝思想”。但遗憾的是，马列主义官方更喜欢这类神学，就像德勒兹说的，“所有这些都使它们与既定秩序调和”，一种完美的官僚话语方式。

马列主义总是培养幼稚病：我学了牛逼的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就控制了“主体性”，而没有掌握的人就是“浅薄的”、“愚昧的”和“无知的”——就好比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对待异端的态度一样。怪不得他们领导人的后代总是先天愚型。

现代神话不一定必须是本体论。问题是这样的，欲望并不在主体或客体之中。它是一种社会建构，或内在的平面：苍井空只有在成为“人民艺术家”的时候，那个欲望才出现。如果单纯讨论主体和欲望是非常狭隘的，就像用“享乐律令”来解释法西斯——它的分析严重欠缺广度，只是用官僚化代替了法西斯的战争运动

更重要的一点是，把社会因素纳入分析中才可能具有阶级视角，欲望换一种叫法，就是尼采的权力意志。比如，把同性 CP 当作一种审美活动，它的流行反应出新生的女性知识阶层壮大的趋势，在性别不平等的环境里，比起恋物癖它更具主人创造精神。精神分析是永远不会告诉我们这些的。

为无政府虚无主义辩护:批评虚无主义是容易的，而且同情它同样容易。实际上这些虚无主义者不需要同情（甚至是辩护）——那是令人恶心的——除非“用行动取代眼泪”。但是我们并不置身事外，必须要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是希腊，为什么是无政府虚无主义，它的背景是什么，如何产生？

福柯说 21 世纪将是德勒兹的世纪完全是正确的，我们的处境就和德勒兹在 6、70 年代所提到的一样：我们身处一个全面反动的世界，后法西斯主义的世界，到处都是法西斯，个体被全面地包围。这也是《革命将至》里提到的：一切旧有的都成了反动的，任何圈子都只是为了提供差劲

的舒适，而老左派在陈腐中死去。虚无主义，意味着反对一切，那么当一切都成为反动的时候，虚无主义这时将成为唯一激进的力量。德勒兹提到这里有两种颠覆的模式，也就是两种虚无主义：一种是常见的、人造的（波普艺术的）、为了维护再现、模式和复制品的既定秩序；另一种是为了创造性的混沌制度化而颠覆模式和复制品，让假象发生作用。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到希腊人为了对抗悲苦而制造了一种假象的审美，希腊艺术是一个“假象的世界”。假象的世界就是他们诸神的世界，这些神的生活和人的生活无疑，因此他们通过审美“假象中获得解放”。假象从德勒兹看来，如今就是我们颠覆既定的柏拉图-苏格拉底-理论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些希腊的无政府虚无主义者，通过与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相关性，对现代性做出锋芒的批判，成了尼采口中“不合时宜”的人——“一切都是为了将来”。不合时宜，在这里将个体与原始存在合二为一，回到至高的艺术的原始痛苦/快乐之中。它并非是一种经典意义上的个人主义。

“非正式无政府主义联盟”就像一个虚无缥缈的组织，实际上它是伪虚构的、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虚无的。尽管

多少像恐怖袭击，但是除了法西斯之外没有伤害过什么无辜者。这是一种对希腊悲剧的回应，也是对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回应，一个微弱的革命的信号。当马列主义者正哭嚎希腊处境悲惨、世界向右转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他们自己。相比一种伟大的创造，这些“谴责恐怖主义”马列主义者除了麻烦、以“反恐”的名义提供镇压口号，还提供过什么激进的革命性建设呢？在这里无政府虚无主义者反而更清白了。

“我”的痛苦，来源于自己欠缺革命性这一事实。这是愚蠢和软弱的抑郁。革命者怎么可以被这种无聊的幻象击倒呢？他应该更加快乐，因为这里只有胜利一种道路了。反倒是激进的虚无主义者，比我们积极的多！

无政府这个词起先就是个诨名，被描述为危险、无秩序和恐怖的。这才是革命者自称它的原因：革命总是暴乱和

无秩序的。而不是像奴隶认为的，它必须充满光辉。如果它成了正义的代名词，那么就要继续旗帜鲜明地反对它。

我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它在奴隶和统治者眼里是罪恶的；我不是，因为它成了救世主的狗屎，每天都装作“受害者”忽悠别人。

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因为“你只能通过掌握才能真正享有（权力）；你只能通过行动来学习自己的利益”。换句话说，一个社会解决方案来源于斗争与直接行动，而不是什么狗屁知识分子幻想。立即获得解放的意思是，我们像紧急集合一样，去打一场未知的战役。我们是战友和同伴，而现在需要商议战术。只有袖手旁观的人才提出所谓“建设性意见”，问题却是，如何自我批评与合作。

这不是什么单纯的复仇。革命之后取决于革命的过程：它不是一种人为设计。在这里我们应该把创造性制度化，而不是去制度化创造性，后一种才是值得担忧的。难道我们现在还要担忧自己身处农耕社会吗？关键是我们如何粉碎那种重新归复资产阶级政治的努力。

邮寄炸弹，和法西斯火并，同志的死……暴力和死亡总是弥漫在革命者的身边，但是他们的行动并不像官僚们描述的“小资产阶级的绝望”那般。相反，他们战胜了绝望，在他人绝望时带来勇气，激情而快乐。

这就像查拉图斯特拉何时会给人带来绝望呢？他是来给我们根除绝望的。只有在无法打破墙壁时，痛苦和抑郁才会找上你。但是我们可曾脱离那个恐惧的巢穴呢？恐惧总是“首先在我们灵魂中筑巢，而后筑起它监狱的围墙”。只有在这个被囚禁的现实中，我们才抑郁。我们对破坏的恐惧才是法西斯的来源。要知道，破坏并不是一种绝望的反应，它总是传播快乐，我们的创造欲望丰盈的标志。

无产者在今天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如何在整个政治商品的交换中避免再次被剥夺：中产阶级猪有他们的全职专业的战士、NGO、律师、以及全球媒体在撑腰。官僚国家的警察也是这种价值交换中的一环，政治利益就是在这种表演/交换中再一次倾斜到猪的一边。相反的另一边是赤裸的个体，只有自我毁灭和炸弹两种选择。

也许炸弹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更不应该是旁观者。如果我们主动去终结那个交换,停止生产会怎么样呢?——当政治把我们当作一种媒介,我们的不道德就是一种武器,去反抗他们强加给我们一整套意识形态。

要摆脱消极该怎样呢?反抗更主动些,是具有针对性的,去挑战整套系统本身的荒谬。所以要斗争,尽管那些红色工贼的跪舔和团结的讹诈真是让人鸡皮疙瘩满地,但他们是一个好的对象,我们的针对性从这里开始,然后搞出真政治!更真的政治行动并不是说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去代替人们去完成政治生活的全部。就像在以前的无政府思想家从来没有说过要这么做,关键在于革命组织是否能够融入到大众创造的后果中。是说要去实现社会战争状态本身,实现更广泛的创造活动。社会战争是内部的,它就是阶级斗争广泛实现的后果。尽管我们今天如此地被剥夺,成为自恋的个体、丧失主体的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难以实现。在这里我们正是以一种独特性发出挑战。

很少有人说自己要成为恶人，可那些坏事没有少干。撒旦要与上帝争锋，所以才成了那个恶的化身。恶，是要坏出道理和智慧的，没有道理的坏就成了一边喊正义的口号，一边成为法西斯和邪教，换句话说就是怂。但是尼采又告诉我们，上帝死了所以那个亵渎者也死了，善与恶成了不断变换的修辞：我现在是善，另一秒可能就恶。

当前我们的观念里有类似的结构：由于马列主义党代替了上帝行使无上的权威，所以在古典神棍眼里，它成了恶的化身——撒旦；同样在这个权威中挑战它革命性的无政府主义，在党的眼里又成了撒旦，所以无政府主义这个词在中国总是用来描述所有坏现象。在共党的统治下，一切错误都可以用一个词来解释：无政府主义。党总是出叛徒和腐败——都怪无政府主义；党要文革，是因为无政府主义机会路线——反党、反社会、反人民；党开始反文革——都怪无政府主义搞了文革。无论怎么样无政府主义总是那个恶的化身，所以总结来说无政府主义就是共产党的撒旦。

类精神分裂人格的症状是：对人感到不可理解和陌生，不知道人们如何维持关系、风俗和习惯——它们总是没有道理和欠缺逻辑性的，并且由于感到人们总是像动物一样玩弄自己，而觉得他们愚蠢。但是如果认为这类人不会欲望是完全错误的，它具有对消费社会的天然批判性：车不是我的欲望，而是欲望的阻碍。

把自己交给技术引导，就像是说把自己交给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秩序一样，让它去完成那个永远完不成的任务。它总是要让我们认为马上就可以完成，还债总是在明天，明天的明天，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真正的危险是在这里，完全的欺骗，一种总体的毁灭和绝望的过程。

实际上不管在哪个国家，托派分子都是操弄政治的好手，这和他们的习性有关：哪里有政治利益他们就会钻到哪里，号称这可以给无产阶级带来益处，虽然看起来更像给他们多如牛毛的组织分支带来益处。但是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它只反映了一种虚伪的态度——参与政治的意义成了去回避我们真正需要政治的地方。政治总是在政治之

外了。这并不是简单地痛斥一下官僚极权的问题，当前的政治的衰落中，人们以冷眼看待政客的杂耍。这和景观带来的诱惑有关，也和“组织”和“代表”的失败相关。只有当我们对“政治”放弃幻想，才可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孤独狼的故事并不是关于肛门、神经症和爸爸，而是关于囚禁、法西斯的包围和回不到狼群的悲伤。

狼群是小型的，以家庭为单位，个体不断出入的群体；而羊群则是盲目的、从众的。正是羊群的特性构成了法西斯大众运动的基础，而牧人作为法西斯双层运动的另一面。一方面牧人把羊群视为“乌合之众”，另一方面牧人宣称爱它的羊群，而羊群总是无辜和服从的，但总是导向一种群体的疯狂。羊群总是短视的，这是牧人的结论——它们很快就会变得残暴！并且为了使羊群成为羊群，而不是成为叛乱和游击战-狼群，所谓“神圣的”战争才被提出。战争本身成为一种目的，是为了洗清羊群的罪孽，让羊成为羊。

当前的精神分裂运动的危险就在于此，牧人-羊群的结构一直在用“羔羊”来解释狼的现象，并且把羊群的目标导向另一处，法西斯的诞生。把狼说成法西斯，就和把海盗说成帝国主义一样，是傻逼的。

当自由派提到德勒兹，我们就必须不断地提到**战争机器**，来告诉那些他们自身的错乱。全球资本主义的战争机器的可怕，不在于它承诺了一场战争，而是像勒索敲诈一样，在于它“推动和已然建立起来的极为特殊的、真实的和平。”它不再要求一个够格的敌手，而是针对“非特定的敌人”。法西斯只是那个探路的儿童，在其后更可怕的和平中，我们已然早已置身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千高原；公元前 7000 年：捕获装置）。或许是第四次（波德里亚提到的）。在今天，哪一个反动的混蛋不是摆出一副慈祥、善意的面容？但是他们又是这个恐怖秩序的推动者。

在资本的世界性公理中，无产者必须不断地摆脱资本的平面（包括官僚社会主义），才可能成为革命性的运动——重构一部战争机器，来回击世界性的战争机器——它

既非毁灭性的战争，也非恐怖的和平。很遗憾，我们当前面临的东​​西，正是一种恐怖的、和平和非暴力的运动，它就是世界性战争机器的再现。今天的社会运动，在德勒兹这里，完全印证了那一命题：非暴力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家​​长制。

#伟大的马列主义#

问：马列主义者是什么时候成为“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的？

答：合作破裂，法西斯打到家门口的时候。

根本不存在所谓左派反对新自由主义，它是一个虚假的位置。有的只是自由主义和左派续写“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的新篇章。

必须对“左派”们提出这些问题：一是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基础是什么？——它建立在上个世纪的中产阶级神话上，换句话说是资本主义的盲目乐观——所谓历史的终结之上。它代表了自由主义成为唯一的指导，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根植于政治与经济的自由主义理念。而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政治本身失灵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来源是国有化的失败。就像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国有化不仅没有为工人提供保障，反而让工厂与工人更加疏远，使工人更加无力化，正如旧工人阶级所经历的大规模下岗，本身是国有化的危机。也就是说，正是传统左派自身的失败，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局面。但如今这些人又跑出来充当导师。

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工人掌控并不等于国有化；同样的，经济理性和生产方式本身才是那个问题所在。我们的敌人，是我们在过去极力反对的人——自由派和共产党的官僚——正是在这些人的“努力”之下所谓新自由主义才成了一个问题。但是今天这些敌人跑出来满脸正义地谴责“新自由主义”，这是在装什么逼啊？

科学等于真理吗？在尼采看来，根本不存在没有假设的科学。研究科学问题，就必须肯定真理是必要的这一前提。科学不是不愿受骗，而是“我不愿骗人，也不愿骗自己。”因此，我们的科学显然提供了一种道德基石上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科学也可能成为唐吉珂德式的狂热的荒唐，成为仇恨生命的毁灭性原则。尼采并不是反科学的狂热者，相反，他反对的是科学中的一种仍然太形而上学的因素——比如机械论。一方面，正如以牛顿代表的古典经验主义，总是假设物自体的存在，其后进行计算。这实际上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认识论。那么，我们可以首先去理解“最表面和最外部”的东西，也即表象和皮肤吗？

费耶阿本德也同样提到相同的东西：“正是为了那些具有系统性又受制于事实依据的解释才产生了科学。”而那种潜伏在科学中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基石，正在试图填补“终极目的”的空白。那与宗教是同构的，费耶阿本德说，另一方面，宗教也正在尝试把科学的实证主义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之中。问题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彼岸世界的狂热，像基督教一样的虚无主义。并且，科学的宗教化的背后意

义，并不应该单纯地受限于它的认识论，比如，经济问题也一样重要。当有人提到科学帝国主义，尽管它听起来难以理解，但实际上又十分现实：优生学和人种学正是以科学来向人们勒索并谋杀的，它为帝国主义服务。自由派和新纳粹现在积极地进入科学领域，并不是一个偶然。当他们利用科普来提出暴动像”开启了地狱的大门“，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像沙织提到的，它是一种宗教布道式的营销学，和全球资本主义达成深刻的同谋。

#伟大的马列主义又一次赢得了胜利#

A：党指导人民赢得了对白卫军胜利！

B：党什么时候开始指导的？

A：赢了之后。

关于“纯粹意识形态运动”的指责，实际是一些人提倡的所谓“阶段性革命任务”以及昏庸政客的指责。根本没有谁要求所有人都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但是我们的原则和革命本身并不是可以在政客的“四面玲珑”下轻易抛弃的。关于“暴动无政府主义”，从来都不要要求高度统一性，不相信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意识形态，而且崇尚非正式的组织。当然，我并不相信这种宗派主义的划分方式，而更倾向于认为宗派主义其实是自由派治理的一个后果，一种虚假的政治游戏。在宗派问题上我是实用主义的。

我们只是丧失了梦的能力：对激进的想象只有一个问题，想或不想；对理论的掌握只有愿不愿意。现在根本不存在文盲的问题，那些总是指责过于理论化的人的虚伪在于——他们的意思到底是底层大众接受不了，还是不愿意让底层接受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们的敌人，总是全职专业化的。专业维权的，专业媒体的，专业人权战士，它们全都由制度所豢养。在这个单向的媒体里，我们总是被代表的：民工老王并不是在指代一个无名者，或某个个体，而是企图建构一个普遍的形象来占据道德洼地。它总是潜移默化地植入我们的日常生

活。这就是和资本主义配套的代表政治。我翻译文章，这是被逼的。实际上我读不懂英语。只是要想和这些混蛋、地头蛇、邪教和法西斯战斗，只能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去自我发明和虚构——像希腊人那样去创造众神，让国际战士打倒民族土鳖。

“领袖”不是有力的象征，而是一个弱点，被敌人用来分化和打击整体、收买或贿赂。一个更加后现代的方法是，我们可以虚构“领袖”，但仅仅作为一种表演。在这个媒体时代，问题不是把事闹大，而是怕事情太小，后者才是更可怕的。越激进越安全，是我们时代的至理名言。

康德的自由和他的基督教伦理观，放在今天就是我们熟知的自由派的政治正确。它的问题在于（就像尼采所提到的）概念的流动性：昨天的善在今天可能就成了一坨屎。政治正确如今反而是压迫结构的一环：伊斯兰恐惧症这个词同时被新教和伊斯兰保守派所喜爱，但是它却是流氓的

挡箭牌。这并不是说我们赞同歧视性原则，而是说我们本来反对的却被当成控制我们的道具。它掩盖了真实的问题——在一个冲突加剧的世界里，无神论恐惧症才是问题所在。那么，对道德律的服膺，真的提供给我们自由了吗？如果只看到康德——尽管他仍然影响了当代政治——那就太狭隘了。

斯宾诺莎的坚持认为，自由和意志并不相关的，“意志不能说是自由因”，无论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总是由另一个原因所决定的样式。”并且，如果我们若以自身蓄意的行动作为自由，那是成了自由的幻觉，德勒兹解读到，“人不是天生自由的，而是变成自由的或使自己获得自由。当人获得他的行动力量，也就是说，当他的努力（conatus）由一些充分的观念所决定，而由他自己的本质所解释的主动的感受来自这些充分的观念，这时候，作为诸有限样式中最有力量的人是自由的。”（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

虚无主义者说的没错：要救世才是错误的。那是自己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的神经病，要忽悠我们一起发神经。我一直觉得撒旦才应该是那个设下天罗地网的人。但现实是，撒旦先生刚出门，就栽了个大跟头，到处都是陷阱，他也要不得不“为真理而战”了。我们的时代真可怕。尼采：上帝死了，那个亵渎者也死了。

现在问题不是革命者要不要救世，革命和救世无关，而是现在要救世的太多，傻子不够用。救世是有毒的：公知最喜欢救世，关心“气候变暖”，替我们操心未来。不，我是说不要“为了别人”操心，你一操心我们的未来就被夺走了。我们的现状：没有未来。

关于 NGO：很多人倾向于认为 NGO 有助于“异见”的政治，但 NGO 本身其实属于市场化的伴生物。中国走向市场化时间并不久远，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野蛮的现象，所以 NGO 的出现一方面是为了促进市场化的成熟，一方面维护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它所带来的争议，也是市场

不开化的一个表现，也是官僚社会和跨国资本之间矛盾的体现。

实际上 NGO 是对资本和国家更有利的部门，它被无政府主义者称为“资本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很多左派热衷于 NGO 议题，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异议，而是在其中大有利益可图。就像那些左派热衷做政客一样，很多有产阶级的子女积极参加 NGO 活动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而是因为这有利于他们的政治仕途和自我发展。NGO 和它的运动作为一种西方现象，在中国似乎也找到了春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反体制运动的蓬勃，相反，预示着市场经济正在迅速地碾过传统左派完成它的野心。西方的机会主义左派（比如某些托派）如同热爱议会一样热爱 NGO，收买 NGO 来压制反体制运动已经不是一个新闻，当然这也是资本社会的常态。

很遗憾，就像出现了许多 NGO 左派一样，现在也有一些“NGO 无政府主义者”，并且这些人确实能够影响到现有的议会政治。另一方面，中国的左派一般都是“人傻、钱多、速来”的状态，接受不了新事物，更不用说对新状况有所反思了。即使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仍然对此反思得不

够,仅有少数的回应。稍后我会翻译为数不多的相关文献,以供革命同志学习参考。

“请愿、游说、寻求反对党的支持、向国际委员会祈求帮助”——NGO 活动家的几样法宝。如果你关注过网络上一些傻逼左派特别是一些托派,那么就会对这些手段在熟悉不过了。只不过你可能无法建立这种联系:那些号称革命的人和资本家资助的组织有关。

实际上,这些人必须为他们的失败负总责。比如说东莞裕元鞋厂的大规模罢工,或者类似的香港码头工人罢工的惨烈失败,全部都和这些杂种有关。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把工人交给中产阶级社会的“关怀”,从而使罢工本身被消解,沦为政治游戏的一场闹剧。这些杂种不但坑害工人,而且还连带着政治手腕想要对其他派别进行或明或暗的斗争或同化。一方面装模作样地让人发表意见,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塑造一种无政府主义者只会站在一边高谈阔论的形象。在这种格局里,你谈什么都有一个注定失败的前提。这像其它反动派支撑的运动一样,道德作为武器或用来扼杀政敌。但 NGO 杂种真的能博得社会的同情吗?一次又一次哭诉老板的无情和“残酷的”镇压(根本无法和真

正严酷的环境相提并论），但永远换来的是背后的冷眼，很明显这只有在一种极端虚伪和无药可救的社会大概才会有效。其实它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那一套，但重要的是，让斗争者自我矮化以及建立一套道德准则。

全世界的 NGO 和职业投机分子都是一个样。特别是年轻人应该警惕：NGO 是一个具有公司管理体系的组织，它的工作人员享受工资待遇，而底层活动者连公司员工都不如，是免费的，要在所谓“反抗”中再次受到一遍剥削。

凸显自身的弱点、残疾和受害者的模样，并以此来作为卖点，仿佛这样可以博得同情或者证明这是个有良心的社会。它对自己的作品“农民工”也是如此教唆：以退为进。良心就是他的营销手段，而农民工是“可以被救赎的羊”。有良心的，总是那个老板。整个所谓公益事业都是老板出的钱我们暂且不谈，最喜爱这一口的是中产阶级，感情投资可以让他们通过这种工作年薪上百万。这就是一个总体腐败和堕落的信号：它总是先从道德教化开始。

NGO 的策略其实就是全球资本主义或“三驾马车”的策略，无论马其顿、科索沃还是非洲，这些地方面临的问题

题和中国是一样的。并不是说其他地区的经验在中国不适用，如果你观察过 NGO 在中国劳动纠纷的表现，那么必然产生某种共鸣。

我其实讨厌摇滚乐。只有异常堕落的人，才会谈论什么蓝调布鲁斯和摇滚精神。黑金属或黑暗电子乐才是王。

关于库尔德运动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所谓的“反对大企业”其实是一种修辞，举个例子，中国也反对大企业，但它自己就是个企业，或者从不反对民族企业。就像国际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声明提到的，卡扎菲的绿宝书言辞要更激进，但有谁相信它会在镇压系统下实施呢？

PKK 表现得非常机会主义：第一手是拉拢伊斯兰主义者，说要把库尔德斯坦伊斯兰化；第二手是把自己宣传成世俗的进步力量，赢取西方自由派的欢心；第三手是革命形象的塑造，以此拉拢革命左翼。这一整套，都是一种政

治营销战略。显然 PKK 是打了一套组合拳，恐怕“DSA 值得肯定”这种话都要收回——压根没有革命的情况下，它和州政府起到的作用无异。工人和农民压根就没有属于自己的组织，PKK/PYD 一直控制着一切，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是迟早的事。并且，这引申出另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进步主义的批判。就像在阿富汗，是塔利班在帮助贫农，这说明以进步力量自居的自由派们，在本质上是和封建保守势力合流的。在库尔德问题上，进步人士起到相同的作用——女权、多元文化主义、开放的民主，这一切换来的是让部落的领袖进入统治阶层。即使是 ISIS，也一样有全部都是妇女的部队。

什么是进步人士？从字面上理解，是渐进的、改革的。进步人士总是说不认同它的就是保守势力，但在事实上进步人士却和保守派站在一起。正如本雅明提到，法西斯是对进步的模棱两可和狂热崇拜。要知道，整个法西斯运动都是从改良派分裂出来的。

每次听政客们的演讲，特别是听到要维护中产阶级的社会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是在说，“闹闹，开饭了！”

“左青”其实早就是傻逼的代名词了。说自己是左青就好像说自己智商低于平均水平一样。

欢迎来到成人的世界：这里有精神病、瘾君子、匪徒、黑客、流浪汉、宅男、电竞选手各色人等，还有贫民窟青年，左青是个神马玩意？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要做一个挺起胸膛的人。

给大家讲个笑话：左青。

左青对我们的事业完全是一种侮辱：头脑不灵学业也想必普普通通，大概唯一的优点是听话，读了点马列毛托就觉得可以为“革命”出一份力了。但现实是这些人一般都被当成枪用，听听到底是什么样的杂种在鼓吹“左青进厂”你就完全可以明白这背后有多么险恶，而左青用他无知的同情侮辱了所有人。

我们必须明白现在是 21 世纪，说实话，这类人即使到我这里报名，要不要这类废物我都要考虑考虑。绝不是鄙视普通的或资质平庸的人，问题是我们的左青在思想极端幼稚、在知识上极端肤浅，可是他们却有着那种知识分子的自觉，觉得自己可以凌驾于社会底层之上（真正傻逼的地方就在于此）。左青跟他妈领导一样，仿佛来到底层是体恤民情或者来体验难得的经历。但实际上是小催一样的玩意，他最大的价值当然不是他的劳动力，更不是他能够组织罢工这类任务，而是把他在大学里感染的意识形态和奴隶制度之间做一个连接，完成他成年后接受的第一次社会教育的同时把最新的管理创意回报给领导。

左青，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极端虚伪的一个写照；左青，是他妈一个耻辱和没落的象征。我说，让我们告别幼稚吧，让斗争的文化走向成熟，前方还有更加艰巨的任务在等着，没有时间玩过家家了。

左青这个笑话让已经让我笑了一整天了，根本停不下来。现在我开始厌恶自己了。

早就该终结马列主义的精神错乱了：这些人一面哭嚎着反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一面痛斥一下“个体自由”然后捎带着把无政府主义者也归为一类。注意，这绝对是一个虚伪的态度，马列主义根本不反对“新自由主义”，它早已是默契的盟友——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构成要素。

工业化、国家资本主义和“进步价值”，这些马列主义的核心要素本身就是当今资本主义无数形式中的一种，他们怎么可能去反对这个总体的秩序呢？——这是歇斯底里的。我们必须搞清楚问题的所在，“新自由主义”的土壤在于革命本身的失败和投降——是革命者和资本家一道完成了他们“进步”的普世价值。

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和革命者自身有着直接的关系，并且也是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马克思的学说以及一些“阶级分析”也从未跳出过自由主义的范畴，“理性人”的假设也从未被打破。这些统治的“科学”，难道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武器吗？在他们嘲讽古典无政府主义仍然继承了“平等、博爱”的精神的时候，真正该审视自己的自由主义之根的，是马克思主义自己。让我们认识到，当前没有什么“背叛了革命”，而是他们的革命本身如此。全球治

理、一带一路、科学发展，这些东西资本家本身就认同，是革命自己参与了全球治理的谋划。

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最剧烈的抗争发生在那些被排除在“科学”之外的群体。在中国，它叫做农民工、失地农民和留守孤寡。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马列主义口号喊的越响，这些人的处境就越加悲惨！

尼采说，笑得最响亮的哲学家才是好哲学家。这种笑，就像指出蝙蝠侠的鼻子长歪了那样，或者指出所有伟人每天晚上都搞鸡奸一样。整个政治领域，那些政客、托派或法西斯一样的政治动物，仿佛每一个动作背后都掩盖着一个惊天丑闻。大笑，就像过年放炮一样，让他们无处藏身。尼采应该出个冷笑话集。

天使学的存在是为了延续教廷的统治，这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或犹太教的不同。我们要证明的是，这种牧人-羊群

的治理形式在今天仍然发挥作用——不是官僚协助上帝实现在大地上治理，而是利用上帝在大地实现治理。波德莱尔说为了原始之光显然不是说要进入天使的治理行列。他拒绝天使们的邀请说自己是为了原始之光，是因为他在别处发现了作为诗人的意义。这个意义不再是天使通过赞美权威来延续自身了。波德莱尔重新发现了撒旦。

——天使的惩罚，哎呀，正与他的爱相等，他用巨拳狠揍着那被革出教门的人；但这该死的家伙还是回答说：我不愿意！

波德莱尔拒斥天使们提供的席位，转身赞颂了另一位堕天使：“啊，撒旦，请可怜我漫长的悲苦！天父嗔怒将众生赶出地上乐园，是你成了他们的养父” ... “撒旦，愿光荣和赞美都归于你，在你统治的天空，或是你失败后沉思不语的地狱深处！”波德莱尔对撒旦的重新发现，代表着诗人摆脱了对天使的依赖重新发现自身。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个对“撒旦-父亲-光”的想象，确实相比精神分析-马列主义的俄狄浦斯情结，走向另外一条路。这另一条路就是尼采-德勒兹提到的反俄狄浦斯。这正是波德莱尔的意义，对地下君王的赞美是已经不是为了延续自身了，而是

对自我和诗歌以及生命的重新发现。或许在这以前，它确实有凌驾工具的作用，但是波德莱尔重新塑造了诗歌。

德勒兹这样描述政治，它是“一个孤儿，就像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政治在事物的下方流动，是“前个体”或“自我的蛹的状态”，一种活力。换句话说，当前的政治实际上是对政治的镇压。尽管在哲学上不同，但朗西埃和德勒兹在这点上意见一致——“严格说来，政治是无政府主义的。”因为这并不涉及到组织形式上的争论，而是政治的首要基础。政治只能在政治思维、公正秩序、政党或国家之外，“铲除施加于生命的强权。”

就此而言，这在革命者与投机的左翼人士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我们面对三个主要的内在危险：把政治理解为制度的延伸（所谓的参与民主），一些人极力地混淆它与革命的区别；从既定的政治秩序来谋划未来（投机的风格）；以及政治实现后的再结域（国家、资本与政党的重构）。

关于希腊的一些讨论：有同志提到希腊人民很“淡定”的问题，认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投票激进左翼联盟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但他们不去相信它。——我觉得这种意识形态批评很好。但是它显然有更多的局限性忽略了更多严重的问题，让我们超越齐泽克或拉康，来完成更广泛的批评。

我们在希腊失败了吗？其实承认与否都言之过早，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绝不止希腊一家。齐普拉斯政权在背叛群众的选择后，支持率反而上升，这是如何可能呢？你可以说我们的影响力仍然太小，或08年的暴动没起到效果。但其实这与当前的一些主流“反抗的”伦理关系密切，我们从未认真地审视或敢于批评过。当前整个反抗的伦理其实本身就是基督教的伦理，并且它影响了很多运动。这也和左派的中产阶级化有关。就像 Gilles Dauvé 提到的，革命总是“在那边”。他们总是抗议，然后心怀世界，到处都需要人道的同情——让我们反对伊拉克战争、占领华尔街，Rojava 革命需要爹地的爱……

难道当前的这种反抗，不就是正在迫害我们的东西吗？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结果究竟怎样？占领华尔街恐怕最大的收获是可以吹嘘“你爹我也占领过”。

他们不是说要终结这种压迫，而是说“让我们挽起袖子做些什么”，一个菜园。也许掀翻帝国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是咱们热情地声援了 Rojava，基督爱库尔德。让我们试想，即使所有希腊人有了极高的觉悟，一个“雅典公社”呼之欲出，那么我们会得到什么？缅怀革命前辈的主题公园？同一招数用过一次难道还要使用第二次吗？希腊的处境在今天并不简单，德国人的态度也十分关键。而且这还取决于欧盟其他国家，甚至是我们自己——让我们不要像美国人那样心怀世界。

同情的关怀是令人恶心的，革命者尤其不需要它。我们也不需要理会假左派们说些什么，我们的反思建立在以前的革命上，所以我们才会有新的革命。至于那些提到齐普拉斯支持率意外地上升的人，恐怕没有说的是，整个政治的参与度正在进一步下滑。

控制:我想要了解自己关心的知识,但是社会不提供,书店里全是病毒和流行歌曲,流通途径给你堵死,用金钱给你限制死,用语言给你隔阂死,用学院的围墙给你圈死。直到有一天我也忘了自己到底想了解什么和关心什么。

我们失去的绝不仅仅是革命的知识,除了野外生存、种植、制造、爆破的技艺、巫术、魔鬼学,更重要的是历史正在向我们关闭。就像德波提到的,那些重要的事件,从我们的记忆中被抹去。再也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它带给我们什么教训。这使得革命者看起来,就像是个秘密特工一般。

已经不存在什么总危机这一说了,因为现在危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动力。对总危机的迷信,其实就是孤寡老人盼望海外儿女归来的那个执念,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但是邻居都不好意思告诉他们那些儿女都死在了外国,但是即使说了,孤寡老人大概也不相信,总之有个活着的念想——总危机就是左派的自慰道具。

问题在于，现在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给我们留下的作为毒品的“激进”里了，吸毒的短暂快感是对改变世界是无益的。需要看到危机，而不是等待危机。今天真正的小资：马列斯毛托心中留，阶级斗争我最熟的那些鸡巴人。

比警察镇压更可怕的是批判知识的镇压，如今在惩罚蔓延到了监狱之外。并不仅仅是生产镇压了我，在生产之上的是知识。真正令人恐慌的不是批判知识改造了社会，而是让我们服从它的定义，让我们活在制度的导师的淫威下。正如“人”这种东西消失了一样，它被塞进太多装置，爆炸了。如今我们受到惩罚的理由是，我们没有遵循知识的预期，不符合科学和规范。疯狂和失常者代替原来的无产阶级，被这个社会抛弃在寒冷和黑暗的荒野中。制度无情的运转制造了它自己的敌人，冷酷的恐怖分子。人不受制于经济游戏本应是常识，但现在却显得十足地反常。

所谓的资本主义制造的主体，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在过去它被视为解放的希望，但是如今，它成为资本主义的人类机器。难道这不就是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现状吗？我们不断地被机器抛出，成为主体之外丧失资格和毫无尊

严的存在。制度的导师从不吝啬他的惩罚，大喊道，这是食利阶层的贪婪和流氓无赖的疯狂。

名词解释：

政治正确——法西斯标榜自己是反法西斯。

左逼和进步人士——说的和做的是相反的。

基督教伦理——不断推陈出新，大家都愉快地欢呼时代“进步了”。

好人——让别人成为坏人的人，现代社会的寄生虫。

进步的臭虫——可算找到机会发表正确和有良心的言论啦。

马列原教旨主义——麻风侏儒在中国，觉得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

究竟有没有异教法西斯呢？我想我们必须理解法西斯的运作方式，极端的机会主义，一种来自保守力量的统治策略。也就是说，假如一种既定权威可以利用，法西斯就会利用。之所以反基督成了对现代社会的颠覆，仅仅是因为它占据了主导地位。

要注意到，不论是非洲还是中国的统治阶级都有过本土法西斯运动，但是它们都为同一种秩序服务。即使是“进步主义”也一样可以被法西斯挪为己用。这不仅是保守的体现，也是一种启蒙的悖论：如果启蒙本身是权威，那么谁来颠覆法西斯对权威统治的利用呢？这在一神教中的表现最为明显，基督教只是打了一个头阵，随后还有伊斯兰和犹太教的法西斯运动，最后是亚非拉的法西斯运动，一个阶梯状的分布。法西斯确实就是一个肮脏的侏儒，躲在权威秩序宣扬的“正义”、“善良”的背后，去博得脑回路构造单纯的贱民的欢呼。

这也是我们当前的“反法西斯”悖论，如果反法西斯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法西斯也会跑来反法西斯，至少在表面上如此，尽管这种“反法西斯”从来都没有反对过统治秩序本身。而我们当前政治中最肮脏和最卑劣的手段也不

过如此：法西斯反对法西斯；革命过去的敌人，现在变成了“革命先锋”。

要远离道德侏儒和贱民，鞭子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人和人不是“天生平等”的，特别是解放和统治本身就不在一个平面，因而也不平等，是统治者让我们相信“我们和法西斯是平等的”，但它永远不是一个事实。

一个**微观政治**是什么意思？是我们搞搞“小运动”不搞大运动，小资地艺术一下吗？脱离当前的政治现状去谈，只会是狗屎。我们需要微观政治，是因为在自由派的统治下，大运动是瘫痪和无意义的。在当前的“运动中”，法西斯开始“反对法西斯”，那么我们只能在大前提下去反对分子层法西斯，这就是微观政治。

批判的意义不在于学院化，德波的警告是，必须警惕对景观的批判也成了景观。这涉及到用行动去重塑空洞的运动，以及我们如何重新发现自己。并且，我们必须明确地拒绝一种机会主义观点，既不谈论遏制微观法西斯，也

不谈论颠覆的生成，仿佛革命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我们的激进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把左翼激进思想当作一种资本，对反对社会现状的作用为零；要么是拒绝激进，充当思想警察，反知识分子是因为要维护传统知识分子（马列主义的风格）。要知道，在今天根本不存在文盲的问题，无产者本身就是要超过这些无赖一般的“知识分子”，把它们一脚踹走！

究竟是谁正在惧怕思想呢？是统治者，还是那些号称自己是“左派革命者”的小知识分子，或者他们都一样？只要你一谈论什么激进理论，他们就说你是书虫，说你是装逼，给你扣个什么“后现代”或“流氓无产者”的帽子，可是他们知道什么是后现代吗？究竟谁是流氓？也许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是那个流氓，我高中都没有毕业，而那些天天在无产者面前装逼的人说我是知识分子。

今天的全球内战早就脱离“家-城邦”的范畴，正如阿甘本说，在这个“反恐”的恐怖主义统治中，只会出现赤裸的生命。家庭早就遭到了挑战，这时俄狄浦斯分析仅作

为一种镇压的方式发挥作用（无论怎样都是家庭），它也根本解决不了谵妄的问题：“当我寻找与我最相反的人时，我遇到的总是我的母亲和姐妹……”（德勒兹；《谵妄：世界是历史的，而不是家庭的》）

到底是什么令我们如此不安呢？在俄狄浦斯的分析中，不知道法西斯运动之下潜藏的愤怒是什么。每当法西斯出现并获得底层认同，都意味着一种愤怒无法被代表，然后被转向错误的方向。俄狄浦斯现在成了一种制度对自己的辩护，一切错误都是来自父亲压抑！不知道什么叫做全球内战和全球暴力！

为什么那些“进步”人士，突然要找出一本陈旧不堪的用弗洛伊德诠释法西斯运动的书籍并且重新翻译呢？我想我们必须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在政治中没有偶然。这些人做了什么，那么一定是对我们有害。它无非就是重复一些陈词滥调：“这些家庭都像我自己的家一样，都多亏了人权宣言！”

所以如果我们用俄狄浦斯去压抑对社会的不满，这和法西斯的做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反法西斯”的那个人，还是法西斯。

欲望：快感和享乐只会扰乱和中断它展开的过程。我们如何在当代社会既认为欲望由快感-缺失构成，又认为基于它的批判可以反对资本主义呢？——批判症状，就像抓住资本主义的屌毛玩弄味道。

权力意志和欲望，是追求快乐的能力。一个受虐狂不是要获得快感，而是快乐。一个深渊领主的意志是接受痛苦和不断去战胜的快乐，一个现代人或地狱杂兵，才是享乐的俘虏。

德勒兹/尼采：性只是欲望之流中的一股。男人和女人的爱，怎么可以像肤浅的现代人那样？我们要爱到彼此以外的地方。如果“把爱看作是两人之间的关系[...]这多么令人沮丧啊！”

在今天探讨欲望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就像德勒兹说的，不想被奴役是一个非命题 – 被捆住的人只能说我不想被捆。欲望的内在才是革命，一个集体的装配。在以往的革命中并没有完成这种创造，我们需要这样的反思。并且，这难道不正是巴枯宁想要但没有完成的自由意志主义的集体伦理吗？

颓废：总是有所保留，而不是激情地投入，去策划自己。在消费社会和互联网中，我们都是颓废的人，今天和明天，游戏或商品，生产和消费，学术或理论，都成了麻醉剂，让我们有无数去保留的机会，在持续的危机中持续地休闲或工作。

消费，买和卖，每一次“公平交易”就像给自己上了一个让自己安心的保险。消费可以是激情的，但同时也总是有所保留：我可以每月花光自己的钱，但是我保留了“我”和与之相关的一切还有心底的小希望和小美梦，明天会更好。

不彻底的理论态度也是一种磨损。更多的理论，更多的态度，成了我们总是“有所保留”的借口。半死不活，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一直处于半损耗和半修养的状态中。

即使是拒绝也不能够摆脱。我们总是在制度面前被迫地滔滔不绝，到处都是反动，到处都是幻影、幻听，还有对自己的憎恨。对每一个愚蠢的问题，都必须长篇大论才能解释的清；每一句话都被导向其他的意思；或者更直接地，进入木僵状态。

由于总是缺失，所以总是被主导，被塔利班、美国或商品景观。即使颓废者有一天真的去策划了自己，仍然是有所保留的，彼岸来世更美妙。电视新闻又广播了恐怖袭击，反恐策略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恐怖分子和精神错乱的疯子充斥了世界。反动分子发动了又一波舆论攻势。

究竟是一匹狼还是七匹狼呢？直到有一天，精神分析专家发现精神分裂患者是一个家族；安全部门也真相大白，难以追踪和渗透的恐怖分子是也是一个家族。是缺失封住了他们的嘴，把一切颓废的和激烈的都关进了关塔纳摩。

21 世纪确实是德勒兹的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总会产生精神分裂。我们的统治者一边颤栗地哭嚎“独狼行动”是一个威胁，另一面阴险地利用和扶持法西斯及宗教极端势力的摧毁任何斗争、监控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统治者向来不掩饰自己的肤浅和平庸：11 月 1 日起藏有所谓的“恐怖主义书籍”将是违法。

大约一年前西班牙政府展开反无政府主义的镇压活动，逮捕了数十人，今年 11 月又有五人。他们遭到监禁的理由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恐怖主义团体“GAC-FAI-IRF”，但实际上没有相关的责任声明使用过 GAC 这个缩写，它只是一本书的作者（与 08 年 Tarnac 事件和隐形委员会类似）。

再也没有人比德勒兹更了解我们当前的状况了，我们在新一轮的反动中应该学到什么呢？在世界性的战争机器面前，我们面临的是一整套反游击战措施，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今天它更多是预防性的并且针对“非特定”敌人——逮捕无政府主义者，仅仅还是一种“掩护”，借此建立针对非特定敌人的治安才是目的。

如今大多数人都是像贼一样被预防：还不知道什么叫革命，各种工贼的渗透，治安策略的实施，反动宗派的统一口径，整套宣传机器的攻势早就安排好了。它不再针对某一特定敌人（个体、群体、阶级、民族……），预防性逮捕在今天是在战争机器建立的“可怕的和平”及其“安全”概念的物质化的战争手段之一。

无政府主义者一般**反对投票**，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投票就做了无政府主义的事。“不投票”是一种运动，它是宣称投票没有意义，不管左派还是右派上台全部都是一回事。并且运动的意义在于团结的演练，在于如何组织我们自己。不投票，但必须要组织起来去斗争，否则“不投票”也是空洞的。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跟敌人决裂呢？因为最反动的力量也来自“运动”，法西斯也是一种运动 - 保卫社会运动、战争运动、排外运动。它需要运动，但却不需要运动的实质，所以这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关系和“团结”。革命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决裂中，去重新声明自己。

全世界的这些网络法西斯仅仅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在今天，“全球起义”绝对不是什么空谈，在08-12年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法西斯绝不是凭空冒出的，在所谓“历史终结”的时期，左派和右派早就达成合谋的阶段，新的运动形成了新挑战。穆斯林在这里只是当了替罪羊。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安全的位置，我们都是不断被驱逐的异乡人，安心于某种亚文化也不行：有一天你听到统治者为自己的战争辩护说，他是为了保护你异议的权利；傻逼们说，是“民主世界”和资本主义培养了它；令人悲伤的是，然后有一天你绝望地发现，CIA开始资助你的亚文化。

这才是所谓“文明”，它不断地驱逐一些人，来圈占一个立场、一片土地；这才是斗争，在不断被驱逐的处境中，发出绝望的突袭！进入微观，不断流动并不断地生成那一称为“霸权”的战争机器。

“弱势群的特性就是要利用一种不可数的潜能，即便它只由一个成员所构成。这就是多元体的公式。”（德勒兹；千高原；公元前 7000 年：捕获装置）

当弱势群被转译为可数的集合或子集，就会进入强势群。成为强势群，那么它宣称代表的群体就得不到充分的表达。不管我们是男还是女，都要去生成女人；不管我们是白人、黑人或黄种人，都要去生成非白人。

生成多数和强势群意味着，我们的敌人在今天用多数、代表或工人的名义反对每一个人，这才是用工人反对工人的逻辑。它垄断能指来形成官僚制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资本家最反对“群众斗群众”，代表大会的代表门和资本家已经垄断了“群众”这个称谓，和古代的国王说自己是人民一样。

要注意到一些行动并非是因为具有某种“理想”，也不是某种“幻灭”，相反是战斗本身赋予的快乐！

关于革命虚无主义的组织观念是这样的：包括许多不同背景的团体和个人的实体，大家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有

着共同的批判和战胜它的共同承诺走到了一起，通过城市游击战来创建一种“立刻的自由”。——需要注意的是，它有一种异质性原则，尽管彼此不同，但同时这本身也是一种方法，本质上又是一种特殊的个人主义。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勒兹所描述的当代社会的斗争形式，并不存在那种同一的意识形态指挥，在某一刻人们会通过平滑的平面而形成某种无定向的集合，并生成反击性的战争机器。群体之间不已多寡来区分，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不可数的集合和子集，同时，也创造新的道德谱系：

“一堵松动的墙，未粘合的石头，其中每一个元素都在自身中有一个价值，但也涉及到其他的。”

我们面对的是当代社会的广泛战争状态，它由世界性的战争机器所驱使，只是当它演绎出来那一刻我们才对此感到震惊。它被塑造为“国际恐怖主义”，但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反恐是一种治安策略，针对非特定的“内部敌人”实施。而当前的战争状态，又是资本主义公理层面的冲突。资本主义公理的冲突，被描述为日常生活的失范，因而所

有罪责全都要由少数和边缘人群，面临更多的监控、更多的军事化社会占领和国家紧急状态。

现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姿态往往是虚伪的，因为主权秩序恰恰建立在恐怖主义之上，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原来的恐怖分子们，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解放英雄，甚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公理层面的斗争总是在暴力立法中不断地合法化自己。这就像朱利安·顾巴在采访中谈到的：“没有什么允许你解释为什么阿尔及利亚情报和安全部门涉嫌策划 1995 年的那波袭击，而没有被归入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没有什么能让你解释恐怖主义者突然转变成具有解放姿态的英雄，变成埃维昂协议（Evian Accords）的伙伴，变成伊拉克警员和“温和的塔利班成员”，他们根据美国战略声明突然逆转。”

现代人就是这样，为了自己的偏执、幻想、利益、享乐或者为心灵创伤寻求弥补而总是选择那套适合自己的谎言。大概像查拉图斯特拉宣告上帝已死那样，去宣告控制

我们的系统和现代文明其实已死，只是我们仍在用幻想支撑着它，来点古代武士、游牧民和高贵野蛮人精神才有救。

软弱，短视，虚伪和色情在今天都被发挥到了极致，同时这个社会又显得特别脆弱，使得所谓的“恐怖分子”仿佛很轻易就能制造一个“大麻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革命应该像德勒兹说的那样是一件“征服”式的工作，你没办法在烂泥里搅和出结果。

而我到现在都只是一个侦探，解密人。我既没有去承担虚无主义的否定，也没有去承担变形后的肯定，因此我成了一个客观的人，一个（特别是对女人）无用的人。

对**虚无主义**的在探讨以前自己的理解过于肤浅现在从德勒兹的角度来看：现存的“谴责虚无主义”实际仍然是庸人“想要统治”的姿态，因为他本身就是这种虚无主义的继承者，对虚无主义的谴责和否定，本身还是虚无主义（作为现代国家的主流）：对生命的否认，对价值的颠倒——奴隶和主人、高贵和低贱的颠倒。

虚无主义是通过“堕落”来传播的，使所有人生成—奴隶和病态，也就是成为希望统治的人。我们现在的主人，是从普遍的生成—奴隶中获得胜利的奴隶：欧洲人、归化的人、小丑。我们的领袖，通过传播卑贱来获取自己的胜利。这时权力意志成为胜利后对权力的行使。

尼采把概念戏剧化，使概念演出和变形。在虚无主义的演变中，在末人之后是想要死的人，在这个虚无主义的圆满时刻（午夜），下一次变形才准备就绪。——我们不得不回到末人和想要死的人那里，去承担其“肯定”的责任，使“否定”成为肯定之人的存在模式。

变形是对肯定和否定的颠倒，但它必须在虚无主义结束时才可能，我们去找末人和想要死的人那里（这时才是积极的虚无主义）是因为否定最终必须抵制反动的力，使之服务于肯定。那么才完成对虚无主义的征服，这个工作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末人说一切皆无，一切最好被动地消失，要的是意志的虚无而不是虚无的意志。但是这一分裂，使虚无意志把矛头对准反动的力，成为否定反动生命自身的意志。”

在末人之后，是想要死的人，而这一刻为下一次变形准备就绪。

想要死的人的下一次变形，是“力的主动生成，权力意志中肯定的胜利。”但否定存留下来，作为肯定之人的存在模式和激进性，”仿佛伴随着创造的总体批判。因此，查拉图斯特拉是纯粹的肯定，但也是把否定发展到制高点的人……”

尼采的意思是，主动去生病在克服它这一过程是激烈的，而不是在症状里去激烈。查拉斯图拉的两个形象：生病的、惧怕永恒轮回的，和征服的、肯定永恒轮回和生命的。

这是尼采不同于辩证法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侏儒的魔法：齐泽克尽管看似进入了“危险”，但他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者；而尼采从错误出发，发明了新的正确。

只有想要统治的人才会用德性束缚别人，无论多么“善良”的姿态背后都是空洞、短视和卑贱。就连所谓的“正义”的姿态都是从欺骗中获得的廉价造型，仿佛正义全藏在自己家后院的地洞里！这样的贱种，又拿什么来说自己是有“尊严”的？

真正的尊严是不向任何卑贱低头，即使是革命斗争本身也必须防范自身被卑贱摧毁。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是战士不屈地去战斗的生活，一个有尊严的态度是向太阳一般的给予，而不是利用同情去索要，一个有尊严的人超越善与恶且不需要回报！

尊严，是在法西斯猴子疯狂的扫荡时，我不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而破坏整个行动，把自己的愤怒转化为敌人被摧毁的动力；尊严，是面对滥施权威的奴才时，一拳打掉他的门牙；尊严，就是攻打法西斯总部的时候，把己方的旗帜插在他们脸上。

尊严，是无悔。这是尊严：革命仍在，革命将在，革命永存！

痛斥右狗除了宣泄情绪外意义不大，因为更险恶的地方还在别处。左派和右派在今天实际上已经没有区别了，或者说，它们之间的认同大于分歧。右狗的法西斯我们总是能轻易指出，但左派法西斯却总是能获得认同。

必须明白什么是当代政治：激进意识形态作为治理方式。你说自己是左派是右派，是无政府主义者、是马列主义者或自由派实际上相当于什么都没说。今日和过去的不同在于，政治理念丧失了激进意义之后被用作伪装激进的方式。治理的技术是让你成为想要成为的，但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小知识：无政府主义者在以前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一样使用红旗。黑旗的流行是在巴黎公社陨落之后。1882年3月18日，在纪念巴黎公社的公众集会上，路易斯·米歇尔做出了如下公告：“红旗不再适合了；（无政府主义者们）”

应当举起痛苦之黑旗。”[Edith Thomas, Louise Michel, p. 191]
隔年她把言辞转变为行动。

对**语言游戏**的回归不是赠与，而是通过辩证法向反动生命的回归，是在扯淡之中褻渎大地。这一切都是与媒体的共谋。就像“工厂”不是一个绝对的空间一样，城市、语言、监狱如今也不是绝对的。问题是如何挑战。

“管理混乱”。我们说统治秩序制造了混乱（战争、谋杀和动乱），只说对了一半。让酒神发挥作用，难道是说像“最后的人”那样去发明一种幸福，没有牧羊人的羊群吗？每个人都各自扯淡，叫做“表达自由”吗？不，它仍然是在“管理混乱”。要让混乱发挥作用，就必须反制那一管理。

“管理混乱”就是当前的治安模式，就像罗马教廷管理“异端”，监狱犯人每天放风。监狱不是绝对的，就像波德里亚说，我们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被传讯：我们都是疯子和罪犯。这就是辩证法对统治阶级的“积极意义”。

就是当前的一些反思：“管理混乱”在社会层面的实施，最直接地发生在暴动中，就像希腊的暴动：自由派的一个治理策略 – 做你想做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对辩证法的化身施蒂纳做出反思。问题不在于暴动是混乱的，而是它被管理。

并不是说反对牧人就可以解放羔羊。羔羊本身就是一个嗜血的形象。《启示录》的约翰要一直“宛若是被杀死的”羔羊：“但我们从未看见它被杀死，我们只看见它无以计数地杀害人类。甚至当它最后穿着一件胜利的血淋淋的衬衫登场时，那血也不是它自己的血……”

羊群的欢呼：我们要成为“最后的人”，给我们幸福。难道没有人发现这个可怕的事实吗：每个人都想成为野比大雄，这样就会有一个温柔体贴教人积极向上的蓝胖子无处不在地把自己监管，国家权力赋予你日常便利，作为交换你只要成为野比大雄就好了。最后，是羔羊的婚礼，你可以娶到静香，赞美无上的权柄。

游击队员是反羊，是生成的狼群。他必须去完成既定的目的，才脱离了“管理混乱”。去赢得战争的胜利是战

士的高贵，为超人回归大地而使自己走向没落，是牺牲；
走过桥梁，让混乱发生作用，是革命。

2016

需要对尼采同时进行法西斯和革命者式的解读吗？我认为这里忽略了重要的问题：除了妹妹福斯特-尼采造成的误导，尼采从未与法西斯这种政治层面的事务相关过。因为尼采提出的是一种关于前-政治的政治，一个意志的问题：它是一个蕴含着可能的蛹，或在事物下方流动的流。

Francois Laruelle 的错误在于：尼采确实提出过一些观点，比如建立等级制度。但这种等级制度，是一种意志的等级。它并不单纯地指代让某种次要的法西斯从属于革命者，因为意志的等级在革命者内部也出现。

必须结合尼采的语境去理解这种“等级制度”，它的提出针对的是天赋权利的平等这类启蒙话语。换句话说，

理解尼采反对的是什么：正义的目的决定手段的正义、没有牧人的羊群、男性塑造出的女性客体、基督教伦理。正由于现代性造成意志的虚无——也就是“占卜者”预言的所谓末人——意志的强度才被提出。

我们必须反对海德格尔。尼采的妹妹和纳粹删去很多作品中重要的观点：反对现象！反对吧“外观”和“实在”相对立，与“逻辑真理”相对而言的外观本身就是实在。抗拒进入一种想象出来的“真理世界”，这种外观-实在的名称就是权力意志；“肤浅”的意思不是宽广的延展，而是“狭窄的深处”。

另外尼采仇恨女性吗？实际上尼采对女人的观点是超越现代的，他的看法实际上是一种女权观点：“是男人把女人毁了。凡女人所缺少的东西都应在男人身上补偿和改进的，因为是男人为自己设计出女人的形象，女人在按照这形象来塑造自我。”看到了吗？尼采说：男人毁掉了女人，因为男人在意淫！

鲁滨逊反常吗？实际上他的行为可以说是健康的，但是在“对世界和欲望的矫正”中鲁滨逊才反常。这是因为，在小说和反常行为的研究里，一直在尽力展示一种“反常结构”。拉康一伙人坚持认为根据结构来理解反常，因此反常者总是带有“弑他性”的。

在结构里，不管是对客体的欲望还是对他者的欲望，都是一种对可能性的欲望，因此在弑他性的反常者那里，世界便没有了可能性，可能性被谋杀了。世界不再有必然，只有豁然；世界没有未来，只有当下。

德勒兹的观点是，鲁滨逊并未真反常，而且很健康。在反常结构中鲁滨逊只能是反常的，并且反常是他唯一的可能性。反常是因为缺少一个结构他者，这个位置由真实他者弥补。弑他性并不经由反常行为展开，因为弑他性本身就处于反常结构中。

是图尔涅的小说在展示一种反常结构的存在，并且在此暗示：我们不得不把鲁滨逊想象成反常者！（德勒兹：《论他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结构，我欲望一个客体，我喜欢一个女人，在那里我才找到所谓

世界的“可能性“(春天来了)；而反常结构又确保了“反常者”的弑他性，使之成为一个没有可能性的世界——我喜欢你，但跟你在一起没有未来。

是结构让我们没有未来。但为什么我要关注未来而不是当下？我们的激进什么时候倒退回设想未来，而不是消灭现状？

一个白人小伙爱上一个伊斯兰女恐怖分子，是的，没有未来。但是爱此时也激进了：两个人就像策划一场战争——如何对付家人，如何对付邻舍和同伴，坚决把一个更高的战略贯彻到底。这时爱才高贵起来，欲望被矫正，不代表快感而是快乐！

弑他性不在反常行为中，但在一个反常结构中我们总是成为反常的和弑他的。

弑他性在拉康那里被理解为剥夺了他者的存在属性，在德勒兹这里被理解为取消“结构他者”也就是“规避主体和客体的一切先验性”。另外德勒兹的欲望理论来自尼采（参照《什么是欲望》）。

法西斯是什么？怎么反对？这是重要的话题：法西斯不仅仅是某一个标榜为民族社会主义的激进右翼党派。墨索里尼在“罗马进军”最后得到权柄，仅仅是把整个政治的腐败转化为公开的象征性表演。法西斯先是在社会中广泛存在，那些左中右派无不谈论法西斯的社会议题，最终才是政治层面的最后蜕变。

这就是微观政治：法西斯在政治层面之下就已经开始运作，不仅仅是机会主义，它深刻地隐藏在现代政治之内。法西斯总是先污染所有政治派别：自由派说自己反对法西斯，但是最支持和最先投靠法西斯的还是它。是的，它是精神错乱的，我们怎么可能一边支持法西斯又标榜自己反对法西斯呢？

究竟谁是法西斯？我们人人都可能是。德国人哪里会不知道纳粹会把他们带向毁灭呢？但尽管如此，还是领袖万岁。一种由现代性带来的虚无主义（上帝之死）深刻地潜藏在社会之中。既然法西斯只是坚定执行了左中右派们

内心深处的要求，那就是说，法西斯可以有无数颗头颅，无论你斩断哪一颗，又有另外两颗。

必须击溃法西斯的反动身体：垃圾自由派说自己反法西斯，一般都是表演性的，资本家每一天都在执行法西斯，自由派从未反对过这个经济制度；整个政治领域被法西斯污染，自由派从未说要革新政治体制；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打响了，自由派全部都在袖手旁观；纳粹上台了，自由派表示效忠！

微观法西斯不依靠组织化存在。这是什么意思呢？法西斯现在依靠语言结构、依靠真理世界、慈善、政治姿态、猴子的思维和外表光鲜的正义外衣来挟持整个社会了，从一切场域、一切层面向个体发起进攻——这被称为预防性的治安。你听到来自社会的无上命令，你就听到了法西斯的叫嚣。

战争的人将作为“不合时宜的人”再度出现：“他们懂得暴力的无效性，但却接近于一部有待被重新创造出的

战争机器，一部能动的、革命性的反击的战争机器。”今天的反叛者，既带动工人，也带动了战士。工人也将再度出现，但不再相信劳动，而是接近于“有待被创造的劳动的机器”。（德勒兹；《千高原》）

尼采：自由主义机构一建立，自由就受到损害。机构“拉平山岳和沟壑，并将此抬举为道德，它们渺小、怯懦而又沾沾自喜地行事”。自由主义就是使人变成畜群……是战争导致了自由，而自由人就是战士。（《偶像的黄昏—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

工人问题，终究是一个伪问题！左翼小资不断灌输的不是别的，是毒药，它使工人丧失权力意志，沦为政客和小市民随意践踏的工具。——不断高涨满溢的湖泊，才有能力冲垮堤岸；有能力获得快乐、承受痛苦和责任的工人，才更加接近战争的人。所以在今天必须反过来，战争的人必须践踏那些卑贱和孱弱的共识。

是媒体-机构让我们虚弱。每一条微博的背后都是利益。网络聚集我们，又用产品、传播、消费、“异见”和娱乐分化我们。媒体总是单向性的，社交媒体在它的利益链条

中，无处不在地改变我们的话语和思维方式。人们进入的命运要么是被控制，要么精神失常，或者，成为“恐怖分子”或游击队员。

社交媒体并不直接与街头或革命相关，与统治着希望让我们相信的相反。但是这里仍可以实践：一种缓慢而又细微的改变。只有在这时，它才和街头上古老的抗议形式——涂鸦——相关。

社会媒体并不介入，微博也不介入。微博必须被炸毁，或者让它的游戏方式被改造。机构-媒体不再是为了传播，传播的企图总是商业竞价，问题是：一个更高的目的——必须把机构改造为战争机器！

以下为沙织的补充：

尼采是相当敏锐的，自由主义机构的崛起就意味着真正的战争的消失（波德里亚也看出来），战争将只成为一个无对应物的术语。在媒介社会这一点尤为明显起来：根本找不到与媒介的统治相对立的那个东西。

尼采为我们对战争（相应的自由）的重提和重估做了准备。针对意识形态对媒介的投资（意识形态不在别的地方），所需要的就是战争。这一点应该十分明确，即必须把对代码的解构，或说颠覆当做战争对待。革命恰好只存在于人们认为那个无革命情状和革命征兆的地方。

在“和平”的社区，在外来打工者聚居的街道，战争意识尤为重要。对中国人来说这尤为重要。来自各地的人们好不容易建立起一种社区文化，却要因为租金上涨、地皮开发、撤资、街道秩序重洗等问题被驱散：对此不吭一声，是不正常的。

想形成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社区又要依赖所谓机构的保障，这是矛盾的；相信自由迁移、自由主义市场、接受一个大运输时代（媒介社会），则一定是自虐出了快感。他们不会允许你自发形成什么文化社区。你若享受“自由”，他们就来清洗。

怎么评价自由？自由需要付出而不在于获得。机构要靠去争取才能发挥作用。而眼下它只是单方向分配一下现成的所谓信息（它并不能带来什么信息），成了专门的、

进行筛选的权力机构，它妨碍独特性。如果它不是战争机器，它就让人立刻不自由。

科学主义和基督教同质且同构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你们要记住，那些动不动批判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毫无疑问在当前这是所谓“进步左翼”廉价的政治正确姿态），却对自己的基督教-柏拉图立场和永恒/绝对主义闭口不言的人，要么是狗，要么是贼——本先知如是说。

必须意识到，这是我们当前的共同困境：狗屁的教授吹捧一下“学术明星”，然后底下一群脑残粉丝追捧，正是一个反动的构成——大家全都成了“左逼”。

“左逼”是反动的，并总是通向法西斯主义，必须从两方面来理解：正如虚无主义和永恒/绝对主义是一个对子 - 逃逸线本身具有法西斯的风险，但法西斯结构却在更宏大的规模下延续。

这便是困境所在：共产主义观念脱离了实际斗争，因而正在发挥一个反动作用，却总是成为“左派”的。齐泽克或巴迪欧真的提供了革命性替代或某种战略吗？但事实并不如此，很明确，在他们延续了当前的政治结构绝非是一个偶然，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在同一主题下团结起来——这便是当代虚无主义最大的结构。

在巴迪欧把“虚无主义主体”推脱给非西方民众之后，齐泽克这次又来：“对于弱小、动物、女性等等的极度凶残是‘下层群众’的典型特征。”这给我们带来错乱中的错乱，没有必要多费口舌，再重复一遍：现代人的自我卑贱化才是重点。

加强理解：什么是无器官身体？首先要避免语言的堕落和玷污：不要追问它的能指。关键在于它反对谁和如何运作。无器官身体直接对应的是欲望的主客体——没有器官（或者说反对器官的组织化的身体），没有快感只要快乐，因而它是一种内在力量分化后形成的身体。这一内在

性的勘测可以追溯到尼采-斯宾诺莎,并且深刻地反对俄狄浦斯。

容贯的平面:无器官身体的互相连接构成了平面,平面构成了无器官身体。但,究竟谁构成了谁,它们是否相同?德勒兹没有给出答案。它们的力量相同:一个平面并不比链接的线具有“更高的维度”,并根据无器官身体链接的递增或递减秩序来形成。一个内在性的平面,也可以叫做非特指的纯粹的生命。

平滑空间:对应纹理空间,两种空间是交替或共存的。城市是纹理空间,但是其中可以重构一个平滑空间——平滑空间和穿孔空间的结合,因而平滑空间具有了反击性。无器官身体运作位于平滑空间,“强大的非有机的生命逃脱了层,穿越了配置,勾勒出一条无轮廓的抽象线——游牧艺术之线和流动的冶金之线。”

尼采-德勒兹是一种指导吗？“指导自己，不行；指导别人，也不行！（尼采；《孤独者》）”它不应是一个教授-模仿的模式，而应是一个自我的给予与索取。

一个平滑空间内的游牧实践，不发生在讲座中，而是发生在当下的，细微的改变中。对斯宾诺莎来说，内在力量的分化并不是来自（上帝）创造说和流溢说，这里已经没有了根-树的结构，因而促成了一种对万物的洞悉和自我的实践。

康德甚至在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概念和实践的断裂。康德探讨自由，就像塑造女人的客体，但是他从未真正去爱和洞悉女人，此时女人便成为男人的创造，一种摧毁和剥夺。但这样的女人和自由是空洞的。

康德脱离了上帝的意志，因而更接近新教伦理。上帝死了，但善与恶的道德世界仍然在运转，这时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造了上帝。但这个“人”仍然是男人的一个发明，助骨造夏娃的故事，便成为了男人造夏娃。

在当今我们总是出于令人作呕和肉麻中：一个人都需要爱的世界，到处都是爱的口号 - 公益、慈善、“和平”的叫嚣 - 但是黑暗降临了，爱被言说得越多，爱就越少。

在“后法西斯”时代大部分个体面临相同的境遇。就这点而言，我们并不特殊。就好比想要利用网络的访民也会陷入相同的境地，个体面对法西斯的包围是当代社会的常态，而这又和所谓的中产阶级社会想要的秩序和虚无主义阶段密切相关。

网络法西斯也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在网络上法西斯展现为一种舆论的漩涡，通过虚假的对立和中产阶级议题将我们捕获。德勒兹提到的三种“线”及其各自面临的危险，很好地分析了法西斯包围的现状：节段线使我们分割、强加给我们纹理化的同质空间；分子线传输着微观-黑洞，使根-树重构；逃逸线抛弃创造性潜能。

逃逸线抛弃创造性潜能而转向毁灭之线，也是我们各自面临的微观法西斯状况。细数我们的敌人：科学主义、

托派、NGO、马列主义者、自由派、左逼、精神分析、右狗、齐泽克和巴迪欧和基督教等等……尽管这些人可能彼此对立，但是同一个主题把他们联结起来 - 当前的全球秩序激起的反动浮渣。

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敌人的攻势无处不在，白色恐怖和传单漫天飞舞，我们随时都会感到自身的危急时刻。但事情是这样的，这是个后法西斯时代：法西斯化身成（言论与营销的）雾霾，连带着傻逼的胡扯八道，“知识分子”或某教授的装逼，都是一个环节。

你没办法和雾霾搏斗，你也战胜不了一个幻影。当前只有一个高低贵贱的较量。问题在于，如何推动我们的工作和实践。懂得自身的创造性，以及一个更高的姿态，我们自身的建设这本身就是征服。当这么做的时候，焦虑和困惑 - 连同雾霾 - 自然会得到缓解或遏制，当然这也包括我们对自身的反思。

什么是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呢？首先应该明白的是，它不是一种身份和抽象的理念，而是一种斗争方法和实践。没有后者，这个词和自称它的人就毫无意义。在人群中用无政府主义标榜自己，其实非常幼稚和无意义——往往也达不到宣传鼓动的效果，并且让自己被盯上。

一个高贵的行动是自我当作一种给予。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也不是意识形态降临或被某种机构传播到大众，而是从行动实践向理念敞开，始终从外部到达理念现场。并不存在一个真理世界或无政府乌托邦，无政府主义是废除那个“绝对理念”或“更高存在”时完成的一个创造性的动作 - 破坏既创造。

关于波德里亚：在符号-象征领域有太多的意义，所以人们喜爱无意义。但必须要问，真的无意义就因此变得更加感性，更加能够颠覆现实吗？假如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呢？事实上一个无目的和无意义的理论-行动，并没有超出超现实主义“自动书写”，布勒东设想的在街道上随机开枪，只是在这里重新被提出。

从尼采-德勒兹的角度来看,并不是说问题全在于思想,而在于概念和意志。资本主义虚拟化并不会凭空制造出两个对立世界,确实,激进变得虚假了,为之辩护也许是个大问题,但超真实的概念本身所带来的批判性更难以抵御人们对它各种样的的使用,并用来为自己的无能做辩护。每一个概念背后都有一个偶像。

尼采真的只是站在自我的角度吗?注意,这里的问题仍然是阐释本身。权力意志究竟是不是尼采的自我感受和哲学解决方案?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使树-根转化为根茎,德勒兹说。并不是说尼采只剩下自我意愿了,在今天,自我可能是被强制的。无底深渊般的沙发,病人躺在上面犹如逼供 - 我们必须有一个自我,不得不。

如果我们总是用家庭来说明权力意志并把尼采的意愿也封闭在其中,那么显然是一种曲解:权力意志及其虚无主义相关分析是面向宇宙的心理學 - 从两性、家庭、社会到银河系、黑洞和类星体。尼采的目的性表现在基督教也许是精神危机,但基督教改革以来的现代性已经内化在我们的主观性中。

我们如何保证“超真实”本身不是这一现代主观性的延续呢？概念-偶像的背后，总是通往一个永恒真理了，随后柏拉图如是宣称 - 我即是真理。不过尼采真的仅仅躲进哲学设计中吗？显然不是，因为尼采不需要有人膜拜，不需要弟子，因为他需要的是同伴，或者是一次鸡奸。而我们却不能成为波德里亚的同伴。

无意义仅仅说出了自我，但是一个新我的阐释更加有力。

问题在于实践，不是将艺术和哲学作为欲望对象，隐形的行动才应该是。问题也不是男女两性是否分离，问题是男女两性的区分。

过分提高符号、超编码所具备的权利，会导致理论与现实的断裂。当然前者可以继续自我辩护：现实不存在，我们面对的比真实更真实。但实际上，生产实际上却在借助符号-拟真的霸权扩张，基于该理论的创作也将进一步和不见天日的监狱中被折磨致死的人分离。

监狱并不是指代“关塔那摩”（在符号神话中，却总是指向这个地方），而是说监狱是流动的，就比如城市是流动的。平滑和纹理空间共存了。

“关塔那摩”本身就是一种虚构了，在符号-能指的地方，关塔那摩反而塑造起新的神话。但是，监狱却是城市-空间本身，生产也无处不在（而不是“生产”），它们在折磨致死中和流下的汗水中。

究竟谁是恐怖分子？是波德里亚吗？本先知说，在当前的时代，问题不是成为恐怖分子，对被称为“恐怖分子”的人来说，问题是如何不成为。这是一个战斗中与战斗之外的问题。

拟真-拟象、超真实，概念本身就没能反对偶像。这里有一个理论本身的问题：抽象机器其实不存在。“矩阵-超真实”的概念仍然旨在促进生产。然而，所有“内爆”都已经和革命无关了。

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内爆，也许我们当前所有人都希望“内爆”，内爆早就成了治理方式。但问题是，真正的内爆早已发生过，而此后的内爆仅是一种延续。

波德里亚把所有革命都寄期望于被统治和管理的“内爆”了，这是超真实和无意识-超现实主义的“反建构主体”，但它仍是一种主客体的二元论。

积极虚无主义的“共同体”始终保持递增-递减的原则，并不是一个来临中的整体（历史弥撒亚），而在于一次自我的克服（或放弃），个殊化的弥赛亚实践。

本先知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是某“激进教授”的读书成果和“先进理论”吧：哲学自圆其说，资本主义也自圆其说，所以哲学也是资本主义式的。——人两条腿，鸡两条腿，所以人和鸡一样。

并不是我企图捍卫什么，仅仅说明一下咱们“理论界”的低劣。不管是哲学还是非哲学，有些理论特别不重要，

随手可以扔到垃圾筐了——尤其是把科学发现当作人生态度的“后物理学”，这种东西放在哪儿都是没有原创性的粗制滥造。

我不是“理聪”，不过到哪儿都得反对“文傻”，尤其是给物理学理论舔屁眼认爹卖毒药的文傻 – 咱们从来不缺科学玄学家：从印度教和密宗琢磨出来的“理论物理”，转手在兜售给你们这些土鳖，原来一切都“很科学很激进”。

论尼采在当前的重要性：我们的当代激进理论始终是一个“学术明星”们的集体卖淫的时代 – 他们告诉你的不如他们遮掩的多。

西方主观化-虚无主义的当代实践：你们听别人聒噪想看苍井空，现在到处都是苍井空啦，你读的激进理论，也他妈是个苍井空！

消极的虚无主义和永恒主义或现代共同体的价值是一致的，问题是，两个相对的价值享有共同的观念，比如 – 不

管反对还是赞同，两者都相信共同体是一个不可化约的整体；无论从否定和反抗的角度，还是观念-统治的角度，两者在同一秩序下都不可或缺。

消极的虚无主义就像犬儒主义的两个面向：一种对应了流行文化的颓废，一种对应了仇恨和毁灭，但骨子里却有相通之处（尽管这不容易理解）- 当然后者往往意味着一种潜在的激进化的不安。

所以更积极些的虚无主义是，没有善恶、没有真实，并且通过递减或递增的方式构成建立在当前资本主义废墟之上的新的组织形式，这种交往建立在退出和伤痛之上。此外还有对虚无主义的克服：重估、战争机器的复活和一个创造的行动，以及诗歌与艺术的喜悦的到场。当然说这些的时候，其实又回到了尼采。

无政府主义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教条的理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因为自己解放自己还需要一个自我重新发明的过程 - 就像我们在奇妙的旅途中发明了自己。没有教条，它应该是关于自由的竞技！

哲学从真理世界到迎接真理再一次发生了变化，在今天与权力斗争中，我们用出走搞哲学了。异乡人、竞争、联谊和狂欢，哲学与权力相反。而在黑格尔和教廷的哲学帝国里，在弗洛伊德的客户沙发里，哲学还从未发生过。

瓜塔里认为，红色旅仍然是运动的一部分，应该保持最低限度的团结。实际上是完全正确的，像什么“人道主义”面临危机的观点才不是当时运动的一部分。所以，最低限度的团结和对话是必要的。而“孤立”，也并不是简单排斥，而是组织化的自治运动的方式，不同分支有不同的态度。

这和西德的情况大致相同，红军派等城市武装游击队实际上和当时的自治主义运动（比如占屋运动）有一个密切的关联。而这个运动，又和纳粹/法西斯主义未得到清算的遗留问题相关，大部分纳粹干部仍然在政府担任职务。

相关历史性文献可以参考《火与焰：西德自治主义运动史》。

那么，关于恐怖主义又是如何呢？当前的大部分所谓“恐怖主义”，其实就是游击战争，并且就像我在译者注里说的一样，战略、手段，都有很大的差别。它总是被说成恐怖主义，这和当前的恐怖主义定义的模糊有关 - 当然不可能让国家元首来定义什么是恐怖主义 - 所以这也是当前的斗争方向之一。

这也是德勒兹提到的当前的“捕获装置-反游击战略”，9/11 之后的所谓的“全球反恐”，实际上真正惧怕的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大众革命的到来，这一“安全策略”被用来针对非特定敌人。之所以这样，又涉及到恐怖主义政治如何确立……

之所以游击战争变成恐怖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确立的政治有关。真正的恐怖主义由资产阶级发动并由列宁所继承(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评价列宁是圣·保罗式的人物)，它处于在现代国家得以确立的进程中，其精神实质由新教伦理和上帝之死造成的现代虚无主义填补，并且它的实施直接来源于立法性的暴力。

资产阶级革命的精神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进一些“社会主义”运动中去：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的基布兹-准军事公社如此被政府重视，因为它本身就涉及到内化在现代性中的立法暴力和内部种族主义；一些社会主义派别热衷于新教伦理，在俄国革命中也面临相同的问题，而在今天它将会起到反动的作用。

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确立了恐怖主义统治，它是一种被深信不疑的神话，所以我们对它的挑战，也不可避免地认为是“恐怖主义”，但事实上只有它们精神的真正继承者 - 比如“伊斯兰国”或某种“社会主义”或自由派的“人道主义”才是。就像瓜塔里提到：要看到这种类型的暴力正在各种层面到处实践。

必须坚定地反对希腊的SYRIZA、西班牙的PODEMOS，还有美国的伯尼·桑德斯。你说特朗普是法西斯？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所谓左派在今天并不比右派更具道义优势，因为这是一个反动的双面体。

在齐泽克玩味资本主义的“症状”扁毛的时候，德勒兹早就指出了黑格尔派的问题：“抽象地考虑症候，将表象的运动变成事物的的创始原则，只保留原则的颠倒的形象——整个辩证法在虚构的要素之中运作。当问题本身是虚构时，其结论又怎么可能不是虚构？”

所有虚构都变成精神的时候，一个辩证法家要怎样指责另一个辩证法家颠倒事实呢？这样的话它“怎么可能仍旧保持一种批判的观点？”

虚构的明星和虚构的精神，这就是今天媒体给我们的全部。我们面领着另一重的颠倒——答案本身就是那个问题了。好吧，让我们再次去认真地问一次那个问题：我们如何去消灭现状？

消费主义：答案本身成为一种诱惑。麻木：答案是一个无聊的事实。奢谈：答案仿佛无穷地宝贵。难道你还是没有发现吗？媒体这个巧妙的战略！

辩证法是通过虚假的对立硬塞给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齐泽克愚蠢地分不清什么是积极和消极的虚无主义。因

为他本身就处于一个辩证法-基督教所确立的虚无主义之中。虚假的对立总是否定对差异的肯定：太阳和月亮是对立的——辩证法。

尼采并不相信上帝真的死了。上帝造人变成人造上帝，但谁是“人”呢？反动的人把自己表现为上帝，但他永远是个奴隶；上帝的本质也没有变 - 奴隶制造机，所以上帝之死，还仅仅是一个辩证法的喧闹的事件，一个“反动力的嘈杂中和虚无主义烟雾中的事件。”（德勒兹；《尼采与哲学》）

施蒂纳（无政府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者）作为“最后的青年黑格尔派”，一个辩证法的化身，把辩证法的虚无主义实质揭示出来。施蒂纳直接用行动把自己抛入了虚无-我不是人，也不是上帝；黑格尔的自由是抽象的，因而我们必须去占有自由。“我”是“无”，这一自我的毁灭，是否定权力的最终后果。

马克思也没有克服虚无主义，“马克思”除了为到达终点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即无产阶级阶段做了标记之外，

还做了什么？“（德勒兹；《尼采与哲学》；辩证法的化身）

“辩证法原则上都是虚无主义的，并且它所给出的肯定形象总是否定的或颠倒的。” - 辩证法最终的肯定，仍是一个肯定的幽灵。

那么，虚无主义是怎么被克服的呢？虚无主义实际上是被自己击败的。在虚无主义的圆满阶段 - 一个更高的虚无意志和神圣的否定 - 否定了意志的虚无。最终，虚无意志超越反动的人，和反动力分道扬镳。这便是查拉斯图拉的方法，通过赞颂愿意让自己走向没落的人。

走向没落，击败自己，是一个肯定生命的过程。但查拉图斯特拉并不是狄奥尼索斯的化身，前者总是地位更低一些。“查拉图斯特拉的星座属于狮子座，但狄奥尼索斯的星座属于存在”。

月亮只有在与太阳对立的情况下，才是一个“怨恨”的形象。月亮之怨和阿里阿德涅之怨其实是一回事 - 忒修

斯杀死牛头人身怪后，留下被抛弃的阿里阿德涅，此时迷宫才成为一个“否定”的迷宫，象征着歧途之路。

正是牛头人身怪、忒修斯、迷宫-歧途和阿里阿德涅的否定，构成了辩证法的虚无主义的要素。你可以在当前的“学术明星”的时髦理论里找到这一切：无论是齐泽克、巴迪欧还是波德里亚。

否定的同一，是对差异的否定，所以它是一个同化的过程：基督教同化维京人、教廷征服异端都是这一否定的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的辩证法家们，如此喜欢要一个“牛头人身怪” - 因为它给了我们否定的理由。迷宫因为一个牛头人身怪才有意义，辩证法家说，我们的世界取决于一个怪物。

阿里阿德涅不得不怨恨，因为这时女性的权力依附在男性身上了：成为妻子、成为母亲，即使忒修斯具有更高的道义，但是阿里阿德涅不得不成为他想象中女人的影像 - 现代启蒙运动的本质都是男人的一项发明，忒修斯发明了阿里阿德涅，于是后者便停留在怨恨中。

绝对的观念、辩证法和虚无主义，巴迪欧、齐泽克和波德里亚正是代表了基督教当前的三个面向，三者在圣保罗和列宁的旗帜下走到了一起。而波德里亚对福柯之怨，其实也是月亮和阿里阿德涅之怨。

迷宫只有在月亮之怨的情况下，才是一个歧途（巴迪欧用共产主义观念反对它、波德里亚讴歌了迷宫的不可战胜）。但是狄奥尼索斯出现了，他想要一个未婚妻，并告诉阿里阿德涅，他才是那个真正的迷宫，存在本身正是那个迷宫。迷宫是永恒轮回，是一个肯定和生成。

狄奥尼索斯不仅是一个肯定，他也让阿里阿德涅对肯定加以肯定：“你的耳朵太小，你有我的耳朵；在那儿放下一个精当的词。”是迷宫把我们导向存在，耳朵所生成并肯定的迷宫。狄奥尼索斯把耳朵给了阿里阿德涅，让她自己听到狄奥尼索斯的肯定，然后把这个肯定变为“双重肯定”，也就是存在。

阿里阿德涅作为未婚妻放到耳朵里的唯一聪明的话，就是“是的”——至此“反基督的三位一体”成型了。狮子座查拉图斯特拉、未婚妻阿里阿德涅和酒神狄奥尼索斯，

而永恒轮回就是那枚订婚戒指。狄奥尼索斯总是被阿里阿德涅无条件接受，查拉图斯特拉则必须经历永恒轮回。

"分析的忧伤和分析性超我的忧伤。理论的对象越来越难以通过真相的游戏使自己新生。摄影的对象则相反，它通过表象的游戏让自己新生——不再有超我，不再有分析，不再有忧伤。摄影的对象是无催化碱的。"（波德里亚）

评：精神错乱才会让理论的对象通过真相的游戏来新生。夸大理论的能动仅仅是在表达一个缺乏能动的人的哀叹。而事实就是，生命本身就是真相，一个自我克服的过程，就像德勒兹论福柯提到的：“人幽闭了生命，超人则是为另一种形式计而从人本身中拯救生命的人……”

那么摄影的对象通过表象-伪装来让自己新生了吗？这个论断就和“礼貌性的上相的微笑”一样“微笑”了。但是这里没有逃避，也没有装死，确切地说，我们的回避的微笑只不过让粗俗和卑贱的摄影更加肆无忌惮，一个对权力的暧昧调情。

“礼貌性的上相的微笑”的表象并不带来新生，在停止卑贱拍摄的地方，我们才新生。不过怎么做呢？也许是一个透露着轻蔑的无表情，一个僵硬，一个“不存在”，就好像摄影本身是一个错误和无意义。

停止微笑！在我们不微笑的地方，狂野的大笑和轻蔑的嘲笑的历史性事件才蔓延。

“超人，就是来自兰波的用语，甚至就是充满兽性的人[...]超人就是充满语言存在的人(即充满“无定形、缄默、毫无价值的区域，在这一区域，语言能摆脱”它应说的)”
(德勒兹；《福柯》)

波德里亚这句话仅仅是个坏逼的自我暴露：“理论的对象越来越难以通过真相的游戏使自己新生”，摄影的对象却可以。但是有谁想让“理论的对象”新生了呢？淫荡地拍摄别人就是新生？

所以说，到底谁是权力呢？如果你被统治了，你可以通过“忘却”来解脱吗？到底谁是权力——通过遗忘的暴

力来抹杀别人的，那个才是权力，而且是最下流和淫荡的权力。

说到底波德里亚根深蒂固的列宁-圣保罗式的观念决定了他厌恶用“权力”来看问题，然后自己又塑造了一个狗屁不通的庞大的黑格尔式的宫殿体系。这样波德里亚就有权审判其他人了？

波德里亚到底干了什么呢，他有任何能力吗？组成监狱调查团的，到底是波德里亚这种躲在一边诅咒别人的人，还是福柯？

无非就是那点套路：你不能分析权力，因为我的理论不相信；你的理论反动，我的理论可以新生；拟真-拟像和超真实是无懈可击的，干什么都反动，只有资本主义“内爆”才最革命。

写作是创造的而不是一个目的，但是像波德里亚这样搞了一个“批判超真实帝国”的帝国，写作就受到损害。一提资本主义现在你只想到波德里亚了，超真实太牛逼了，但是这里没有说的是，波德里亚此时更牛逼，原来他是我

们的再生父母 – 以后你找个女人都要过波德里亚这一关了。

“福柯从不把写作当成一个目标，当成一个目的。实际上，正是这一点把他造就成一位伟大作家，写作其乐无穷，欢笑不已。” 写作...“让我们获得狂笑入迷的基本权利[...]只要耻辱、痛苦或死亡不使这个链条保持沉默”，我们就狂笑！（德勒兹；《福柯》；新一代地图绘制者）

今天是谁让我们保持沉默呢？有人非要把波德里亚打扮成“人畜无害”的小白兔，我就是说，波德里亚早就成了再生父母了。一个吃人不眨眼的“学术大腕”，弄了半天原来是受害者，一个叫嚷着要“忘却福柯”，让我们忘却权力的阴险处，处处指望资本主义的狗腿替我们革命的人真无害，批评再生父母是不行的但有人阻止批评福柯了吗？

理论的对象仍然是理论。没有人要去当理论的对象，也没有人想要用理论和真相让自己新生。是波德里亚自己盲目地鼓吹理论的有效性，鼓吹到了天际。理论是个毛，

但是波德里亚就是不让理论变成毛，因为波德里亚要贩卖他自己的。

拟真-拟像是个屁，但是波德里亚就是不让它变成屁，它必须无敌，这样工厂流水线转的才欢快，波德里亚的理论才更好卖！

如果我是马列主义者我会怎么做？我会拼命发布一些农村的负面消息让大家纷纷表示农村之愚昧，给大家制造一个农民就是天生落后的印象，然后让农村丧失所有话语权力继续任由城市支配——注意这个意识形态，它不是说事情本来如何，而是应该如何：说农村是落后的反动堡垒，实际上要让农村变得落后。

那为什么要让农村落后呢？意识形态会告诉你工人阶级最先进，不过事实是，这么做就可以无条件把农民工当成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可以随意侵害他们。然后在这一进步生产力的神话下，所谓“进步的左派”又重新反塑一个“工

人主义”神话来传播，于是你来我往，反对者和奴役者踏上了同一条船。

关于巴迪欧对德勒兹的评价：和巴迪欧所认为的不同，实际上从尼采到德勒兹，自由（anarchy）自始至终都是被思考着的，并且它本身就一种贵族式的任务而不是相反，只是它有别于经典意义上（黑格尔式）的无政府主义。

差异是多元的。德勒兹写了《尼采与哲学》后与福柯相识，还没有和瓜塔里合作，当时就提到否定才是一元的。

“个人的欲望生产”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无意识才和个人和压抑有关，在《反俄狄浦斯》中欲望的压制始终是社会性的，并且俄狄浦斯的个人化压抑是一种对社会欲望的压制的存在，而欲望和社会生产先在于俄狄浦斯。无论德勒兹还是尼采，自始至终都在谋求反个体化的政治，一种特殊的个人主义。

而且很明显，巴迪欧身上除了黑格尔另一个要命的倾向是海德格尔遗留的毒素 - 始终把差异和同一视作辩证统一 - 然而德勒兹早就走了不同的道路。

尼采的永恒轮回并不是说要回归成相同者和同一（没有海德格尔的“同一律”），因为虚无主义已经在回归中被克服、“同一”被抛弃和遗忘了，所以这时只有肯定和多元的一以及在生成的相同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永恒轮回并不是一个整体和相同的回归，否则那只是一个“极端平庸的假设”。——尽管我们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胆怯和懦弱，但是回归是肯定和积极的。勇敢地“再来一次”——痛苦、胆怯和懦弱也就成了其他的东西。

虚无主义达成圆满和最后一次变形后就完成了“任务”，虚无主义并不回归。

虚假的对立：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怎么相同的问题到了美国国会，一些人就装作纯洁无知的少女呢？

智力问答：3K党臭名昭著，3K党知道自己臭名昭著，3K党在媒体宣称支持川普，那么3K党服务了谁？谁又在利用3K党为自己谋利（就在我们的微博和媒体上）？究竟谁是法西斯呢？对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难题——你没办法在现代自由主义的世界里找到任何逻辑性，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良心”。大家都是“善良人”，啊哈哈……

福柯只是分析了柏拉图的爱情观念，也即，性行为是爱的崇高理念的副产品，且两者不相分离（类似于巴迪欧的理念）。而这种观念为其后的奥古斯丁铺设了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结果：“性活动问题的焦点不再是快感以及想用快感的美学，而是欲望和净化欲望的解释学。”

“柏拉图关心的是欲望”，并由此产生了一种禁欲主义，但这种禁欲主义并不反对对少男的同性之爱，这种克己反而是一种维护和技巧 - “真正的爱情本身逐步进化的

过程；把自己看成一个充满欲望的人（《性史》；真正的爱情）” – 而不是从享用快感的伦理学中找到的。福柯从这个角度来反对基督教主观化进程。

所以这里也引出了福柯跟德勒兹的分歧：前者认为欲望代表着一种匮乏并厌恶这个概念，因而认为“满足”更合适，而后者却认为这种欲望仍然是弗洛伊德语境下的欲望，真正的欲望并不对应匮乏，并举了宫廷之爱来说明欲望避免满足（德勒兹：欲望与满足）。

所以说，不管德勒兹还是福柯，都和尼采反对柏拉图主义的理念相一致，只是方式出现了分歧。（题外话，福柯并不认同柏拉图同性之爱，因为他认为性别是可以转换的建构；而德勒兹-瓜塔里倾向生成-女人。）但是波德里亚是不同的，波德里亚的理论方式实际上隐秘地通向了柏拉图。

注意波德里亚的这个方法：忘却福柯，之后还不忘了又添了更加“反讽”的一笔，忘却波德里亚。这就是从他“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从列宁主义继承的潜在的辩证模式 – 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就像居伊·德波和波德里亚的

比较让我们发现后者的批判是景观化的一样，换句话说，波德里亚只是提供了一种否定的歧途迷宫。

这就是为什么他在《论诱惑》中如此醉心于“资本主义内爆最革命”，而这又通向了我们的时代最令人虚弱的恶疾。尽管波德里亚提到了善与恶的虚假对立，但是他就像忒修斯一样缺少公牛的拿得起放得下的精神，因而产生了阿里阿德涅之怨。

并不是我们反对同情，倒不如说同情只有在我们足够强的时候才具有意义（给予），不能因为传播一种同情而去无休止地索要。

不要反对权力，要反对权威，自由派才反对权力树立权威。而且法国左派没有让政治瘫痪，他们的问题在于没有彻底粉碎“政治”，从而也就没有实现事件在下方的流动（失败）。

所以这就是问题——自由派和马列主义者的遗毒。为什么要反对权力，把大家关在笼子里呢？想要把所有人都关起来的人是滥用权威的自由派奴隶，让所谓“政治”运

转顺畅的是比尔盖茨和跨国公司。新自由主义促进了民族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则是那个帝国主义辩护士。

马列主义者们在今天装模作样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完全是虚假的。通过一系列颠倒和错乱，假装批判新自由主义却相信现代民族主义（现代国家秩序），然后自己（比如苏联）又走向了帝国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到处都是法西斯。

没有人为知识分子说话，相反的波德里亚就是那个最恶劣的知识分子！提到知识分子和权力，在今天还有比齐泽克这种漫天飞舞在全球媒体上侮辱我们视线的苍蝇更过分的吗？波德里亚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是过气的猫王。

这里没有人把福柯当作神，他也根本不是最顶端可以随便批评，但是为什么真正的恶劣的掠夺话语的波德里亚却可以逃过一劫？

这就是当前的奴役：大家全变成“左逼”全变成所谓的“共产主义者”了，于是左派里你又发现了昔日的敌人，

各种各样的敌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然后这个时代却空前的反动了，共产主义原来是一块文明挂在嘴上的遮盖布！

波德里亚自己不抑郁，显然他是要让更多的人抑郁。举个例子吧，病毒就类似黑客帝国里的史密斯，但实际上这只是虚无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从新教改革就开始的历史进程而已。我们之所以臣服于这个理论，也只是时代特征便是如此，一个力的作用。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个创造神话理论的尝试，波德里亚仅仅是躲在了概念背后像窥淫一样窥视了我们，一个偶像。如果这带来理论的内爆，大概是弄巧成拙。这是个区别于马克思但同样富含野心的尝试，还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特别是我们不应该给自己的领袖、偶像或代表去替他们体会什么用意，权威恰恰在这一煞费苦心中构成。

让我们抛开波德里亚。沙织确实谈到了福柯的一些问题，我在这里做一些补充。福柯理论中确实有某种特性把他导向了苏格拉底，这主要来自福柯对欲望和满足的阐释。正如尼采对苏格拉底采取了严厉批判态度，不过我们问题

是，到底是福柯认同苏格拉底随后产生了他的哲学，还是他的哲学把他导向了苏格拉底呢？

区别这两者是有必要的。批判最终不仅要落向个体，也要挥向一个时代。就象尼采既处于时代又反对时代一样。换句话说，显然福柯和苏格拉底并非在理论或人格上相似才产生了认同，而是福柯本身的哲学使然。

德勒兹对福柯的评价非常精到：福柯更加接近萨德侯爵以及一个法国大革命的风格，并且福柯的观念仍然延续了结构主义对欲望的理解。实际上这种结构主义无论是在福柯的老师阿尔都塞身上，还是在精神分析学派中都可以发现。所以这一与苏格拉底的隐秘的联系，福柯不能说只是一个例外。

关于从福柯 - 萨德侯爵身上发现潜在的苏格拉底或许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不过并不能就此认为福柯对于无名者-话语-真理和权力关系的揭露是一种剥夺，显然这是一种夸大。问题还在于，作为无名者的我们如何做 - 这才是来自尼采的智慧 - 对自我的发现以及克服。

由于苏格拉底，希腊人的趣味转而热衷于辩证法[...]辩证法只是一个黔驴技穷的人手中的权宜之计。在使用辩证法之前、一个人必须先强行获得他的权利。”（尼采；《偶像的黄昏》）很明确，齐泽克透过全球各种媒体向人们说话前，剥夺就已经发生了。

你们看到了——“偶像的黄昏”——全球资本主义给你制造了一个齐泽克、福柯或其他学术明星，但它仍然走向了黄昏，早已黔驴技穷了。“不要怕，我们赢定了！”

总有人问愚蠢的问题：“富人的收入为什么要分给穷人？”——仿佛这样就可以责难革命者似的。但是现在本先知告诉你们，这是个伪问题。只有社会民主党和现代自由主义者才只注重分配的问题，但这是注定失败的。他们通过这个问题掩盖了更广泛发生的基本的事实——他们用体制强迫穷人把财富分给富人。

必须把问题颠倒过来：为什么穷人的收入要分给富人？并且只强调分配问题的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由派和

社会民主派，所以到底谁是“乌托邦主义”呢？只强调一下分配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它可以实现吗？

现在让我们归根结底：到底谁富谁穷呢？如果我们只辩证，只会把表象当作实在，把症状当作原因，从而得到一个虚假的肯定。所以到底是谁分给了谁呢？如果我们从根源去理解这个问题，确实是富人分给了穷人——那些生产和创造的是富有的，资产阶级只是那个搜刮创意和劳动的可怜虫！那么富人确实不应该分配给穷人。

现在只有去“肯定”了 – 去成为那个不合时宜和战争的人，就如工人不再相信自己的身份和劳动时才能脱离资本主义平面，不再相信分配和劳动。

这是说去掌控我们自身的力量，就好比自治运动如何创造新的组织方式。

废除劳动才会脱离人-机系统，因为机械化还只是第二阶段，奴役的第三个阶段是全自动化和信息处理机，我们都成了电视前的人类-机器，承担了输入和输出，用德勒兹的话说。尼采显然并不禁止思想，相反的，黑格尔面目一

致的学生们才是。并不是说我们都去混吃等死，而是一个克服人类-机器和脱离资本平面的过程——去掌控劳动机器和战争机器。

反对怀旧，因为与之相对的模式恰恰是去深入我们记忆中。我们应该注意到怀旧对我们个人记忆的抹消：那些狗贼在今天通过怀旧来抹杀一切斗争的可能了。马列主义、托派或毛派因为怀旧而走向了自身的消解，作为旅游纪念品来出售。

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大反动，那些人摆出革命造型还真不是为了革命：其中最龌龊的当属阿尔都塞所谓的“保卫马克思”了（当然还有齐泽克）。它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歇斯底里，和我们的远古记忆无关，而和一种盗窃和侏儒卑微的心理有关。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革命在过去的幻影来打破当前秩序对我们的辖制。并且根深蒂固的一种心理是我们融入到所谓“大众”中寻找记忆了，但是其中没有记忆，有的只是

潜伏已久的凶恶暴君和孱弱的裹足不前。尼采绝对不会认同“大众”这种概念的，一个斗争的生成，不是来自大众和道德的应该，而是不合时宜的态度。

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在于对自我的克服和重新发现：大众在我们身上只是那个皇帝的新衣。并非我们要真的消散而去，而是生成-狼群。

几乎这就是所有革命和反动的区别 - 所有政客都力图讨好一个不存在的“大众”。齐泽克透过全球媒体的反动鼓吹让我们成为“他者”，这恰恰是对当前奴役结构的再次重复，那叫嚷着“是呀”的驴子的辩证，和查拉图斯特拉的肯定截然相反。

这就好比德勒兹对鲁滨逊的分析。齐泽克只是利用了反动-失常的结构，来让我们就犯和认罪，就像福音派教士一般：“我们都是弑他的”。不，齐泽克和全球媒体的反动结构才是那个凶手。

没有什么好说的。齐泽克和他的党卫军最终都会遭到清算：如果你了解五月风暴，就一定听过“结构主义主义

没上街”的故事，在今天也一样，就好比 3K 党一上街就挨揍，他最好别上街。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旅游，中产阶级和嬉皮、小清新们把旅游当作救赎，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恶毒的产业。旅游尽管被说成带动当地经济的手段，但实际上它在当前所有国家正在进行的新城市化-全球资本主义战略，边缘化少数群体以及当代艺术的卖淫中占有越发重要的地位。你去看景点，但是景点的看，比你更透彻。

实际上现有的一切反抗姿态对于这种“景观”的统治都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特别不重要），不过我们并不简单地把一切归结为“景观化”打发了事——来自“主体”的凝视是淫秽的，并且总要从中找到救赎性的乌托邦（比如在西藏），并且这个看又是空洞的，它没有去触摸和链接，他要看的东西并不存在。

绝不仅仅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在当地的发展造成了物价飞涨、生活成本上升和通货膨胀，还有所谓的土绅化，我

们不做简单的道德谴责，还有一方面：表演癖和精神分裂是对立的。它的问题在于使社会节段化，比如一个民族风格的文化产业，当地佛教的官僚化和商业开发商达成的友好协议，都促使集体欲望的断流。

当某个民族被资本公理重新编码，其文化仅仅成为符号，那么这就丧失了再次游牧的可能性而不再有任何活力和创造性，从而不断形成黑洞，并使集体政治成为某个集团赌博的筹码。事实上左派和右派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但他们也是无力的。问题始终是如何生成，生成斯堪的纳维亚人，即使那是他自己的民族。

一面是统筹规划以及旅游带来的“经济辉煌”仿佛让它极具创造性，另一面，在边缘，资本主义明确地破坏任何组织和创造性，有钱人的投资成了唯一希望。发展主义最终始终破坏发展，这便是国家的微观政治的实施。我们不认为艺术家的创作会比星巴克或其他装逼的咖啡店更逊色，但前者显然更服从于后者的统治。

自由主义全盘统治的时代才是最险恶的时代，远比法西斯的时代更凶恶，法西斯作为排头兵的目的恰恰是当前“和平的废墟”和白色恐怖。人类面临的是对生命形式的最根本否认，大规模社会监禁和监控在今天达到顶峰，掠夺和战争比任何时候都频繁，所有人都被掌权的奴才威胁。

这一切灾难都是在“进步、良心和正义”的口号下进行的。自由主义虽然总是摆出“受害者”的姿态，装模做样地悼念奥斯维辛和古拉格，但自己做的比这两者更过分。作为受益者的这种受害姿态，企图从根本上回避所有自身的问题，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左派”的复辟（最突出的例子是巴迪欧或齐泽克）这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巴迪欧和齐泽克的逻辑并不比马克思更高明，而且是一种向基督教的倒退，但这种姿态总是蒙蔽多数人。他们的哲学本质上是基督教-自由派的受害者拜物教的继承（这就是为什么想装左派的傻逼自由派特别接受齐泽克和巴迪欧），他们说：因为苏联有古拉格，所以革命在今天不可能了……

然后齐泽克和巴迪欧继续说，我们必须去设想那个“不可能的事”。这里暂且先不详细分析他们的整套错乱话语，很明显的问题是，这种逻辑完全建立在空洞的姿态上。这

种“为受难者代言”的肮脏一招要么是古拉格的一部分，要么他们口中的古拉格不存在。

革命之所以“成为不可能的事”到底是革命不可能，还是一些人不想让革命可能呢？事实上革命在今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这是仅仅是因为生命形式对于那些急于毁灭它的环境，每一天都在斗争和反抗。不存在一个阴谋论式的国家宏观调控者了，国家本身也在“为了经济”而崩溃，革命每一天都可能，问题是欲望的装配。

毫无疑问，每一个对现状不满的人都进入了一个被法西斯包围的境地，但是与其说革命是不可能的，倒不如说，把所有生命扑灭才是痴心妄想。欲望的组装总是打败法西斯。我们被法西斯包围的局面怎么办，奈格里问德勒兹。德勒兹的回答是，像挤牙膏或挤破水管那样！

黑格尔的哲学完全不同于尼采的哲学（当然也与把黑格尔颠倒过来的施蒂纳和马克思不同），尼采肯定了永恒轮回，但黑格尔通过辩证法得到的肯定则是永恒复辟 – 它总是关于复辟的学说 – 在革命之前反对革命，在革命之

后又赞美革命权威复辟之前的模式，在复辟之中继续复辟
花样繁多，但又保持革命幽灵或理想。

一些基督教保守派是诚实的：柏拉图主义的理念世界
要建立，作为手段的否定的辩证法是必要的。那么问题来
了，巴迪欧的柏拉图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与保守派的目的
和方法，有什么区别吗？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刘小枫和陆
兴华表面上对立，但其实有区别吗？一些“毛左”和自由
派之间呢？仅仅是因为一些人抱有某种观念？

自由主义和它的现代性本身就包含了最大的保守，即
使是现在的一些美国“自由意志主义”根源其实仍是自由
主义，而不是 anarchy。刘小枫“向右转”，陆兴华“向左
转”，但他们差别是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差别，仍然都是自
由主义。而这一代人，贻害无穷——堪称“毒蜈蚣的一代”！

让我们来看看更有意思的事，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巴迪
欧都喜欢批评“智者派”，但是我们必须追问 - 什么是哲
学呢？哲学来自古希腊，雅典城邦里的朋友（自由人阶层）
之间的竞技关系，而这种方式在于诤辩，用德勒兹的话来

说。Philosophy 的 Philo (φιλ ος) 是朋友的意思，所以它的意思是“智慧的朋友”。

那为什么它不是常说的“爱 (α γάπη) 智慧”，而是朋友 (φιλ ος) 呢？在圣经故事里，让人类吃禁果的是魔鬼，所以用尼采的话说，“魔鬼是最古老的智慧之友”——也许这些教士认为智慧的朋友一词不吉利……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柏拉图认为这些古雅典人各追求各的，没有一个合理性的评估，所以要提出一个“理念的世界”来反对当时朋友们之间的“诤辩”。随后，随着斐洛教义和基督教的发展，柏拉图主义成为他们神学体系的一大支柱——从里到外，斐洛和柏拉图的哲学都和基督教的教义吻合。

那么问题又来了：作为神学的柏拉图主义和所谓的“智者派”，到底谁搞得才是哲学呢？巴迪欧搞得是哲学吗？神学为什么要冒充哲学来教训我们呢？是这样的，哲学是概念的创造，德勒兹说。柏拉图的哲学创造了“理念”，但是它始终遵循一个复制-再现的模式，这就像把概念变成资本主义的商品，让人来消费式地使用。

随后便出现了柏拉图主义者和诡辩家们之间的闹剧。并且现在，艺术、逻辑分析、心理分析、计算机行业、语言学等都企图把概念占为己有，使之出售、展示和营销。然而概念不是产品！德勒兹说，概念是太空里的陨石！

那什么以哲学的名义占据概念并使之商品化呢？比如我是齐泽克，我信基督教又他妈仇恨哲学，但是我又自称哲学正统来打击哲学，我玩弄玄乎的概念就是要搞些噱头，多吸引眼球才能让自己的书和电影好卖。我的概念是艺术展品，金贵的很，我一个演讲就挣很多钱！

大明星总是有一个大屁眼。然而运用概念并不是一个学科。创造概念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为了统治。哲学认为自己统领其他学科的时代早过去了，而那些认为哲学被超越的人要么是极端保守（某些科学主义和假无神论）要么是自欺欺人。创造概念带来的是最严厉的批判，还有和权力的游击战争。

实际上土耳其“政变”和法国“恐怖袭击”的性质是一样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左派运动的失败。显然它没有实现战争机器的组装也没有在宏观政治上取得进展，也就是说既没有形成稳固的微观实践，也没有大规模对权威的颠覆，并且分子层面的经典左派话语完全可能是个软肋。

只要形成对战争机器的掌控，那么“政变”的闹剧则完全没机会上演。问题在于，左派自身的软弱性。自由主义倾向的“进步主义”话语总是让我们忽略自身周围切实的环境，以及基于个人独特性的体验。所以“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形成虚假对立的两极，左右了我们的政治视野。

如果人们同情库尔德人，那么那是个人自由，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力量。当我们自身的力量足够对土耳其当局构成威胁，那么这种支援将是富有成效的。但自由派政治利用了人们的软弱，成功利用民族解放话语使大众的视线转移至脱离他们自身生活情境的地方，虚假的团结一再上演。更何况 PKK 也不见得是光彩的。

如果说一个美国人，不顾及自己身边的各种境遇不去真正地重伤这个政治制度，反而去“声援库尔德人”，那么这就是终极自由派式的伪善。你对美国的重创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帮助。另外重要的是，反法西斯战争依靠的不是某一个政党和它的政治营销策略，我们真正该团结的是人，而不是一个党。

再加上主流媒体对畜群政治的把持，所以现状是左派运动整体的无能和落败。敌人疯狂的进攻在所有媒体上演，在所谓“自媒体”时代这种控制反而变本加厉，它直接控制大众的激情。但是，即使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各种失败，但对手的疯狂反而会促使我们更加强大起来。最后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

顺便一提。当然我说的落败，包含了类似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破土网或其他国家类似性质的政党的胜利，他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失败。他们成功地把激进运动再次体制化，并且实现了利用新媒体影响大众政治抉择的幻觉。

让我们清醒一下：桑德斯知道自己受到民主党排挤，但还是宣布支持战争婊希拉里，这本身就是非常下作的行为。重点根本不在民主党的黑幕，而在即使知道黑幕还要支持希拉里的桑德斯。自己的头子都叛变了，还在支持桑德斯的人，和破土网用户一样，都是彻头彻尾的贱民，是人类社会的癌症。

桑德斯完全是一只低等劣魔：低劣的营销政治，低劣地想要利用无政府主义者，低劣的民粹主义宣传，低劣的国家主义煽动，低劣的道德攻势，低劣地支持希拉里仍认为自己很左。甚至是中国也有白痴喜欢这一套，即使是吃屎，也要找那个最下作的一坨来舔，其效果不亚于恐怖主义袭击！

就连脸书都认识到了问题的严峻：删除了一堆法西斯的营销页面之后，连带着删了几个桑德斯的老鼠会。

Feel the bern, guys! Feel the fuckin' BERN!!

不要献身，不要牺牲自己：在中国这种基督教道德占据主流的国家，卑劣的人总是希望别人奉献，或者假装牺牲来索取得更多。牺牲自己仅仅是圆了他们的愿，要知道，我们的同志本来就不多。

为什么在中国的基督教和自由主义横行于世，这完全是马列主义的“功劳”。国家资本主义、所谓的工人国家和“艰苦奋斗”的集体奴隶化所换来的，是低贱庸俗者和暴发户颐指气使的权力。是马列主义自己革了自己的命，在自己制造的怪物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这是我在说笑吗？马列主义根本没有失败。低劣指责高贵，愚蠢和弱智嘲笑智慧，反人类被称为接地气。每一个贫瘠的家庭，马列主义自己的“理想”都是被嘲弄的对象，而这就是它最为根本的目的—想要一个弥赛亚。

但是弥赛亚不会来，而且它就是整个制度得以延续的关键：把目的本身当做自己“合法的”暴力的辩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仍然嚎叫。真是谢谢，在你经济基础好的一塌糊涂的地方，我只看到粗俗而有钱的流

氓想要沾点艺术的仙气而不得。你引以为傲的人民即低俗又淫秽，并企图扼杀一切创造性。

那些只会聒噪“左派顺口溜”的贱人，你一提反基督保准它们就像广告推销员一样告诉你“解放神学”如何。但让我们冷静一下，委内瑞拉、巴西、智利、阿根廷……这些国家到底怎么样？它们真正地向左转了吗？所谓的“解放神学”成功消灭了南美的印第安人文明，让南美从叛逆的后花园变成了顺从的后花园……

如果这些畜生真的那么相信基督教，又怎么能够自圆其说地从撒旦那里夺得智慧和叛逆的财富呢？真是低贱到了极点。

尼采具有先见之明：我们不是反对革命血腥的闹剧，而是反对它内在的道德，那些先验的“正义”和罗伯斯庇尔，它仍然是太人性的，以至于一切革命都不曾发生。

今天让我们继续。这些中国打着马列正统旗号的左派，实际上和巴迪欧使用的是相同的逻辑，但是因为愚蠢，他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还闹出把巴迪欧归类为“后现代主义”

的笑话。完全出于卑贱和愚昧，这些“左派”们早已把基督教伦理发挥得比真正的基督徒更为专业了，这里将举出几个经典例子，大家可举一反三。

这些左派散布的最为常见的谣言是，基督教是穷人不得已的选择，它给穷人提供了好处，并且据说人们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宗教情结。但这显然经过了一些话语筛选，仅提供了一个表象。实际上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倾向本身就是这种目光短浅且狭隘的利己主义，正是这点它才和犹太教不同，并不以上帝的意志为参考。

正是这种一种卑怯和贪婪，它展现了基督教最原初的面貌。在基督教诞生初期之所以吸引了许多农民、奴隶、无知的蒙昧之徒和社会渣滓，是因为它提供了许多发泄兽欲的机会。在基督教的圣餐会上，会吃掉供奉给神的儿童，进行通奸和近亲相奸。

基督徒痛斥罗马的镇压，然而却决口不提自己干下的无数伤天害理之事。除了穷人，还有一些富人，因为加入这些教派，把所有财产捐献给教会，搞得倾家荡产。基督教是穷人利益的选择，只不过是罔顾事实的虚假宣传。

那么基督教的财产公有互相帮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基督徒有了共产主义觉悟？但事实是相反的，这些基督徒极端仇恨异教徒和一般世人，于是作为反动，才像江湖匪盗一样“团结”起来，他们对内部的不同意见的处理方式，也是鸡飞狗跳，在真正的团结领域，它不但没有帮助就像 NGO 一样反而是反团结的装置。

反对基督教就是“不容异己”，这是另一个帝国主义神话，同时也是今天最好笑的笑话了。现在让我们进入重点，基督教带着它的反犹太主义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到了今天，这一根本性的反思和追责，一直在遭到阻挠。这些左派和教会们顾左右而言它的嘴脸惊人的一致。

最常见的一个神话是，是大资本家和容克地主或政客精英们利用了宗教和大众，要么更直截了当地，都是小资产阶级的错。但事实仍然相反，正是柏拉图-虚无主义和基督教伦理的结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法西斯是一个从上到下全民参与其中的运动。

这些肮脏低贱的左派之所以拼命把责任往外推，和他们内在的基督教伦理是一致的：羊群-主体必须是无辜、无罪且纯洁无暇的，然而这个腐败的“主体”却沾满了他人的血渍。巴迪欧同样故作玄虚地通过虚假的左派姿态站在教会的一边——至今，基督教会像日本法西斯一样从未正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做出正面的回应。

最后，斗争仍然在当下。这些自命不凡的“左派”在马列主义国家找到一个合法的权威来狐假虎威，但实际上它是上个世纪法西斯运动在当代的回响。同时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人对库尔德工人党的虚假宣传照单全收，并深刻地认同右翼贱民运动，玩弄打左灯向右转的把戏。这些“反抗”的姿态最后仍是为了维护既定权威。

如何理解尼采说的，是我们自己杀死了上帝呢？去了解一下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矛盾是必要的。耶稣和他的门徒都是犹太人，但是保罗推广的基督教却总想着找犹太人算旧账，这背后绝不只是一个无能和复仇心理，还有最重要的，是原教旨主义的心理起源这个当代重要课题。

先让我们回顾一些马列主义的观点：穷人是因为利益才选择的基督教，所以宗教情结不重要。然而这说出的正是基督徒最根本的情结——基督自己原谅了那些钉十字架的人，但是基督徒对犹太人的仇恨却不曾停歇，那么他们是真的相信基督吗？实际上这一受害拜物教的复仇心理，本身就是短视利己的愚众对宗教的利用。

需要知道的是，尽管基督教出自犹太教并独立了出来，但是基督本身信的是犹太教。然而保罗推广的基督教却是以仇恨犹太教为基础的，所以问题是，这一推广本身便否定了他们所要相信的上帝的意志。那么马列主义者又要说了，大家都很唯物了这不是很好？就像齐泽克认为基督在询问上帝为何抛弃了自己的时候……

齐泽克认为基督对上帝质问表达了一种深刻的质疑，所以基督教以及现代性的发展自然“很唯物主义”。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低劣的说辞。就像尼采批判道基督教的道德不论是爱还是同情，都建立在仇恨和短视的利己之上——只要条件适宜，它很快就会发展成一种狂热且迷信的宗教活动——这便是当前原教旨主义的实质。

基督教是原教旨主义的起源，这本应是一个常识。只不过随着现代性和启蒙伦理的不断扩张，它逐渐扩散到一切领域，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到犹太复国主义，从右翼贱民运动到所谓马列主义，我们总是要赖在非基督教头上了。但实际上，尽管花样繁多，但它们的内在伦理都可以追溯到圣保罗对基督教的推广。

关于黑格尔哲学如何起到同样的作用，明天再继续。由于微博的限制，这里的论述也非常简单化且不正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

最常见的一个观点是，尼采主张“上帝死了”，但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误读。实际上，“上帝死了”是在权力意志对虚无主义的考察的过程中，由刚下山的概念人物查拉图斯特拉提出的，它旨在告诉那些“丑陋的人”，是他们自己杀死了上帝。但尼采本人通过对虚无主义演变的考察却认为现代性的道德观念仍然维持着“上帝”的压迫。德勒兹的判断是正确的，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施蒂纳，尼采完全熟知这些辩证法的发展历程。这很重要：上帝之死是虚无主义中的伪事件！费尔巴哈作为反动的虚无主义，完全表达了现代启蒙运动的重要观念：“人”取代了上帝，

并使基督教道德延续了下来。直到施蒂纳提出了“非人”，有效地反驳了费尔巴哈，并系统地批判了自由主义的时候，辩证法和虚无主义最终才被推向到一个高峰，于是施蒂纳成了那个“更高的人”出现在尼采的作品中。但在当前，我们却仍然面临着一种颠倒，“上帝死了”本应是查拉图斯特拉下山如是的起点，现在却被片面地理解为一个终点。这便是当前的辩证法对尼采的解读，在这种解读之下，一切旧道德仍然在延续。

提到高人，我们最好现在就打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高人们”。我们现在向谁说话呢？向所有人说话和向空气说话是一样的，查拉图斯特拉在开篇向市场的流氓讲话，但这是个错误，他认识到必须向同伴、向破坏者、向高人们讲话才是有意义的了。

尼采的预见的是精准的，现在我们落入了“贱氓的时代”，在当前的社会，在市场上一片聒噪，所有话语都被视为“平等的”，“在上帝面前所有人都平等”流氓主张说。正如我们当前的所有观点，都被自由派强迫与法西斯平等。所以高人们如今必须离开市场、话语竞价，离开齐泽克还有那些流氓了，去珍惜同伴！

但谁是那些高人呢？查拉图斯特拉作为第一也是唯一的人，对施蒂纳的“唯一者”的暗指是明显的，但是他即施蒂纳的“非人”之后继续追问：“人类如何被超越”？于是查拉图斯特拉继续说道，高人们要学习他的欢笑和舞蹈。所以这绝非是某种隔空的理论，它的现实意义实际上直接对准了当前的一些虚无主义运动。

这些如今占支配地位的末人们问了又问：人类如何能最良好，最长久，最快乐地自己维持？透露出的是意志的虚无。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当前的一些无政府虚无主义者的卓越的斗争。它不再问话语的价值，而是从虚无意志出发独自地去展现对痛苦与绝望的征服。“再绝望也不乐天安命”，查拉图斯特拉表示爱这些高人。

CCF的斗争是决绝的，即使牢底坐穿，即使同志们被杀害，也要越狱把斗争进行到底；即使越狱被背叛，遭遇失败，也要在法庭上做出雄辩的决不妥协的宣言。这便是虚无主义演化为高峰的一种体现。但查拉图斯特拉在这里，并不是要为这些受苦的人准备床榻，去纠正他们的错误，而是要让他们接受高迈的闪电的轰击。

那些末屑之人的道德根本无法接受这种强烈的意志，所以查拉图斯特拉根本不为那些“长耳朵”说话，而是对高人们说。因为在这种虚无主义运动中能够达到最恶的高峰，而这是超人的最善的条件。“这是精美而遥远的东西！不是绵羊的小蹄所能获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查拉图斯特拉认为高人受苦还不够，因为施蒂纳提出的权力意志是从利己主义角度出发的，因而和爱人类的查拉图斯特拉不同，“还没有从人类受苦”。于是尼采进一步警觉到，我们不应意欲自己能力意外的东西。因为基督教道德总是要求天堂，但现在作为贱氓的时代，人们总是通过天堂的设想来达成自己肮脏的谎言。

这和齐泽克主张我们应意欲不可能的东西形成了完全的对立，事实上齐泽克正是原教旨主义最大的鼓吹者。查拉图斯特拉继续说，“贱氓不知道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什么是无枉，什么是正直，贱氓永远是无知的歪曲，他们永远是说谎话的人。”

让我们继续《查》的高人篇：在贱氓的时代，大家都学会了无理的信仰，在市场上只有姿势使人信服。这就是

为什么巴迪欧、齐泽克和乔姆斯基这类卖弄姿态的装逼犯受到贱氓的青睐。但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性状的问题，它在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表现，在东欧和中国的喜欢标榜马列斯毛，在美国可能就是无政府主义。

让我们意欲不可能之事的齐泽克，和指着天空想要一个《启示录》预言的神之国度的伊斯兰国成员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大话精。不过尼采继续敏锐地指出了另一个类型：博学家。这些人“不生产”，因而仇恨高人。这些人自负于不说谎，“但不能说谎与爱好真理仍然相去很远。提防着罢！”——这是什么意思呢？

用德勒兹的话说，“后康德主义者围绕着一部有关概念的万国百科全书打转，把概念的创造活动推给纯粹的主观性”，所以这些人并不生产概念，也不参与使创造概念为可能的更为谦卑的工作：概念的传授方法。于是这些博学家便造成了“绝对灾难的厄运”。这也和以破坏为己任的创造者的道路背道而驰。

随后，就像前面说到施蒂纳是主张利己主义的，但尼采在此对利己做出了肯定：你们这些创造者，自己只能孕

育自己的孩子，让我们忘了基督教那“爱邻人”的欺骗，我们不要“为了”某人或某物。其实这里其实叩响了本微博的主题。在低处的人鼓吹无私，是让别人无私并啃食他们的血肉，尼采的利己则是馈赠的道德。

不要献身，不要牺牲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像基督一样去爱，这时我们才拯救了自己，并与以爱为名的审判对立起来。基督徒树立的道德和基督本身的道德相反：“基督的事业是个体的...个体并不一定与集体对立”，并且“基督很少对我们甚少的集体的东西说话。”（《尼采和圣保罗，劳伦斯和帕特莫斯的约翰》）

不过对尼采来说，基督仍然是只关注穷人。查拉图斯特拉宣称他爱人类，并要给人类一个礼物。让我们回到高人篇，尼采也认为高人们仍然“不能做孩子的母亲”，认为他们养育不了新的概念，就像施蒂纳没有培育自己提出的权力意志一样。

同时，就像 CCF 的斗争，尼采早就预见了一些勇敢的人的失败。“越是更高的本质越是不容易成功。”但是，这些失败算什么呢？如果这些人失败，人类失败了么？即

使是人类失败了，“好吧，别在意！”让我们学习欢笑和舞蹈吧！

让我们进入最后的部分，尼采的哲学有什么现实意义，我们该怎么办呢？——问题都是多余的，现在我将更多地从现实斗争以及我们经常见到的诡辩来分析毒蜈蚣们如何利用“哲学话语”、以学术、左派和媒体的名义来影响我们的日常、语言和斗争方向的（当然不限于此微博），让一切卑贱都无处藏身。

高人篇的最后一节：让我们如同洞中突奔出来的飓风一样吧，赞美这“自由的暴风雨之精灵”，并仇·恨·那“肺癆病的贱氓之狗”，仇·恨·那“一切阴郁之族类”。贱氓哪里会抢夺什么“道德制高点”，一直以来争夺的都是“道德之洼地”，廉价又无耻！让我们学会这刻骨铭心的仇恨吧！这便是来自高处的摧枯拉朽！

尼采向来以对“正义”的仇恨见长，不过就像德勒兹说的，要了解尼采的哲学就必须知道他反对谁。答案一目了然，尼采继承了从叔本华就开始的反黑格尔的事业，尼采的整个哲学无疑都是对黑格尔哲学-基督教神学的一次

扫荡。这里便涉及到中国的傻逼左派乐于提到的“主奴辩证法”，以及对整个革命神话的批判。

实际上辩证法从仇恨古希腊城邦的苏格拉底就开始了，但问题并不仅仅是辩证法颠倒了主人与奴隶的内涵，真正的问题在于它对主奴的思考，用的是奴隶的道德和视角。所以尼采的哲学绝不仅仅是简单地再次颠倒主与奴，并且理解黑格尔的“主人”仍是奴隶自己的建构是重要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贱民运动。

这即是说，根本不存在“主奴”的辩证，而是奴隶之间的辩证，“奴隶辩证法”才是它最恰当的名称。它总是奴隶之间在道德上的较劲，去争夺那个“最善”，谁才是那个更好更合格的奴隶。所以尼采的重要性不仅是指出了当前我们面临的奴隶的统治，还有对建构的治理的批判，奴隶通过建构主人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这便是奴隶之间的辩证：新来的奴隶总是看老奴隶不顺眼——我累死累活到手3000，工头游手好闲还是要多点，所以辩证一下，我继续努力工作争取“打倒那个主人”，因为我符合了所有奴隶的美德所以我必须上位。但问题是

它和统治者自己的道德也是一致的。并且这新旧奴隶之间的两种辩证，构成了当代中国的政治。

在苏联和中国，马列主义正是通过奴隶的辩证来垄断了一切权力和革命，并不仅仅它在革命中宣称自己奴隶的主体性，还在于掌控权威之后用奴隶的道德维护自己的统治：让我们勒紧裤腰带赚外汇，老老实实工作，给资本主义打工，有朝一日自己成为主人，而那些挑战权威和破坏道德的人，是人民之敌。

这一奴隶道德的传播，便是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及其治理技术的精髓，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当代战略：统治者维护想要自己的地位，就制造更多的奴隶，并且利用奴隶的否定（所谓的反抗），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也是中国一些“反对派”和民间马列主义如何运作的，它连自身的存在都要依靠统治者的施舍。

尽管辩证法之间总是倾向于互相对立，在“马列主义当权派”和重称“奴隶主体性”的辩证之间，重回列宁的“新左派”和打左灯向右转的“新右派”之间，但它们的伦理是相同的。并且通过对诸如“主体”、“永恒女性（欲望

的客体)”、“主人”、“女性”、“事件”等等一系列的建构，企图抢夺一切道德的洼地。

但为什么说这些概念的建构，类似共产主义观念、主体等等仅仅是反革命运动的激进化呢？——是这样的，革命是一个事件，但正如德勒兹说的，事件是（生成的）结果；同样主体是身体之间链接的结果。但是巴迪欧让事件成为一个神话，让构成主体的生命，成为神话主体的支配物，所以它仅仅是要构筑一种顺从道德。

不得不佩服基督教士们敢于踏足进一切领域的精神。这些无耻的傻逼在一切领域叫嚣：革命是不可能的！真是谢谢，另一个辩证法家弗朗西斯·福山也是这么说的，这些号称“反对历史终结”的辩证法家和他到底有没有矛盾呢？

其说基督教在伊斯兰世界没市场，不如说基督教已经完成了对伊斯兰教的腐化。实际上一些伊斯兰教士（比如霍梅尼）的现代伊斯兰主义，一直在寻求和贯彻伊斯兰的基督教化。根本不存在什么境外势力或境内势力的神话，因为这些逼玩意都是制度自己培养出来的，即使真的是什

么“外部敌对势力”，也可能是本国有钱有权的流氓和土逼搞出来的。

一些马列主义者为了给法西斯舔屁眼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真是一不留神就要被带到坑里。现在让我们继续澄清一下：基督教在罗马是受到“压迫”而“反抗”的吗？就像前面微博里提到的，辩证法制造的最大的道德既是对秩序和奴隶道德的服从。这从苏格拉底就开始了，因为辩证法就连自身观点的表达，就如齐泽克，都是依靠从权威的裤裆下抠出来的那点“权利”。没有一个既定权威，辩证法也将不复存在。事实显而易见，圣保罗在罗马传教，要求得最多的是服从：“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在罗马时期的基督教，反抗被视作大逆不道，那些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在马列主义这里，不仅吹捧基督教对做奴隶光荣的赞美，而且这种对统治阶级的彻底服从，反而成了“革命”。今天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这些低劣的骗术到底为何能够屡屡得逞？而且这是把握尼采哲学的关键。

还有人问到，如果我们反对马列主义和基督教对工作的赞美，废除工作那我们怎么生存呢？问题是这样的，由于现代性源自西方，我们必须从西方的文化中找到答案。从希腊语词源上来看，工作和奴役使用的是同一个词，所以废除工作仅是废除奴役的另一种表达；没工作就不能生存的意思是，没有奴役就不能生存。

何以见得我们生活在奴隶统治之下呢？在马列主义国家，如果你觉得做奴隶不光荣，劳工和劳动不神圣，赞美工作与奴役是反动的，说出这些最直接的事实，却让你感到犯了某种巨大的错误，你觉得自己不道德甚至被冠以“反革命”，这足以说明问题了。不过就如尼采所说，现代人早已不能接受任何事实了。

所以辩证法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呢？一面是国歌里的演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另一面又宣称让我们把奴隶做到底自然就成了”主人“。就像德勒兹说的，辩证法的肯定和尼采的肯定是相反的，辩证法仅仅从所谓”他者“、邻人、义务和索取的奴隶道德出发，从总是说出”你应“，而尼采的骆驼要去承担重负是建立在强大者的能动性上，它是一个能承载的精神和强大的能力，从而要求自

己的责任。正是这种主人的能动中，进一步，它将变为狮子，说出“我要”。就像“沙织与二四七集团”在五一节期间的公报里提到的，今天的革命就是走向冒险的旅途，勇者开始要去战胜恶龙了——尼采说，狮子要去成为主人“这最后的上帝之仇敌；它要与巨龙争胜”，而这只巨龙是“一只放射着金光的甲兽，每个鳞上都有‘你应’的金字！”而去创造自由和一个神圣的否定以对抗义务——这便是狮子的工作。

当我们读懂尼采，自然也就明白了齐泽克鼓吹的“成为他者”到底说的是什么，以及主张的是什么了，这些东西不过是千百年来不断重复的道德。现在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他者”，而在于对“他者”的建构，我们总是有一个结构的他者来证明所有人都是“反常的”了，但是那个结构的他者根本不存在！辩证法总是二元的，并且有个动态的过程：建构出来的他者形成了道德上的审判，这对自我是一种摧毁，另一方面这一建构也毁掉了那个“客体”，它又不断地重新安插一个强制的自我，这便是它的两面性。

毁掉那个客体，就像现代性用强制的自我毁掉女人那样，就像“主体民族”毁掉边缘群体一样。结构主义发挥

的作用是如何指导我们成为那个“他者”，我们都不得不成为表演家，去演绎那个“他者”的奇观了，表演癖，这也是当前的运动如何进入景观化的过程，就连反抗，在今天也是表演形式的！

现在我们总是看到电影里的“革命”情节如何跌宕起伏，革命之路如何蜿蜒曲折，但现实比电影更精彩！

美国：野火(Wildfire)第五刊：夏天快要结束了，但事情却在监狱和街头燃烧起来。在美国各地，同志和囚犯们正在摩拳擦掌地准备2016年9月9日的反监狱行动协调。在未来几周，无政府主义犯人团结周开始了，它标志着1927年8月23日萨可与方齐迪被国家谋杀，并把记忆转变为今日的斗争。

1971年9月9日，纽约北部的犯人控制了阿提卡矫正所(Attica Correctional Facility)。持续了五天的阿提卡起义，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监狱叛乱。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反对白人至上主义和监狱社会的永久性标志。

阿提卡以来的 40 年，监狱的膨胀充满了被破坏的生活、破碎的家庭与社区。

关于无政府主义者 Sacco 和 Vanzetti 的案例这里就不再详细说明了，已经有人把此事改变成了电影《死刑台的旋律》但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无政府主义者 Sacco 和 Vanzetti 受了难，自由派和共产党却是那个受益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必须回到基督教根深蒂固的逻辑才能明白这一切……

无可救药的基督徒奥古斯丁的话完全暴露了其中的卑劣：烈士的鲜血是自由的种子——原来是一些号称自由的蛀虫，在啃食自由精灵的血肉！这些自由派打着抗议司法不公的旗号，“站在被迫受害者的一边”，但是这些蛀虫，什么时候尊重过受难人的观点呢？他们利用受害者拜物教情结，最终是拿来为无能和软弱来辩护。

无政府主义者的战斗是要创造自由的生活，但自由派却通过虚假的认同直接把这些激进性镇压了下去。出于彻头彻尾的卑劣，急切地想要终止无政府主义者的战斗。我们的历史除了只剩下一个干瘪的“受难者”的形象，变得

空洞而乏味，那些斗争和不屈的意志统统被抹除殆尽。难道基督教不正是如此对待基督的吗？

我们必须大声地问——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的牺牲，如今却成了自由派贱民运动的垫脚石？！无政府主义者因自己的观点而受到处刑，如今他们的观点从来没有人尊重，但自由派却利用受难者在媒体上大谈自己的“良心”！！

值得一提的是，巴金在法国留学期间就曾投入过萨凡事件，积极地与当时被囚禁的 Sacco 和 Vanzetti 通信表示声援，期间还翻译了 Vanzetti 寄给他的《一个无产者生活的故事》。并在这个事件之后，巴金一口气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

监狱正在沸腾，无政府黑十字（ABC）不断加强着狱中同志的团结，无政府主义犯人们则发出一封封信件鼓舞士气，事件仍在发酵。现已发出国际无政府主义团结行动的呼吁。

为什么反监狱在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说，在“自由和民主”名义下大规模囚禁和对革命者的迫害的从未停

歇，监禁技术在今天越来越发达。并且这不仅仅是一个非常现实和迫切的斗争，在理论层面的斗争也一样重要：精神分析学派的除了把潜在的革命倾向解读为“危险的”，至今仍在鼓吹自由并不可取。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精神分析学派到底是怎样一步步病人膏肓的。以朱莉娅·克里斯特瓦为例（当代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的法国哲学家），所有论点都是一个意思（当然齐泽克也是一样的）：我们身处“一个自由社会”，一切罪过都是我们太自由，问题总是我们的法律太不严厉，成为“戏剧性的表演”而没有意义。

这便是辩证法在精神分析中的继续发挥。由于只考虑症候，所以它的结论也是症候：因为法西斯的继承者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进行统治，所以我们都太自由了，所以自由是错误的，于是这个傻逼继续推论到——那个法西斯也不存在了——典型的用基督教道德绑架语言来玷污概念，也是为什么今天的反抗也是让语言口吃。

当代神学和中世纪神学没有什么不同，它不是去关注现实如何，而是让现实变成理论的模样，用铺天盖地的党

派和媒体的宣传，用运动来做训练。精神分析两眼一抹黑就开始叫嚷，在今天没有监禁，自由是一个陷阱，他要像个拿着刺刀吹着胡子的傻逼将军一样抱怨，苍蝇掉进咖啡里是纪律不严了。但事实是怎样的呢？

就和辩证法的“主人”是奴隶建构的主人形象一样，精神分析的“自由”直接沿用的是自由派和基督教的所有价值（拉康，一个耶稣会牧师），最恶劣的一点在于，它的目的都不是斗争，而是像齐泽克假借批判和分析把意识形态神话化，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关于“自由的神话形象”，并进一步巩固机构对我们的统治。

最直观的现实就是，真正的监禁不但延续着，而且在私有化的进程中疯狂地扩张，一切都和精神分析的鼓吹相反。如今监狱在美国创造的利润每年有数十亿美元。就像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也是一个把犹太人变成廉价劳动力的地方，日本军国主义掳走中国劳工也是同一目的，监狱在今天发挥着相同的作用。

除了中国直接把自己的国家监狱化 - 中产阶级消费景观和无数给农民工提供的加工工厂 - 几乎所有知名的

大企业都从监狱的监禁来获利：星巴克、麦当劳、美国航空、辉瑞公司、微软、全食超市、爱玛客、AT&T、耐克、沃尔玛、任天堂、本田、斯普林特、富达……诸如此类！但在齐泽克这类人眼中，这些都不叫事！

种族奴役、难民监禁的“再利用”和高效的社会隔离，都在全球企业的利润下疯狂扩张，假如你是黑人，一个小错要么让你被击毙，要么会让你成为监狱劳工——这便是精神分析口中法律不严和自由社会的形象！

这群名副其实的黑格尔右翼，故作深沉又不可救药的傻逼，现在却来摆出革命大师的架势。

精神分析仇恨自由绝非空穴来风，这和柏拉图仇恨古希腊城邦、仇恨人类的智慧、马列主义赞美劳动和奴隶道德是一致的，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传销式诈骗，最终这些道德都可以追溯到打倒原罪和撒旦的基督教伦理。哲学、科学和艺术，自由、智慧和欲望这些东西全都和基督教与精神分析格格不入。

对基督徒巴迪欧和齐泽克来说，自由和智慧自然都是魔鬼用来蛊惑人心的东西，于是顺理成章，一边鼓吹反智主义和宗教观念，一边自称是追求真理的哲学，让人们放弃自由称之为解放的观念。精神分析和辩证法在今天的反动，实际上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被许多左派表演过一遍了。

在今天，我们的“时髦理论”仍然在毫无新意地自欺欺人。之所以这些骗术能够轻易地成功，全靠马列主义成功地让所有人都变成了傻逼，对一切都毫无免疫力。就像巴枯宁的观察，这些黑格尔主义者，“尽管在抽象观念世界中有热烈的革命主义，而在现实中，在 1848 年和 1849 年都不是革命者，大部分是反动分子”。打左灯向右转的游戏，在 1848 年就开始了。不过我们必须明白的是，黑格尔主义到底是怎样成功地把反动包装成革命和进步的。

就像之前提到的，黑格尔首先是对合理性的辩护，它的肯定和尼采的肯定也是相反的模式，奴隶用讹诈和“你应”来要求别人来达成利己并称之为同一与普世的，但尼采的肯定是对权力感的肯定，进而说出“我要”来达成差异与个性。黑格尔仅考虑症候来得出结论，最终是要小心翼翼地保存一些庸腐的事物不被破坏。

仅考虑症候，就像只考虑闪电作为一种现象，把闪电这个事件和闪电本身相分离，这就是它的方式，它的否定和结论也建立在症候之上，并且这个否定最终是为了虚假的观念服务。这就好比一群侏儒或政客盛赞和“贯彻了”进步价值，但是却成功地让一切改变都没有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当前的一些左派，还是齐泽克、巴迪欧还是乔姆斯基，在一些问题上总是重复相同的套路。在改变没有到来前，它始终在维护服从的道德但却表现得比谁都革命，直到基督教-自由派劫持了整个运动，这些臭名昭著的“左派”全都转而为之鼓吹，这些闹剧重复了一遍又一遍，但傻逼们从来不长记性。

说到乔姆斯基，这个卑劣的小丑前些阵子还理直气壮地指责无政府主义者不给伯尼·桑德斯投票，配合着桑德斯的宣传老鼠会拼命地造势。不过万幸的是除了一些傻逼，没有认真的无政府主义者听他的。

尽管巴迪欧口口声声“反对民主”，齐泽克也装模作样地批评自由主义，但一转眼他就会变成这些把“自由民主”当牌坊的法西斯的蠢驴。因为两者从根本上分享的是同一套价值观，从根本上就仇恨无国家也非帝国的古希腊

城邦。实际上这种打左灯向右转的把戏，从李卜克内西到列宁到当前的左派都是一脉相承。

我们总是听信了马列主义官方编造的那一套革命神话，但事实是，革命从来都没有发生。并且没有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和同情，它将毫无影响力（在中国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帮助翻译和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从一开始就和李卜克内西一样，急于反对一切工人真正的革命诉求，直到十月革命前夜还在支持资本家。在掌权前彻底反对革命，在窃取权威后又不留余力地反对工人建造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方式，把国家资本主义和泰勒制工作方式当作苏联的唯一出路，这便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列宁是如何使用辩证法的。

在今天，一些畜生仍然想旧戏重演，为了舔自由派的屁眼，假装批评“新自由主义”，不巧的是，IMF就在不久前和这些“人民革命家们”发表了相同的观点，“有良心有道义地”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这些立场全无的畜类，却成功地使人们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和人们站在一边的。当然，从先验的正义来看他们确实站在一边，但是在今天，这些人都格外地不重要了。

关于奥运会有许多争论,即使这些争论看似复杂 – 比如是不是坚持举国体制 – 但我们仍然被贱氓造就的舆论所误导。实际上,无论是马列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现代启蒙–基督教这类“理想主义”,本身就是对古希腊悲剧精神彻底的否定。所以这些争论永远在于“如何反对奥林匹克”,而不是贯彻奥林匹克。

奥林匹克精神根本不在于某种理想,也不存在于任何现代性观念之中。少用什么狗屁的理想弄脏了奥林匹克了!尽管“更高、更快、更强”是在现代提出的,但它背身就体现了悲剧精神中“自我超越”,问题根本不在于“高、快、强”,所有问题都在于现代启蒙和资本制度的肮脏的手对它的玷污。马列主义更是从基本上就贯彻了启蒙–基督教叙事的所有逻辑。低贱之民总是要把自己的龌龊事 – 嗑药、伤害运动员、商业化和理想主义 – 赖在奥林匹克的头上。明明是自己玷污了一切高贵,但它反身指责是奥林匹克的“理想”是个错误。所以问题不是是不是要举国体制,而是高效率地打击贱氓。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反对（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拼命地鼓吹的）对职业化和工作-奴役伦理的赞美，让奥林匹克回归到业余，让高贵的人能够重新参与，让艺术和诗歌的喜悦重新出现在伟大的变革之中。真正的问题和当务之急是：我们缺少自己的奥运会，就在“奥运会”举办的时候，我们也要举办一个自己的。其实国际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

在今天也只有无政府主义者能搞起真正的奥运了。现在有许多贱氓压根不敢提到奥运会本应只有业余运动员参加的，不过不打紧，事实上反对职业化与现代性的奥运会，可以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它涉及到斗争、团结、组织、文化与建设等不同的层面，并有利于一个真正跨国“社区”的形成。

有同学问道，巴迪欧的辩证法体现在哪儿呢？这里让我们明确一下，实际上巴迪欧完全明白基督教的伦理，他最聪明的地方恐怕就是从圣保罗那里找到了普遍主义的基础，然后用他自己的话说，“颠倒被尼采颠倒的柏拉图主

义”。作为马列主义兼现代柏拉图主义者，巴迪欧对辩证法的体现并不难理解。不过有几点需要注意的是：为了让柏拉图的理念成立，本身就需要一次否定的辩证。举例来说，一个比真实更真实的苹果的理念，只能通过一次辩证，也就是否定现实的苹果来实现。另外，巴迪欧认为尼采颠倒了柏拉图主义，但这仍然是辩证法自己的观点，因为简单的颠倒并不是尼采的哲学，恰恰是辩证法的体现。

并且需要弄清楚的是，（暂且先抛开青年黑格尔派）辩证法的实质是对合理性的辩护，因而它并不是去构成某个事件，参与到进程中，而是把先验的事件作为理论起点。所以它也是滞后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尼采彻底颠覆柏拉图主义之后，巴迪欧仍然可以继续辩证下去，黑格尔的永恒复辟有一个动态性。

最后在补充点。为什么说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覆并不是简单的颠倒呢？用尼采自己的话说，废除了真实世界，虚假世界也一并被废除了。这个虚假的二元对立是一并被废除的。我们之所以成为“影子漫游者”，是因为一个被设想的理念世界正在使我们成为“假象”，但是在正午，谎言被破除，一切都重合了。

在正午，也是自我被超越的时刻，那个影子发挥了所有的作用，并且那才是真的我。

关于一和多：巴迪欧是从本体论来辩证一和多的关系的：先有同一性然后自然出现了多，就像他认为先有构成真理的事件比如 68 年，然后才有各种宗派，而更现实的那一面，比如人类本身，比如无政府主义的黑旗（当然它是出现在五月风暴上）是一面红旗的“影子”。而尼采的永恒轮回并不是辩证的和同一的——就像德勒兹谈论尼采的文章提到，永恒轮回与其说是相同者的回归，不如说是相同者的不断生成，在不断生成中肯定差异。在永恒轮回中一就是多。而巴迪欧的柏拉图-虚无主义认为“一既是无”，实际上正是尼采所反对的生病的形象，它是对永恒轮回与差异的恐惧、怯懦与逃避。

必须补充的是，这永远不是一个终点，因为破除长久以来的谎言仍然是危险的，辩证法仍然企图无耻地曲解它，查拉图斯特拉仍然有他的猿猴。并且这里才是攻破齐泽克和巴迪欧的最后防线的地方。

今天的辩证法来自“时髦理论”精神分析。但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假如影子才是那个真的我，那么拉康及其理论不是“正确”的吗？齐泽克更是直接指责德勒兹弄了半天，搞得还是黑格尔。但白的终究成不了黑的，现在让我们去真正弄清是怎么回事。

尼采对影子的使用始终是站在反柏拉图主义立场上的。换句话说，影子漫游者终究是一种存·在·，属于狄奥尼索斯的星座。影子指涉的是人类和世界本身。但是精神分析和巴迪欧与辩证法一样，企图颠倒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覆，但说的和做的仍然有差距，实际上它做的又是对尼采本身的颠倒。

明明属于基督教范畴的精神分析，却被一群学术流氓称之为精神分析继承了尼采。这种蠢驴的胡扯仍然在流行。但问题是，就像巴迪欧和齐泽克对拉康的使用，仍然是把虚幻的映射的“自我”当作一种主体的建构，从而重复了柏拉图对世界的颠倒。精神分析的自我和尼采的影子相反。

精神分析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欲望的配置。精神分析的欲望始终在制造着消费主义的“欲望奴隶”和“禁欲主义”，

但就像基督教的清规戒律和圣餐会上的放荡一样，这两者并不真正对立，反而是一个现代奴隶政治的统一体。换句话说，它始终小心地维护“自我”。但尼采的哲学，自始至终都在反对这一关于欲望的理解。

另一个难以察觉的地方是，尼采的“生成女人”这个事件。因为生成是微观的，所以它难以察觉。尼采始终在漫游的影子是狄奥尼索斯的星座，但正午却是阿波罗的星座。要知道，中世纪并没有终止，尼采所处的时代仍是无边的黑暗，但当时的一些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还仍然只是黎明前的一颗明星（路西法的隐喻。）

所以正午并没有真的到来。但是现在，正午必须到来了！要终止马列主义和齐泽克之流的辩证法的谎言，属于阿波罗星座的人必将成为正午！

那么主体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呢？有同学分享了巴迪欧的《主体理论》问道。巴迪欧如何从没有主体到主体捍卫者的？巴迪欧的主体是不是一种生成？——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没搞懂结构主义和辩证法的根本问题：阿尔都塞的

“科学主义”和巴迪欧-柏拉图的虚无主义仅仅一步之遥，仍是辩证法的一种发展和演变。

尼采早就批判过这类低劣的“科学主义”，并把它视作虚无主义的发展。因为在辩证法的伪事件中，“上帝死了”，但是它的伦理却始终支持一个神圣的人把基督教伦理继承下来，因而辩证法仍然不断制造着新上帝。所以阿尔都塞，用他的马克思主义同行的话说只不过重复了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并且是种伪结构主义。

中世纪之所以延续，是因为结构主义无论是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还是拉康的精神分析-辩证法，有着一个共同的假设，笛卡尔的二元论，也就是基督教的灵与肉的分离。我们的现代性，始终是建立在一种神学上的。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巴迪欧脱离了阿尔都塞的无主体论调，实质上是现代性神学倒退回中世纪神学。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巴迪欧转而坚持柏拉图的牧人政治。在他的原教旨主义政治中，主体在末日审判中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主体-羔羊这一角色，弥赛亚的国度就不会降临。但是就像前面说过的，巴迪欧的主体和

阿尔都塞的“无主体”实际上同属于辩证法的虚无主义发展和演变，因而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在《主体理论》中除了一般的辩证，还有一个细节是，一个物存在着与观念的不和谐，也就是所谓的 $A=(AAp)$ ，物总是企图超出自身，因而存在一种断裂，而主体就是那个填补断裂位置的存在。巴迪欧以此来弥补拉康的自我-主体理论，从而认为它是一个“运动”的主体。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举个例子，叔本华早在几百年前就指出黑格尔的这一错乱了，物总是要超出它自身达到他物，就像黑格尔那臭名昭著的论断：“万有引力和惯性定律直接相矛盾，因为借助于万有引力，物质力图越过它自身而达到他物。”（见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巴迪欧只不过是把这种错乱原封不动的继承了下来，然后包装成了“新的”。

就像德勒兹明确指出的那样，辩证法由于只考虑症候及其抽象的关系，所以它的术语都是空洞的。辩证法总是提到主体，但什么是主体却得不到任何解释。从拉康的主体到巴迪欧的主体的运动，只不过把这一空洞延续了下来，这个主体仍然是无。另外重要的是，这和当前流行的治理

技术和 IMF 的战略也是一致的——巴迪欧的主体并没有生成，因为这就是国家程序在个体身上展现的另一版本：在当前的反动中，运动的主体意味着自发的臣服，让国家的主体技术在自我层面实施，并且因为这一主体仍是无，所以也是自我虚无主义化。从柏拉图到卢梭到黑格尔和马列主义，这一辩证神学始终沿着同一路线倒退（据称是前进的历史进步）。

问题始终是生成，因为主体和事件一样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身体之间的连接才构成了一个主体，但巴迪欧仍然让主体成为先验的，并且要求关于“忠诚”的道德规训，但向谁忠诚呢？这里已经没有神也没有主人了，所以这一忠诚也成了日本明治维新时代陷入虚无主义的武士，成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同义反复。

这也很好的解释了陆兴华明明反动的一逼和新右翼眉来眼去，却整天巴迪欧和齐泽克，想要装一个左翼逼。

现在我们来看齐泽克之流的鼠辈部下的另一个陷阱——关于反二元论也是二元论的迷思。就像齐泽克在《自由的深渊》里提到的，虽然我们在谈论笛卡尔范式的终结，

但是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之间而然有一个二律背反。总之它仍然是二元论，他也如是指责德勒兹故意构成基督教反面。

反二元论也是二元论，现在让我们把这段话翻译一下，这样我们才能看清他说得是什么：那些构成反对基督教那“善恶二元”论（和笛卡尔）的非基督教价值（比如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一并构成了二元论。在这整个的论述范式中，只有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对立了，原来在齐泽克眼里，基督教就是大清帝国。

肯定永恒轮回是说“一就是多”，那我们是相对主义者吗？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事实，所谓的相对主义的真正来源正是这样一种二元论：世界上只有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了。正是齐泽克逢迎的主流价值要求了相对主义的存在，所谓基督教和一切非基督教“是平等的”，只不过齐泽克的原教旨主义又不断要求扩张。

现在让我们进入重点，聪明的同学也许早已发现了这一语言战略，主流叙事自己创造了原教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虚假对立，然后齐泽克之流又在相对主义的道德基础上，

又不断地提出永恒的复辟并自认为高明。这种虚假对立最终根植在侵略的逻辑之上，就像基督教摧毁了罗马，相对主义表面上声称一切都平等，但实质又是把一切高贵和基督教的卑贱和野蛮平等起来，这本身就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体现。然而现在所谓“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又被当作一个脸谱化的标签，被贴在一切反基督道德上，还是为了基督教中心主义的扩张，换句话说，它们是一套价值观的一体两面。并且这也是统治者惯用的策略，一种臣服的建构主义。齐泽克所逢迎的的主流价值使用了这样一种建构主义，然后又把这种价值观说成是反对者的。正是奴隶道德构成了当前现代性的残暴统治——暴君罗伯斯庇尔与列宁本身就是奴隶道德的传播者——就像所谓主奴辩证法的奴隶道德建构了虚假的“主人”的形象，我们许多观念都来自这样一种建构。就像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使用了微观政治来进行公民的规训是种建构主义，法西斯使用永恒女性和雅利安人来进行建构，但当我们从微观层面和建构的层面来考察这些卑劣的统治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建构主义是不对的。

今天那个要求反对虚无主义的人，恰恰是那个虚无主义的最大制造者。所谓“后现代相对主义”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它的来源正是帝国本身——更准确地说它是所谓自由派的后现代主义或基督教的平等价值观——帝国创造了这种道德，然后又把这个标签贴给一切不服从的人来遏制一切反抗。

最近齐泽克又对特朗普评论了一番，我们直接进入观点吧：齐泽克向来假装“批判”左翼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义，然后又认为特朗普“凭借一种种族主义的、厌女症式的粗暴语言，把共和党从其传统的对原教旨主义、恐同和反堕胎意识形态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所以特朗普是个伟大的黑格尔主义者。如何理解呢？这里的经验是，面对辩证法和现代基督教神学用常规逻辑理解本身就是错误的。由于它是一种语言的滥用，因而与现实总是相反的，要知道怎么回事必须进入辩证法的内核才行。

我们都知道齐泽克“反对”左翼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义，但是由于特朗普的不满（辩证的否定），最终现代自

由主义的进步价值得到了拯救。这就是为什么说辩证法仅考虑了症候。左翼自由派仅仅是一种后法西斯的治理，它的自由仅是一种权威治理模式的宣传的虚假表象，但是辩证法从症候出发，我们要从自由中寻找不自由才是解放了。但辩证法和结构主义一旦使用自由这个词，就已经是腐败掉的自由，把那个表象当作真的。所以齐泽克的真实逻辑是左翼自由派总是伪善（太自由），用进步和女权标榜自己又有一个战争倾向，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作为一个否定（不自由），反对了自由派的虚伪，所以特朗普很辩证很解放，是一个“伟大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正是由于辩证法仅从症候出发，所以手段（追求不自由）和最终观念也是一种症候。

齐泽克认为特朗普通过当下流行的右翼民粹言论，“拯救了”共和党原初的一些政策。但是又由于这种否定也是个症候，那个结论也是个症候：齐泽克假装叛逆了半天，最终又回到了一个“纯粹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又是对自由派的“进步主义”的高度赞赏——特朗普“阻止了”原教旨主义，反对了恐同。翻来覆去，最后还是回到了“自由派最好”，原来在他眼里左翼自由派的多元文化主义是

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让我们巩固好同性恋和女权权利，而这些都是现代性的神圣价值，世界照旧但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进步观念就行。但我们不要忘了，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这就是为什么说辩证法从症候出发时为了维护那些最陈旧也是最反动的道德。齐泽克之所以在 pussy riot 成为中产阶级代言人的时候还在表示赞同，因为这就是当前的反动所在。就像犹太复国主义拉拢同性恋和酷儿运动还维持自己的进步形象一样，现在的新右翼刚好从自由派的进步主义来宣明一切歧视性观点的，所谓“新无神论”、女权主义，反对“非法移民”，这些政策完全是共和党原有基础之上的发展，根本没有齐泽克鼓吹的那种真正的进步性，并且这都已经是现在的新纳粹的战斗领域。

我们还会发现如果把齐泽克的观点换位到他所反对的“原教旨主义”一边我们会发现完全没有不同，“西方世界”太自由了，新近的现代伊斯兰教旨主义也是这么说的，两者之间之所以对立最终只是因为不同的本位主义视角。并且就是在今天，我们亲眼目睹了“回到列宁”的新左派和“进步需要扩张”新右派，如何在黑格尔主义和现代基督教神学的旗帜下，可耻地走到了一起。就像在“沙织与

二四七集团”的《祝欧盟早日完蛋》里提到的，近来的右翼民粹主义是“民族国家的旧理想”的复辟，这些当时的“进步观念”在今天已经彻底反动了，齐泽克只不过重复了民族国家树立的一切观念。

看了汪民安的福柯纪录片，现场的人出乎意料地多。片子很好地阐释了福柯的观点，涉及到人的建构、知识与权力、主体与自我技术、与德勒兹的关系等等。我觉得它提供了很好的讨论话题，下面将进一步探讨。

福柯与德勒兹的一大分歧便是对欲望的理解。在福柯看来，现代的问题是人人都谈论欲望，但是就像在古代中国人们谈论性是只谈快感的，所以福柯并不认同欲望这种说法，因而不谈欲望只谈快感和满足。但就像较早以前的微博提到的，福柯对欲望的理解仍然延续了结构主义和清教徒的理解，并不像德勒兹那样重塑它。换句话说，我们恰恰能够从这些关键性话题察觉到阿尔都塞对福柯的影响。就好比福柯对于作者和主体的观点（这个早期的结构主义观点被阿甘本当作福柯后期观点），他认为作者这一先验

的主体不存在，这和阿尔都塞认为没有主体是一致的。但是这些结构主义的理解对于转向尼采的福柯来说，仍然像一个桎梏。

“欲望”（让我们加上引号）的战略在当前的社会控制中至关重要。福柯所厌恶的人人都谈欲望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恰恰是因为清教主义提倡的禁欲生活和基督教文化向来把欲望视作原罪，我们总是要打倒那个恶魔了，但是这一对“欲望”的塑造产生了同一价值下的两种体现：放纵与禁欲；消灭与纵容。但这都不是尼采所赞同的。尼采所提倡的纯粹肯定，是转向狮子的欲望“我要”（因而最终也带来神圣的否定）的关键，这个欲望并不立足于匮乏与满足。因而就像福柯的男情人说的一样，福柯的哲学仍有许多黑格尔的要素（当然福柯和德勒兹仍然感情深厚）。这阻碍了我们去理解当前的斗争中遇到的一些困惑。

就像观众提问中提到的，我们如何理解当下并且该怎么办呢？实际上除了人的建构，福柯提到的“自我技术”也是他的哲学中尼采风格最重的地方。为什么我们总是要提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呢？因为就如尼采所说，那时候的人

用审美价值来自我超越并从事战争，这 and 现代性中的正义、律法及社会规训是完全不同的。

但问题是，我们仍然不断地询问如何回应这个资本主义现状与现代性，就像骑驴找驴一样。实际上自我技术是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道德，我们不断回到古希腊，正是一种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态度，这便是德勒兹所提到的“一个战争的人”，但由于福柯在欲望-自我的问题上含混，我们也开始找不到方向然后就悲观起来。

战争的人当然也出自尼采的“渣爷如是说”，这时伟大的审美事件也将一并发生（诗歌与艺术，就像古代奥林匹克也要比赛诗歌一样），实际上这种不合时宜的提出，就已经告别了无主体和永恒主体的规训。这在德勒兹的哲学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对自我技术的理解的空白我们完全可以从德勒兹哪里来找到弥补。如何回应呢？这意味着，让哲学本身发挥作用。并不是说哲学去指导一切，而是构建不同平面（哲学、艺术和科学）的平滑空间，从而产生创造性的逃逸线。因为先验的正义的道德判断已经在一切领域发生了，就像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宣称语法是先

验地存在于婴儿中一样，所以哲学这时只能去与权力展开游击战。

这种哲学与权力的旷日持久的战争，恰恰建立在一种自我超越的基础上。战士最终只服从一条命令 - “超越人类”。这种自我超越也发生在一切层面，比如在哲学中超越哲学，左派中超越左派，超越语言，在自由中也要不断超越... 这是重要的，尼采之所以完全反对黑格尔，是因为后者在一切层面中倒退。尼采批评了无政府主义，也批判了启蒙价值，但这并不是说尼采是完全反动的。这就好比一些“进步人士”、新右翼、齐泽克和中国的一些马列主义者，尽管把进步、自由、解放和左派当作旗号，但是黑格尔主义这时便发生作用，这些人只是把这些名词当作自己反动的掩护罢了，那些“反资本主义”的人却是最顺从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成为那个不合时宜的人，去构建一部反击性的战争机器，并且最重要的是，去脱离资本主义运作的平面。这便是超越自我，这本身就是一种方式。因为一些马列主义者和左派在今天传播的恰恰是最流行的东西——去融入资本的平面，做个螺丝钉并感到自豪，不断地强调自我-主体和基督教文化。这种左派的辩证法在

今天恰恰是让我们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神话和“经济人格”制造的人类机器的东西。在媒体和一切掌控“时代精神”的进步人士手中，人类不断地成为齿轮和畜群，并且在“神圣的进步”的名义下无目的的劳动。那么在今天成为不合时宜的人意味着从一切层面都与之相反，这便是今天的斗争。

那么到底是乐观还是悲观呢？革命在今天还可能吗？实际上不只是德勒兹，尼采的哲学早已告诉我们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切身处地的去在日常生活中哲学起来（什么是哲学呢？），在哲学、科学和艺术的三个截面中大笑并舞蹈。

关于“他者”的批判是重要的。德勒兹并没有对此花费太多篇幅，只是因为这一批判蕴含在整个反结构主义哲学中了。当前的一些狗屁知识分子和猴子都喜欢把主体、真理、事件、同一和他者挂在嘴边，但根本不明白自己在说的是什么，自己在做什么，以及自己是个什么玩意。现在让我们帮助他们理解一下。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他者”不是一个地狱，“恶人”是被推入地狱饱受折磨的：地狱所发挥的功能是审判。基督教所倡导的爱和以爱为名的审判系统构成了地狱，换句话说，他者之所以被建构起来，是来自奴隶道德的需要，它起到“原罪”一样的道德功能。他者首先构成的是审判，然后我们才被罚下地狱。

他者是被建构的，因为这仅是一个常见的语法：那里总是有一个不幸的、受害的、不知名的人，这个人是谁以及存在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们说话前必须先成为有罪的。他者仅是一个语言上的存在。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者和原罪一样，这个把我们的社会变成地狱的道德，和你收到的诈骗电话类似——他者、原罪和福音——你总是有一个永远欠费的信用卡需要缴费；你突然就有了福音，有人要来拯救你于水深火热，你中奖了；有一个傻傻的赚钱方法，发展下线，诸如此类。这些对任何发育健全的人来说，都是粗陋无比的骗术，但我们仍需要认真地思考，为什么这些低级的骗术总是得逞。

对基督教发展历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套道德之所以流行起来，和我们内心的软弱有关，那些被逼入窘

境的人总是先上当受骗，基督教最先吸纳的是一些社会浮渣，这被马列主义者认为是“关心穷人”，但事实与之相反，这些人仅仅是自己的贪心被一另一些市井恶霸所利用罢了。这种低劣的道德流行起来后，才有一些贪婪的知识分子为之辩护，这种诈骗最终才扩散成社会性的。罗马并不是因为基督教“反抗”才使之成为国教，而是因为它鼓吹对权威的顺从，那些堕落并急切想要权柄和钱财的贵族才会突然变成“迎合大众”的人，但这么做和那些社会浮渣使用的逻辑也是一样的，随后罗马才被彻底摧毁。

不得不说现在中国到处都是骗子，也和马列主义利用机构对“主体”的操作有关。所以我们最终发现，自由主义（现代基督教神学）的所有道德，在ISIS、法西斯和马列主义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它们之间的对立仅仅是一个神话。但这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让我们以全盘接受自由派聒噪的“他者”的齐泽克为例：

齐泽克所热衷的“意识形态批判”恰恰是掩盖我们被现代基督教神学统治的关键。意识形态在这里充当了一个上帝的作用，意识形态总是全知全能。但是这一对症候的批判本身也是症候。现代人杀死了上帝却不承认，又不断

地制造新的上帝来攻打，但这一攻打却是对当前统治的顺从。在现代性中发挥作用的始终是机构。

也许有人不理解，为什么制度有那么多反对分子，但是又不断地任命这些人成为官僚（所谓的收编）？这便是现代性的统治，它不相信任何意识形态。你的反对，仅仅是发明新的上帝，多好的孩子。尽管你攻击我的意识形态，但是你的身体却很老实，你反对的再响亮，只要你能完成制度安排的任务就行。

这便是自由派关于“反抗”的神话，一边拿着工资成为制度的一部分，一边叫嚣自己多么叛逆，顺便在标榜一下自己的“良心”。但是这种反对是虚假的，那个最终的相信（自己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也是虚假的。齐泽克之所以能够在媒体上眉飞色舞，是因为国家或马列主义的机构，完全喜欢和信赖这样的人。

他者一方面建构出来作为审判，另一方面被安置到我们的自我中。这便是所谓的”客体小 a“，它不毁掉男人，相反的它毁掉那个客体—女人。他者的审判最终是要在社会层面审判那些真正正直的人。这个他者在政治领域的展

现，便是“同一与多”的所谓二律背反。他者构成同一性是什么意思呢？那些反对者都是他者。机构的统治塑造了一个“反对派”的共同体，这个他者的建构最终是要驱逐，是要驱逐制度自身的灭亡，而这个建构重申了同一性，同一性的成立便有了“多”，反对派又要倡导多元性，不过这个多元性还是为了驱逐，一切皆平等的意思是，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平等。现代政治总是要依靠同一性的多来维持。

这就好比说基督教始终要来打倒那个撒旦了，但是基督教自己先塑造了一个撒旦。否定的辩证和消极的虚无主义只是不断地把“他者”当作自我的一部分，但由于只考虑症候，而不考虑机构的统治，这个反抗又是机构统治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尼采说要克服自我，这个克服是连同着“他者”一并克服的。

所以一个有着“他者”的自由，是自由派发霉的自由，或者说是奴隶道德的展现。而尼采所称赞的自由，克服了他者的建构：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因为这个词意味着巴比伦，意味着那些被驱逐和铲除的异端，意味着生命形式，

它们不是被教会支配和建构的产物，而是真正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生龙活虎。

我们确实活在一个由“他者”构筑的地狱世界了。就像基督教叙事总是提到一个混沌的地狱，其中的恶魔彼此欺诈彼此征战，最终有一个整合各种势力的大魔王要攻陷天堂，地狱的世界，是一个意志的世界。那个意志最强力的恶魔，是和地狱杂兵斗争出来的更高级的存在。

是的，在地狱中的我们，也是依靠意志来征战的，那些“欲望的奴隶”则成为地狱中最低级的存在。不过大魔王终归只是一种权力的塑造和虚假的形象，并且大魔王体现的正是虚无的意志。大魔王影射了“高人”的存在。但是就像尼采说的，在高人之中也有贱氓的味道。大魔王被基督教建构出来，一方面是规训末人；另一方面，大魔王的意志的力量，被扭曲成了反动的力。这就好比 ISIS，尽管我们称之为“宗教狂热”，但实际上它的成员最坚信的仍是最世俗和功利的价值观，天堂的许诺就像贿赂，他们口中的“神之国度”，哈里发国，最终也是落实到了自己的短视和愚昧上。尽管伊斯兰国成员不愿当工资奴隶选择加入了“圣战”，但是虚无意志成了反动的力，这也像任

何法西斯主义运动——法西斯是在逃逸中转向了自己的反面，转向毁灭和死亡之线的。法西斯生成了维京人，但是又要回到民族国家的公理层面来追求种族优越了，但维京人向来是被视作杂种种族的，法西斯从来都不敢承认。换句话说，当前的反动都来自与启蒙同一套伦理的建构。

那个大魔王最终实现的“自由”，因为总是来自他者的建构，用尼采的话说，是有霉味的自由，总是带有贱氓的气味。是的，我们当然可以被称作魔王（请叫我魔王 247），但是我们的存在早就不依附于任何基督教的建构来证明自己了，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异端，一个基督教永远也铲除不了也改变不了的异端。

现在根本没有什么马列主义的女权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的女权主义这一说了，特别是无政府-女权主义，这是过去的辉煌，但不是现在的荣耀，因为斗争总是向前进的。只有一些败类才故作姿态地停留在过去的辉煌里，是卑微和无能才促使他们仅仅保留这一姿态，身体向右，精神向左。

当然现在有人完全可以这么自称：我是 XXX 派的女权主义者。但我们需要弄清楚，这只是他想这么认为，这都是庸人的一厢情愿，而不是一个事实。因为在现代性走向烂俗的过程中，一切“派别”之分都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仅仅是“保存自己”，一切派别都化成了一个派别，“派别们”也仅仅为了同一个目标服务让。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一个愚蠢的左派，一个越活越倒退的人，一个越读书越像猴子的人，他们要“为了我们而斗争”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呢？或者更直接的说，这最终是为了谁而服务的呢？如果够聪明的话，这是为了权柄；如果够愚蠢，显然这是受法西斯的支配。现在不再有派别之分，只有消逝的同一留下的多样。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所身处的，是一种由各种姿态组成的“激进的意识形态主题公园”，而这个公园仅仅是自由派的一个经营理念罢了。

乔姆斯基的问题：作为知名的学者，乔姆斯基经常被认为是最知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对他有着不错的印象。但这些都只是一个表象。乔姆斯基并没有承认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Let me just say that I don’ t really regard myself as an anarchist thinker .” 其次是他语言学上的一些问题。

由于媒体因素，经常出现的现象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声音通常被忽略不计，而乔姆斯基作为公知总是“代表着”无政府主义。甚至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都在批评乔姆斯基，但主流政治总是刻意忽略这些批评，于是就造成了乔姆斯基=左派良心学者这么一种幻觉。就像我提到过，乔姆斯基和齐泽克这类左派总是虚假的姿态。

就在不久前乔姆斯基和齐泽克还进行过“论战”，但这场论战更像是一场闹剧，远不如乔姆斯基和福柯的论战，后两者才是真正的交锋和冲突。乔姆斯基指责齐泽克在摄像机前装模作样，而齐泽克则回应说乔姆斯基是英美哲学的传统，但他们的立场还是相似的，没必要有什么剧烈的冲突。

齐泽克和乔姆斯基的“论战”完全暴露了自己的愚蠢：两者相似，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结构主义立场，然而可笑的是乔姆斯基同样作为笛卡尔主义者，明显属于理性主义传统，而不属于分析哲学。当然这次我们主要谈论的是乔姆斯基。经常有人认为乔姆斯基作为语言学家和公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我们有“两个乔姆斯基”，但这篇文章激起了许多探讨。这里，我们显然需要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和笛卡尔主义有一些了解，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是笛卡尔呢？两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乔姆斯基认为，需要在语言学中重新回到古典科学传统，这就好比笛卡尔在他那个时代找出一种不同于当时科学的科学。乔姆斯基在笛卡尔那里找到了灵感，比如说，一只骆驼被施了魔法变成了石头又变成了河，那它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那是骆驼变的但物理特性又完全不同。

笛卡尔刚好提供了这么一种二元论：“在考察[物质对象]是否在我之外存在前，我必须考虑一下他们的观念。”也就是说，骆驼作为一种观念存在着，尽管它变了形，观念还会告诉我们这是骆驼，尽管在物质层面它是一条河。

为了论证上帝的存在，笛卡尔把观念当作一种实体和精神的对象：我们理解和认识圆是因为我们认识圆是因为我们具有一个圆的观念，就像我们看到变形的骆驼是物理对象，同时我们用心灵看到了一个观念的对象。然后乔姆斯基进一步，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这种变化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具有连续性，那只骆驼作为观念对象存在于我们的心灵的看。换句话说，乔姆斯基像笛卡尔一样始终坚持着心与身的对立。

但这恰恰不是一个科学范畴能够概括的。重要的是，笛卡尔的方法：怀疑。就像 $2+2=4$ 这是一个逻辑真理，是上帝的知识，如果我们不能质疑，那我们怎么证明它是正确的呢？于是作为二元论的理性主义者，笛卡尔开启了一条消极虚无主义的道路，我们有必要假设一个无处不在的恶魔——尽管不能反对二二得四，但是这只无处不在、法力无边且将欺骗为己任的恶魔，却可以让人相信二二不得四。换句话说，我们的“真理”是必须通过“战胜恶魔”来捍卫的，于是，“无思故我在”——我的存在也是通过“恶魔”来确认的，如果恶魔处心积虑地要骗我，那么如果他骗了我让我认为自己不存在，那证明我是存在的。

“我”的存在，总是依靠那个以欺骗为己任的恶魔。而那个恶魔被设想出来，则是为了上帝和“我”的存在服务。实际上这也是当前的虚无主义政治——这个虚无主义被实施，是为了上帝和我服务的。就像银行家安置了一个“人民”在抗议群众身上，也是为了让人民为了自己服务。

消极虚无主义的否定和查拉图斯特拉的否定相反：当权力在起义的浪潮中被拽到了地面，成了和我们平起平坐的流氓，权力就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了，就像隐形委员会提到，“我们是人民“或”我们是 99%”的口号，这种“否定”恰恰是构成统治权力的基石，并且是用来阻挠起义的。所以说这是问题的所在：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真的和政治是无关的吗？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二元论，向来是现代性政治的一个范式。让我们回顾乔姆斯基的政治观点，尽管摆出了左派造型，但终究是个姿态，和齐泽克是类似的，例如在巴以问题上，乔姆斯基支持的是奥斯陆协议中所谓“两个国家”的解决方案。

让我们注意这个细节：乔姆斯基作为犹太人，支持的是新教伦理。实际上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难怪乔姆斯基在麻省理工学院一面为 CIA 服务，一面又不断扮演一个良

心的知识分子了。让我们回到语言学上来。就像德勒兹的观点：“只有一种强势的或标准的语言的条件下才能科学地研究语言”。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必须把那些混杂在语言中的“外部变量”清除出去，让流变的和不断生成的语言，变成一种标准的、同质的、公理化和普遍的语言。这种语言学总是仰赖于科学，但实际上确是“用来维护另一种秩序”。“合语法性、符号 S 和绝对符号是什么呢？在作为一种句法标记之前，它们已经是一种权力的标记”：现在问题根本不在于你是否具有一个“先天的语法”（它总是不灵验），真正的问题成了你的语言不符合语法性，你对社会的服从还不够，一切都是你的错，或者你生在一个错误的体制中了。这种对语言的统一，何时成了不属于政治性的东西呢？但是我们的低能儿们，那些“无政府”自由派们，就是不这么认为！

更多可参考以下文章：

Who is Chomsky? – by John Zerzan

实际上我们都明白什么是权力意志，根本不需要什么三脚猫来阐释了。因为“为了权柄”当然也是一种权力意志。但真正的问题就像尼采提到的，这是转向腐败（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贪腐）和堕落的意志，一个转向反动的力。这里不得不说的是，我们阅读尼采是要干什么呢？或者在阅读中怎样“反俄狄浦斯”呢？

尽管尼采式反对启蒙和科学主义，但尼采显然不是我们为迷信和陋习辩护的理由，尼采要做的恰恰是最大限度地遏制迷信和陋习，而实现全新的自由。注意，是“遏制”而不是“打倒”或“根除”。因为启蒙在实质上是继承了基督教伦理，尽管启蒙赞美了自由和科学，但启蒙又要像基督徒那样要“打倒恶魔”了。

启蒙仅仅是出自一种卑怯和无能，因为战胜不了愚蠢和迷信，所以这些鼠辈又炮制出一个个“时代精神”，一个个新的神圣，用迷信来打倒迷信。它还把错误赖在生命

形式上,启蒙成为一种审判,我们的世界不得成为地狱,每个人又不断地背负着新的原罪。所以这就是问题:那个要打倒迷信的人本身就是跳大神的。所以这里需要明确尼采的斗争方式:等级制度。关键不在于如何打倒愚昧,而在于驯服愚昧。就像傻逼在市场上看谁的声音大谁就是真理,那我们要去市场上变成傻逼来斗争吗?这根本就是傻逼之所以成为傻逼的逻辑。权力意志在于,远离傻逼,才能驾驭傻逼;远离市场,苍蝇才不会自以为和我们平起平坐地指手画脚。

尼采并不是不明白什么是“掌权”,就像他自己说的,给他一票追随者、犹太银行家和军官,他可以做得比当时的德国人更好。但问题是,尼采并不需要一只捍卫他的狗,尼采并不喜欢一个指导和教授的模式。所以我们的阅读,也从来都不是去寻找一个既定的权威,然后在巨人的身后当一只卑微的侏儒。

但我们身上总是存在一只“查拉图斯特拉的猴子”来和我们自己作斗争的,就像诱惑浮士德的魔鬼。不过不是我们要打倒魔鬼,我们是因为比猴子和魔鬼更强大才驯服它,这样才不会成为那个“永恒女性引领我等向上”的浮

士德。尼采从来都是需要能够战斗的同伴，一个意志强大者的同盟。

现代人的阅读总是带有俄狄浦斯情结的。我们的阅读这时更像去找个爸爸，然后“爸爸的女人”更性感了。傻逼们喜欢齐泽克，喜欢的是一个擤鼻涕的爸爸在电视上装模作样。但显然尼采不是我们的父亲，就像德勒兹说的，我们和尼采的关系不是近亲相奸，而是“鸡奸”。去“鸡奸”，这才是我们如何克服俄狄浦斯。

举办我们自己的奥运是天方夜谭吗？其实已经有人办过激进版本的奥运会了。在1936年的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革命时期，它是为了抵制纳粹举办的柏林奥运会。

关于我们的奥运越来越可行，它必然砸中那些马列主义、法西斯和自由派臭虫。现在他们果不其然地跑出来叫嚣。这些可悲的基督徒，把一切不符合自己神学的东西都归类为“资本主义恶魔”：尼采是资本主义的；法西斯喜欢运动，所以运动是法西斯；现代民族主义用奥运会传播

自己的理念，所以奥运会是民族主义——法西斯臭虫，现在化身成正义使者，跑过来“反对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了。但是臭虫即使把什么美好的东西往自己身上贴，不出一天就会变臭的——裤子洗的再干净，也包不住里面的屎，光是接近就臭气熏天了好不好？

现在让我们明确一下，奥运会的举办就是为了战争，这就好比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是战士的民主它和现代“民主制度”一点关系都没有，最重要的是，它也和辩证法的精神格格不入。马列主义和基督教的造谣总是系统性的：像古希腊城邦那样搞就一定纪律涣散，是无组织无纪律是无政府主义。但造谣永远不是批评，马列主义自以为能通过造谣和拙劣就能够打败“恶魔”，方法却是他们塑造了一个恶魔的形象（比如在马列主义国家无处不在的“无政府主义”），并用这个虚假的形象来攻击自己的论敌，这种弱智的表演一再上演，被一些狗屁知识分子捧为真理。巴迪欧正是这样造谣德勒兹：德勒兹这个恶魔是资本主义的，他不得不。

再比如一些库尔德运动，卢梭的契约论、马列主义、默里·布克金和现代民主搅和起来的大杂烩，被称之为“无

政府主义的”，但这个无政府主义又是根据“对敌人的想象”编造出来的，它着实糊弄了不少自由派傻逼，还妄想着蒙骗有所无政府主义者。这些饱受批评的败类掌权后又开始宣称自己的权力在逐渐下放，但很明确的是，这完全是一场建立在腐败之上的运动，所谓的征用童兵根本不是重点，而是在于它在内部建立的黑洞和排除的秩序。辩证法的逻辑自始至终被贯彻，它怎么会不知道自己仅仅扮演一个国际政治的棋子的作用，但是这恰恰是流氓的策略，流氓当然不是库尔德人本身，而是和自己的敌人共进晚餐的贱氓。

在这场闹剧中，革命自始至终都是不存在的。尽管号称人民的大会如何被召开和运作，但让我们记住，马列主义号称的工人民主是如何在自己的党卫军的“监督”下，变成了填字游戏的。在革命神话最辉煌的地方，恰恰是革命最稀缺的地方。喀琅施塔得的起义最终败给的不是列宁的政府，而是马列主义继承的基督教的腐败伦理上。马列主义革命的方法：贿赂；反革命的方法：还是贿赂。问题不再于苏维埃的成立，而在于如何让苏维埃变成奴隶国家，先从贿赂人民开始：给你一磅肉，就不要再想着什么真正

的苏维埃了，好好工作，将来才有出人头地的一天。经济人格在于训练。

但马列主义并不是贿赂的开端而是结果：一个“圣洁的”形象，恰恰从完成了的腐败开始。这就像尼采说的，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是基督教腐败的继承。所以它是一种腐败的进化。如果没有人民的腐败，那么这个国家一天也不会存在。反腐的逻辑：腐败现象遭到了最大的打击，但是我们都相信一个腐败的伦理。

但马列主义能战胜谁呢？它所谓的战胜，仅仅是重复自己敌人的行为。马列主义自豪于把恐怖主义当作党纲，但一个贱奴即使用枪逼我们下跪，我们抬着的头也会告诉他们什么叫做“一个俯视”。这些气急败坏的侏儒想方设法地想要扑灭无政府主义运动，每一次都在意淫自己的成功，但每一次也更加地渺小了。

当库尔德运动提到民主和自治与战争无关的时候，实际上是放了一剂让我们在危急时刻安然入睡的毒药。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在和 ISIS 以及各种势力的战争中，PKK 和它的姐妹党并没有选择去组建一部战争机器没有进行社

会自我组织的斗争，反而用西方乐于见到的“进步价值”和“公民社会”来教育它的“人民”。库尔德当局这么做，当然是因为要在各种国际势力之间斡旋，充当一只走狗才有饭吃。显然它并不真的把心思放在解放和反法西斯战争上。但这就是问题所在，库尔德运动仅仅重复了当前斗争中的无力、不安和反动。

当前的反动，完全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愚昧、下作和无耻，什么叫做声称自己要革命的畜群，与其说这是革命，倒不如说是如何展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的顺从。同为黑格尔主义的新左翼和新右翼之所以能够团结，是因为他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所谓“公民社会”上，也就是说在和 ISIS 的斗争期间，这些人仍然期望自己的“人民”表现的像下班时坐在地铁上的白领。这些败类无耻地将“对公民社会的不服从”，简称为“公民不服从”，一边下毒，一边又想瞒天过海。库尔德运动所鼓吹的大会，只能是在全球各地流行的“大会拜物教”的翻版。因为这种大会的组织方式和构成要素都是类似的——就像隐形委员会在《致友人》提到——“委员会极端的官僚化将持续，它需要两个星期才挤出一份难啃而又无趣的两页文件，来解释

‘我们相信什么’ [...]所有由原子组成的全体大会，除了一起感动之外，只能体现一种对于政治的错误理解而造成的麻痹，始于一种无法改变世界的无·力·感·。”

我们的 Rojava 革命，真的存在吗？或者说，它仅仅是一些人在战争时仍然还在左右摇摆，心想着怎样左右逢源，如何革命就像如何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蛋糕。一定有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意见”但觉得不对，可是提出新方案又麻烦的文件可以通过，革命也像个办公室文员在准备了几份文案供来老板选择了。

尽管具体情况不同，但库尔德和津巴布韦大有相似之处。只有彻底的贪腐才能导致津巴布韦的现状，但是我们要问的是，这种现状到底出自什么样的伦理！一个时刻把自己武装成革命代言人的家伙，怎样通过传播堕落来上位，然后又怎样吹捧“人民”，怎样许诺一个“彼岸”，又怎样在通货膨胀到用钱擦屁股的情况下，又不择手段地让所有人尽量安静的？

在每一个“主体”的背后都有一个黑洞，这就是津巴布韦：社会-共同体根本不是出自革命的需要，而是自诈骗

的需要。当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成为奴隶的时候，它的领袖仍然“民族解放”那老掉牙的神话故事，那么他到底是反抗者，还是殖民的帮凶呢？这也是库尔德人所面临的问题，那个对自己人殖民搞得最凶的人，也是那个民族大义和社会责任喊得最响的人。所有种族主义首先就来自一种内部的隔离和驱逐，然后才指向外部；所有暴君都来自内部，然后才有被殖民。而革命政权的确立在于如何贿赂它的“人民”，困难仅在于让它的人民变成只懂得吃喝拉撒的动物。

以上就是为什么古希腊的战争精神在今天是很重要的：它不仅仅是反对腐败的伦理，更重要的是打破当前反全球化运动陷入的僵局，实现新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方式——改变生活。细胞，组织和分裂！

现代人的愚蠢大多时候并不是因为天生愚钝，而是因为启蒙制造了一种卑微的伦理：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不灵，并不是他一根筋，而是有一个伦理驱使他的坚持；人们并不是认同腐败，但人民本身就是个腐败的存在，所以必须

捍卫腐败，这种腐败称之为“权利”。傻逼最终还是出自卑贱：故意不知道和装作不知道。

现代人的文明没有任何荣誉可言，因为它的每一部分，全都是由无数孱弱、卑微和自欺的片段组成。只是到今天它的有名无实才暴露出来。是的，文明更虚幻了，“更珍贵”了，但也更脆弱了。如果这时候还说“它难以战胜，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这同样是自欺，或者说，我们遗忘了自身的力量。

“所以该怎么办呢？”有无数想要真正改变的人都在问相同的问题。但此时的我们都像那个想继续腐败下去而不敢改变的人了——“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我们在长久以来的伦理的训导下，都已经有点舍不得那个给自己提供天然正确的权利了。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没有一个“现成答案”，而在我们安于裹足不前。

当前唯一的激进：用锤子思考。这就是我们如何批判现有的价值，成为那个肯定的人，并在和法西斯的赛跑中获胜。无论是过去的尼采，还是现在的隐形委员会的同志们，说的都是这同一件事。当然，批判也不是造谣，不是

某个 NGO、小政党里的小政客来为民谋福祉，它没有“打倒恶魔”的功能，也不履行任何义务。

如果了解了尼采的哲学，那么我们将会对当前发生在哲学、艺术、科学和政治领域的事情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和“大众的”以及“社会的”主流观点相反。下面以日本为例，从价值的批判，以对伦理的考察来把握我们面临的现状和问题。同时我会弃制一些无用的名词，比如诺斯替或逻各斯，代之以其他概念，比如二元论或普遍语法。因为诸如逻各斯这样的概念，对于一些“学者”来说，仅仅是一个彰显自己知道什么的名词。实际上逻各斯出自斐洛教义，而这个教义又被基督教所抄袭，逻各斯仅意味着“父神的儿子”，“神的羊群的牧人”以及赋予秩序的“神的语言”。所以装逼迟早是会挨嘴巴的。

实际上大多数年轻人早已了解日本文化作品中的“主流叙事”，知名的从奥特曼，到勇者斗恶龙、哆啦 A 梦到 EVA、山本英夫、物语系列、寄生兽、灵能百分百等等，诸如此类的作品总是探讨相同的主题。这些流行文化之所

以总是被认为有某种深度，是因为它总是把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参考，从而提出了一种肯定的伦理。

不过问题却在于，这种肯定是一种辩证法的肯定，相同的主题始终在重复：太阳之国的宇宙治安官打倒了黑暗怪兽，人文情怀战胜了激进的黑暗势力，光明最终战胜了大众心中无尽的黑暗，太阳和月亮、草薙京和八神庵、光明与黑暗 blablabla... 这些符号穿插大多数作品中，二元论始终是一个参照。实际上这种叙事是和日本在现代历史中所遭遇的困境的一个体现。作为一个卫星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中，如果不能真正地把头抬起来，那么这显然是一种耻辱。所以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需要（意识形态仅服从机构的需要），一种月亮之怨（也就是阿里阿德涅之怨）是必要的，这种耻辱意识被传播和主权的确立相关。

自始至终辩证法都必不可少，那个光明战胜黑暗的辩证法的肯定，出自一个否定和怨恨的伦理，而这个伦理又是民族国家秩序所需要的。从日本赤军派到弗朗西斯福山，都在使用同一种伦理。山本英夫的漫画完全道出了这样一种心情：日本赤军派在以色列搞恐怖袭击，我们之所以感

到高兴，是因为我们终于不再是水族箱里的金鱼，日本人在国际政治中也能够成为焦点了，哪里有什么世界大同的理想，赤军派是为日本出头了。所以这就是问题，这种伦理又支配了现代政治的各个派别，也浸渗到一切文化活动中去。这种伦理在政治中又是如何体现呢？

让我们在以“寄生兽”为例，趁着那粗糙的电影版在中国上映。寄生兽开场就来了一段“绿色柏拉图主义”的表白：人类污染了环境，所以消灭掉人类，环境就会变好。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法西斯主义，当然我们的电影并不是承认这样的观点。反动的虚无主义作为法西斯意识最终化作失控却被愤怒包围着的战争机器，最终被一个肯定所战胜了。但是问题还是出在辩证上——寄生兽最终是作为人类社会的现象被提出的，那个绿色柏拉图主义的表白出自一个人类市长，他的心愿是让寄生兽来制衡人类。但是这种“激进的愤世嫉俗”被人文主义所战胜了，环保、和平、自由和爱再一次被讴歌。这就好比说法西斯日本作为战败国退出了舞台，然后日本从此在废墟上建立了一种“幸福的和平”。

这种“幸福的和平”正是弗朗西斯福山的自由派公式：福利+市场=幸福。不过让我们不要被这种辩证所欺骗，难道这种末人所向往的“幸福的和平”不正是法西斯最终的目的吗？换句话说，这种辩证的否定以及肯定仅仅是延续了绿色柏拉图主义：是的，让我们有点环保精神吧，要不然绿色柏拉图主义又来了。

不要忘了，否定的辩证最终是为了论证柏拉图主义的理念世界的。福山只是在辩证的基础上继续辩证，在现代性基础上辩证来的法西斯，继续辩证成为自由主义幸福公式（当然齐泽克和巴迪欧是在这个公式上继续辩证）。而这种柏拉图主义的愤世嫉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隐形委员会的同志们确实分析得精彩。隐形提到了尼采：「没有人比愤怒的人撒更多的谎」。而“愤怒者”仅仅是出自无能的情绪，他的反抗也是无能：“他假设了自己的无力以便随时可以撒手不负责任，然后将它转代为道德、有道德高度的情感[...]我们曾见到一些生气的人搞革命，但愤怒的群众，除了无力地反抗之外，我们不曾见过他们干别的事。”

愤怒的市长和寄生兽们除了激进的态度，确实没干成任何事。就像一些人说的，愤怒和生气确实不同。不过我

们要说只有生气的革命，没有愤怒的革命。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就像前面提到，寄生兽中的人文精神和绿色柏拉图主义之间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虚假的对立，而这个二元论又是来自主权的怨恨。

这种始终在流行或亚文化中出现的主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一些政治问题。这就像评论乔姆斯基时候提到的，笛卡尔为了确信自己的存在，设想了一个非理性的恶魔，然后用这个恶魔来论证自己的存在。这种辩证法的否定模式，始终也在现代政治中发挥作用。这也是我们如何理解日本当前的一些现象。

我要说的当然不仅仅是每个政权都喜欢塑造敌人或危机来确保自己的合理性，而是说这个主权的伦理，在许多文化、集体与个体层面都被坚持着。这就好比我的愤怒尽管显得十分道德和激进了，但我最真实的心声却是希望一切安好。我们的“肯定”最终是肯定一直以来占主流地位的道德，我塑造敌人也是敌人塑造自己。

一个关于他者的伦理：让和恶魔斗争的我们，最后也成为那个斗争的恶魔。这个非理性的恶魔也就是一种消极

的虚无主义最终是来要求我们用牺牲来换取末屑之人所向往的彼岸世界。安倍政权的出发点当然是建立在民族国家所推崇的一切“进步价值上”，但是此时的在野反对派们和安倍所推崇的价值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就像法西斯的伦理向来是先从主体所制造的黑洞来扩散的，我们心中所精心维护的“珍贵价值”，恰恰是那坨腐烂变臭掉的东西。在法西斯合法登台之前，它的伦理早就在社会领域扩散完毕，一切党派哪怕是表示反对的“左派党”，在呼吁的都是同一种东西。尽管现在的自由派们开始哭号自己如何被打击，但事实上自由派仅仅是完成了那个关于“他者”的演出，而这个标准的现代品德课程，在传授的又是安倍所倡导的。这才是现代政治：人民总是受贿的共同体，根本没有一个单凭政客就可以决定世界走向这回事。是我们对那个贫乏的伦理的坚持，才造就了这么一种可悲的现状，然后又摆出受害者的姿态来要求更多。

作为“黑暗势力”，在补充一点。查拉图斯特拉作为拜火教的先知，说出了拜火教和二元论本身无法说出的东西。尼采的肯定和辩证法的肯定是相反的，尽管当前的道德家们也提到反对虚无主义，但本身传播了更多的虚无主

义，尼采的肯定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一种和奥特曼的 M87 星云里的光之国不同意义上的肯定。

最近又有人提到了**人工智能的问题**，这个话题被炒得火热，所以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些误区。之所以人工智能成为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触动了上帝造人的伦理，另一方面“科普”营销号和科技公司热衷于炒作这个话题当然有着商业意图，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所提出的现代基督教神学。

我想黑客帝国的动画版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现状，那就是：人工智能完全是个伪问题。当前真正的危机根本不在于机器变成人——如果机器变成人，那一切又回到人本身的问题——而在于人变成机器。这里我们一方面有必要去审视支配这现代化进程的伦理是什么，另一方面是去把握当前的神圣的“人”的治理。

福柯和德勒兹在这方面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不过他们最终还是围绕着尼采对现代性的洞察来出发的。现在让我

们简单地概括一下，就是在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理性文化主导下，人类进入了一个虚无主义的进程，它的特征就在于一切都无目的的运作，这就好比说，当前治理我们的经济体系，本身成为了一个目的，经济理性成为我们人格的规范，而我们去搞经济最终还是为了经济。经济本身现在不再是一个手段，而是去判断一切合格与不合格。对规范性的审验，正是对齿轮的校正，但那个齿轮又是对人类本身。这个伦理在过去让工人依附于机器成为螺丝钉，现在信息化与技术又让我们成为输入和输出的装置，既是对社会的服从。

这也和为了艺术而艺术的伦理一致，问题在于这种艺术正是国家来寻求治理的工具。所以现代性带来了它真正的问题——对人类的贬损。换句话说，“智械危机”的提出，巧妙地回避了我们真正面临的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对“智械危机”的思考，我们又不断地回到费尔巴哈，机器也是人，又开始歌颂人的“神圣性”。

对“人”的讴歌也是启蒙所确立的伦理。普遍性被确立，根植于原罪意识之上：因为基督代我们受了难，我们是有罪的，他是烈士，是弥赛亚，是希望和拯救了，所以

我们必须崇拜他。我们开始把自由、爱与和平当作训诫来规范我们的生活。但是这个崇拜就像是把闪电的发生和闪电带来闪光现象相分离，烈士可以是闪电，但是现代人却只思考闪电带来的现象，把这个自由所引发的现象当作普遍的价值。这就好比说基督徒并不愿意去践行自由，而是用抽象的关于自由的价值去规范其他人，他聒噪关于自由的伦理，最终是为了得到自由的拯救。但是自由何时垂怜过这种只想着获得拯救的人呢？这种基于原罪上的道德规范，总是需要一个受难的基督，一个受害的“他者”。然后卑怯的人（就如齐泽克）又开始鼓吹让我们去“成为他者”，但这并不是真的去受害，而是说我们要用“受害的”形象武装自己，进一步用道德规范人类社会，那个真正受害的人却总是在这些流氓的视线之外。

了解这些，再让我们进入黑客帝国的世界，必须说它是一个颠倒的世界。黑客帝国构筑了人类与机器的战争，但是那个机器人的社会是被客体化的存在，那个客体正是由“他者”构成的人类社会本身。所以如果我们把黑客帝国颠倒过来，这时候恰恰能发现长久以来让我们被统治、

被治理的话语到底是什么，以及波德里亚带我们进入的误区。

黑客帝国所设想的“第二次复兴”里的劳动机器人，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人类成为机器的现状。这些机器人受到“人类社会”的排斥，“毫无人权”可以被随意地抛弃和消灭，对应的正是西方国家的主流视角。黑客帝国对机器人的刻画，和白人中产阶级如何看待劳工和“第三世界”国家是一致的。

但真正的问题是，这个机器人社会作为“他者”的存在，也出自同一伦理的规范。波德里亚始终强调，让客体发挥作用，但却止步于此。那么机器人们干了什么呢？机器人确实组建了战争机器：骑着战马飞驰的骑兵，不知疲倦地把战争的号角吹响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我只剩下一条手臂，只要它能够扣动扳机，即使机器构造的脸庞不再留下任何眼泪，但是战争也必须进行下去。这就是所谓的“智械危机”。所以这里面临着一重颠倒，也就是说，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并不是对机器的恐惧，它最终所恐惧的是“复仇”，是自己长久以来所背负的罪恶。但是这

个由机器人所构成的“他者”的社会，仅仅出自这种原罪上的想象。

换句话说，这种白人中产阶级视角的目光也是恶毒的：“我们”欺负了“他们”那么久，“他们”的反抗也将是一个法西斯的形象。劳动者脱离资本的平面去构筑战争机器，去超越人类的那一刻，被刻画为盲目的复仇。而这种伦理在“他们”之中扩散，又有助于“我们”道德的净化，甚至那个危机也从来不是真的，危机（包括法西斯主义）被当作管理的方式，末日论的提出也是为了治理当前。巴迪欧和齐泽克之所以如此着重地强调“非西方国家”的虚无主义如何，恰恰就是出自这么一种心态，但他们却从来都没有正视自己的“主体”的虚无主义化以及腐烂和溃败。

现在无论在哪个国家每个个体面临的处境都是一样的：你走出的那一步，最先遇见的敌人根本不是什么被自由派鼓吹出来的想象中的“无处不在的铁幕”和凶恶的警察 – 自由派本身就是那个铁幕 – 而是一个关于腐败的伦理，用

贿赂和“革命”来消解革命，用各种方法消解你的意志，让你怀疑你的存在。

我们的第一道阻力总是来自身边或所谓的“同志”，不是帝国而是一个整体的环境。因为现代政治的治理并不来自一个想象中的独裁者式的管控，而是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马列主义早就说的很清楚了：用人民监督人民，人民既是警察又是共和国的主体。甚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每一次的坚持都已经成为了一种胜利。

各种左派右派，这都是假的，它不过是一种环境的造物，而不基于意志的生成。重要的不是我有何种身份，而是我的坚持正在违抗怎样一种伦理，而这在何时都不为晚。这才是我们聚首的前提，它不是一群混子正在琢磨怎样更好地与环境一道同流合污，不是让我们自己一举成名，现在名字本身都是控制的一环了。

今天中午去听了一下“欧洲当代哲学与艺术理论”讲座，（早上的错过了），主要是李洋和后面的一场。必须

说这里有很多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学术上的不诚实，还有当前理论探讨和“知识”本身的怪桔，而这也是我们当前斗争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在这里详细说一下。

总得来说拉康-巴迪欧这类所谓的“哲学”就像常见电话诈骗一样，也许一开始它能唬住一批人，但它的存在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对权威的仿造，事情总是在不断败露的。由于新出的骗术层出不穷，我们往往错过立即当面拆穿这一带感的事件，不过我们仍可以总结这些常见骗术的特点，为以后的战斗做准备。

下面以李洋的学术报告为例，通过具体事例来把这种握神学对知识、权威和哲学的仿冒。李洋是从电影和连续性出发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的：通过对“电影史前史”的考察，也就是原始人对运动的捕捉，得到一个“连续性的幻觉”这么一个观念，进而提出电影史需要改写因为它更为悠久，并且现代性始于连续性的断裂。

实际上“连续性”这个概念出自德勒兹的电影哲学，而德勒兹的电影哲学又很大程度上参考了伯格森对时间-运动的思考 - 连续性来自影像-运动。李洋尽管提到了德

德勒兹和朗西埃对连续性的赞赏，但是从他使用这个概念开始，就严重地曲解了它。而这种曲解方法，和巴迪欧的常见手法是类似的，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德勒兹的语境来考察“连续性”这个概念。在德勒兹这里，“连续性”远非指代静态对运动的再现。这就好比说，我们通过一组“关键帧”的捕捉来完美地再现山羊的跑动，但它实质上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德勒兹所认为的电影技术和非电影的差别，在于电影是一个真实运动的呈现，尽管电影有着它的主观性。

换句话说，李洋在这里直接颠倒了德勒兹，直接把“连续性”当作一个静态再现的过程，并把它当作一个电影史来理解，从而“反对了”德勒兹。但这种反对是建立在齷齪之上的，这种挪用也像极了纳粹对尼采的挪用。在这种曲解下，我们会得到以下推论：连续性来自影像-运动，那么连续性的幻觉也是影像的幻觉。这种所谓的“连续性”构筑的电影史，直接成为了人类史，只要人类对静态之物有所刻画，那么这就必然成了“电影史”的一部分。并且因为这种连续性的幻觉构筑了人们对世界-运动的理解，那么对世界-运动的质疑（就像好莱坞所做的）就成了现代性

的开端——就像巴迪欧提到的断裂，现代性主体的弥补构成真理。

影像-运动作为世界运动的一部分，通过对德勒兹的“连续性”的颠倒，现在被称为“连续性的幻觉”，在李洋的颠三倒四之下我们再一次回到了柏拉图的洞穴——我们总是有一个静态的和更加真实的世界了，而这个通过思考“断裂”而达到真理的过程，被指定给特定的主体。好莱坞的著名桥段，现在成了真理的手段。

现代性确实是建立在柏拉图-基督教伦理上的，不过现实是，它并不发生在所谓“好莱坞打破连续性的幻觉，回到‘爱’这个主题”的此类叙事上，而是在一个庸人开始质疑世界的真实性的时候。这里问题在于通过对“连续性”的颠倒，我们屈从于概念的偶像。电影作为技术但被庸人当作关于“爱”的现代性叙事。

在关于现代性的神学下，我们把技术转译为关于爱的叙事，叙事成为技术的环节，换句话说，这正是一个人类-机器与资本平面的运作过程。这便是一个关于“复制品”的秩序。在李洋之后便有人从本雅明等人的角度来论述资

本主义生产-复制品与现当代艺术。不过令人惊奇的是，这些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读那么多书，引用那么多名家，就是为了写他妈一篇能让自己继续拿工资的论文了！尽管听上去那么尼采 - 号称要改变生活 - 但是我做的，却是改变论文的“生活”，我还是那个我。必须说它的关注能力是极端有限的，不但和现实斗争没有任何关系，如此严重的对立在论文机器面前都是一个“知识”的问题了！

什么拉图尔，我们现在的“学术明星”们装了那么大一个逼，结果观点全都是从尼采那里偷来的，一个可悲的不起眼的低等的狗屎社会学家，只不过是想把尼采变成“有用的”零件罢了。很明显当我们谈及“复制品”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现在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关于复制品与艺术的问题。

如果我们想从资本主义生产-复制品的秩序，得出尼采的艺术要“改变生活”这种结论，就必须从类似李洋的错乱那里出发：由于概念不断地成为偶像，就像连续性被扭曲地提出，是为了“主体”这么一个位置服务的。复制品

的提出，并不是直接来自资本主义生产，那个复制品最先指代的不是工业商品，而是“主体”。

工业化生产的商品是复制品，但在此之前，主体就已经成了复制品。如果我们了解那些神话故事就知道，人被上帝塑造出来，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设计的，人是作为复制品而存在的，只是因为“原罪”，人才不和上帝相像。“主体”作为末日（弥撒亚）情节的组成部分对应的就是那个原初的复制品形象。这意味着什么呢？

歌颂主体的纯洁性，就是在歌颂上帝的全能。因为现代性所推崇的“神圣的人”导致人在不断制造新的上帝，我歌颂那个“人”的形象，就是在创造一种复制品的秩序，一个关于“人”的秩序。这意味着，并不是说艺术仅仅反对了商品的统治，就像现在的一些艺术家的“生命政治”，直接把自己当作复制品来运作了！

复制品的秩序，就是当前的治理，绝不仅仅是在规划商品、交易和治安，而是一种“主体”的自发性，“我”来自发地维护和歌颂一个“神圣的人”了。这就是为什么尼采说，艺术最终是要“改变生活”，它不仅在反对商品

化，而且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是反对一种伦理和克服自我。这也是尼采提到的两种虚无主义：一种虚无主义就是复制品和再现的秩序，是自发的主体的运作和大众艺术；另一种更为积极的虚无主义便是对复制品秩序的破坏，回归到一个混沌层面并在·其·中·重构新的组织方式。实际上这对我们当前的艺术生态来说，仍然是一种完全富有挑战性的观点。

并不存在朗西埃所说的有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第三条路。因为所谓的现代与后现代都出自同一个虚无主义进程中，这里没有一个让虚无主义实现的“第三帝国”值得追求了。所谓的后现代状态完全是出自现代性的一个症候，是我们要打破的消极虚无主义局面。这就好比说，现在干什么都是艺术了，现在我们都进入了一个垃圾时间，但明显从意志的角度来说这里有等级。

当前艺术和哲学的处境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自由派垃圾、小政客、NGO、议会政治全都跑来说自己是艺术了，就像逻辑学、神学、社会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跑来说自己是哲学一样。但这两者并不真的是一种分工和职业，它

是两个层面，哲学与权力有关而艺术要实现生活，是自由把两者联合起来去实现战争机器的装配。

就像尼采说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主人的种族”了！
现在是哲学暴徒和艺术暴君来搞事的时代！

